

王开东 与 杨开慧

◆王华◆李林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前言

毛泽东一生有过四次婚姻。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二位夫人,与其他几位不同的是,杨开慧还是毛泽东的小师妹、初恋人、贤妻子、亲战友。

说是小师妹,因为,杨开慧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杨昌济的小女儿,年龄小于毛泽东8岁。毛泽东在杨老师家中求知问学时,杨开慧经常在一旁静坐聆听;说是初恋人,因为,毛泽东在与杨昌济老师频繁交往中,与杨开慧的接触也增多了,逐渐地两人同时产生了相互爱慕之情,杨开慧也是毛泽东作为青年学子所爱的第一人;说是贤妻子,因为,自与毛泽东结婚直到牺牲这九年中,杨开慧作为妻子承担了巨大的家务操劳,二人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其中岸英、岸青是大家熟悉的。这三个孩子可以说主要是杨开慧养育成长的。毛泽东为了革命工作经常东奔西走,杨开慧尽可能地跟随照顾。毛泽东独自外出,杨开慧时常挂念着他的冷暖、吃喝与安全;说是亲战友,因为,在毛泽东的带动与影响下,杨开慧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成了一名坚定而勇敢的革命者。杨开慧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而遭逮捕,又因拒绝背叛毛泽东而被杀害。



正因为此,杨开慧遇害后,远在江西反“围剿”前线的毛泽东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的内疚之感言。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的关系了解较少,尤其是婚姻恋爱、家庭生活等方面知之更少。本书就是想通过大量资料来比较全面地反映情感世界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让人们了解到初恋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更让人们了解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投身革命事业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使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知道毛泽东与杨开慧是热恋中的情人、生活中的伴侣,更是革命道路上肩并肩的战友。

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一起的生活既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说平凡,是因为他们有着恋人情、夫妻情、儿女情。说伟大,是因为为了革命理想他们付出了艰辛甚至付出了生命;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一起的生活既是短暂的又是永远的。说短暂,是因为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几年,而且因工作需要两人经常分离。说永远,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爱妻,而是把她藏在心中。提起杨开慧,毛泽东总是“泪飞顿作倾盆雨”。但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情感并没有停留在此,而是不断深化,他对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自豪、骄傲。

杨开慧是毛泽东心中的“骄杨”。



目 录

前 言	1
一、恩师昌济	1
二、初识开慧	13
三、相爱北京	20
四、订立终身	27
五、学潮先锋	33
六、共办书社	40
七、爱的风波	49
八、终成伴侣	52
九、参加一大	59
十、发展组织	66
十一、居清水塘	71
十二、岸英出生	77
十三、婚后分离	85
十四、迁居上海	100
十五、回乡“养病”	113
十六、南迁广州	125
十七、孙嫂相助	139
十八、武昌安家	146



十九、依依惜别	158
二十、暴动失利	165
二十一、井冈来信	170
二十二、相互牵挂	178
二十三、恐怖袭来	186
二十四、开慧被捕	195
二十五、遭受酷刑	211
二十六、壮烈牺牲	218
二十七、“百身莫赎”	225
二十八、儿子扫墓	231
二十九、母女合葬	244
三十、不忘孙嫂	253
三十一、关爱杨家	267
三十二、赞颂“骄杨”	280
后 记	287



一、恩师昌济

1913年春,即将年满20岁的青年学子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所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的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毛泽东进入第四师范后,在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随之转入第一师范学校。他先被编入预科第三班,1914年秋,被编入本科第八班。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南区书院坪。这里以前叫城南书院,它的前面是奔腾而去的湘江,背后是树木葱郁的妙高峰,左边是沟通南北的粤汉铁路,对面是巍峨雄伟的



1913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这是在预科读书时的毛泽东。



岳麓山。辛亥革命后，在城南书院早已荡然无存的书院坪，创办了第一师范学校。

就在毛泽东入学的同时，一位对其学业、思想及婚姻产生重大影响老师从海外回来，也来到了这所学校。这位老师就是毛泽东后来的岳父——杨昌济。

杨昌济，又名杨怀中，因其世居长沙县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又被称为“板仓先生”。1871年，杨昌济出生于书香门第，外祖父出身进士，做过清朝国子监学录。父亲杨书祥饱读诗书，没有做过官，终年以授徒为业。杨昌济7岁时进馆发蒙，蒙师就是父亲。1888年，杨昌济17岁时与出身诗书世家的向振熙结婚。婚后第二年，杨昌济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痒生。1890年应试举人不第，便出门授徒。1898年入读岳麓书院，期间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组织的维新运动。1901年，杨家贵得千金，这就是杨开慧。

为了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3年，杨昌济告别妻子和女儿，与陈天华、刘揆一等人一起东渡日本求学。临行前，他给自己取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华。

在日本，杨昌济相继在东京弘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师范学院学习。1909年，在杨毓麟、章士钊的推荐



下,赴英国深造,专攻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191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考察游历了德国、瑞士等国。1913年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回国后,时任湖南督军的立宪派人物谭延闿邀请杨昌济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杨昌济托辞谢绝,决心以教育为己任,培育英才,开启民智,探求教育救国之路。

在这种情况下,杨昌济于1913年到湖南第四师范任教。次年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转入一师任教。毛泽东也转入一师读书。从此,二人之间逐渐建立起亲密的师生情谊,并互为影响。

毛泽东十分敬佩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在国外求学10年,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他不仅以其哲学世界观、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由衷的敬佩。凡杨先生讲课,毛泽东总是专心听讲、认真笔记。杨昌济在四师时讲修身课。《青年毛泽东》一书中记述了杨先生一次讲课的情景:

他很有激情地说:“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人生乃不断之竞争,有无



可夺之志，则事无不成矣。”

台下是认真听讲的学生们，穿一身崭新藏青色学生服的毛泽东坐在其中。他有时急速地记着笔记，有时抬起头来，闪动着炯炯的目光。杨昌济的课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

杨昌济讲道：“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者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虽暂挫折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最终要大受其影响。近世教育学者曰：人属于社会，则当为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冲突时，则当为社会牺牲。牺牲自己之利益可也，牺牲自己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思考着。杨昌济接着讲道：“以上讲的就是‘立志’篇。不知各位同学是否同意？有什么见解可以在课堂上发表。”他微笑着巡视台下的学生们，他希望学生能够与自己进行必要的交流。

但是，许多学生对杨昌济的提问都有些胆怯，生怕叫到自己。有的学生低下



头,装作记笔记的样子。回避着老师的提问……

当杨昌济的目光落在毛泽东的脸上时,他的笑容灿烂了,他指了指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学,你有何高见吗?”

毛泽东毕恭毕敬地站起来,沉思片刻后回答道:“我边听老师的课边想,人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要合乎这个理想。为了这个理想,虽杀身亡家而不悔。古人讲,毒蛇蜇手,壮士断腕。不是壮士不爱其腕,盖不去其腕不足以全其身也。”

杨昌济赞赏地点着头,鼓励道:“好!毛泽东同学思想缜密,能够举一反三。学习就应该这样,方不辜负大好光阴,不辜负你们的青春年华。坐下!”^①

在读书的同时,毛泽东还作了大量的笔记,现存的“讲堂录”就是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该笔记字体十分工整,内容也很详尽。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杨先生讲修身课时的记录以及毛泽东自己的心得体会。

^① 张天民:《青年毛泽东》,中国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48~49页。



如:11月1日 修身

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藪。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古曰懒惰万恶之渊藪也。

11月15日 修身

高尚其理想(立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的人物。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11月23日 修身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



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①

这些古训深深影响着毛泽东的思想与行动。

在读书时,毛泽东还阐发了心得体会。1917年至1918年,杨昌济为毛泽东所在班讲授伦理课。教材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此书经蔡元培翻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发行。毛泽东认真精读了约10万字的这本著作,用毛笔写了1.2万多字的批语和提要。阐发自己对人生、伦理、道德、世界、宇宙的看法。

在读书时,毛泽东不耻下问,积极向杨昌济老师讨教。杨昌济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毛泽东积极参加。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毛泽东经常到杨先生家来讨论读书、哲学问题。

在一师期间,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这样评价他的杨老师: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

^① 刘思齐、李国强:《毛泽东与他的老师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19~121页。



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①

杨昌济也很欣赏毛泽东。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学习成绩十分优秀,老师杨昌济很赏识这样的学生。

一是赏识毛泽东的学习精神。毛泽东以勤于学习而闻名全校。他从不死读书、读死书,而是善于思考,能从书本中汲取营养而形成自己的东西。

他有极好的作文功底。早在入东山小学时,毛泽东以《言志》为题,把自己立志救国的伟大抱负一气呵成地写出来,校长李元甫阅后大为惊异,激动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26页。



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栋梁材。”后来，毛泽东又写了《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言论新颖、气势磅礴的作文，深受国文教员谭咏春的赞叹。同样，在一师学习时毛泽东的习作也得到老师杨昌济的赏识。《体育之研究》就是深受杨昌济老师赞赏的一篇佳作。毛泽东针对当时湖南各学校只重视书本课堂教育、忽视体育锻炼的情况，写了一篇《体育之研究》，经杨昌济推荐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文章开篇即呼：

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轻佻，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①

接着，毛泽东用洋洋 6000 余字对什么是体育，体育的作用、地位及现状等问题进行深刻阐述，说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流畅，真可谓一篇佳作。另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 2 版，第 65 页。



外,《心之力》也是杨先生十分赞扬的一篇好文章,此文章是毛泽东反复阅读《伦理学原理》之后写的心得体会。此文章得到杨先生好评,打了100分,并在学校橱窗展示。

二是欣赏毛泽东的做事才能。毛泽东在一师是一名很活跃的学生领袖,有极强的鼓动和组织才能。在学友会改选中,毛泽东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学友会从此活跃起来;在人物互选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34人当选,而毛泽东得票最多,毛泽东成为一师学生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佼佼者。在军阀混战中,毛泽东指挥学生志愿军,用木枪缴了溃退到长沙的上千人的北洋军的枪;在毕业前夕,毛泽东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组织了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4000余字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批评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此宣言书印了近千份分发校内外,影响极大。张干得知毛泽东等学生闹事,怒不可遏,决定挂牌开除毛泽东等17位学生的学籍。杨昌济得知此事后非常着急,便联合王季范、徐特立、袁吉六等教师加以反对。在大家的压力面前,张干只好收回成命,毛泽东等学生的学籍得以保留。

毛泽东给杨昌济的印象是深刻的。杨先生给毛泽东以极高的评价。在《达化斋日记》中,杨昌济



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



毛泽东恩师杨昌济先生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先父亦务农，现业转

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仁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①

他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这样推荐毛泽东：

^① 刘思齐、李国强：《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版，第 130～131 页。





毛泽东与杨开慧

MAO ZE DONG YU YANG KAI HUI

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和蔡和森——引者）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①

老师喜欢学生，学生敬佩老师，良好的师生关系，为毛泽东相识杨开慧提供了便利条件。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第 452 页。



二、初识开慧

杨昌济先生回国执教于四师后，全家从板仓乡下迁至长沙城，住一师附近的天鹅塘。为了便于识别，杨先生在寓所门口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3个大字。无论杨先生全家搬到什么地方，这块铜牌一直伴随着他。

杨昌济有一男二女，男儿杨开智，生于1898年。大女儿杨琼幼年夭折。小女儿杨开慧，又名霞，字云锦，1901年1月6日出生于长沙县下板仓屋。

板仓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山冲，与平江、湘阴两县交界，四周丘陵起伏，冲岔相接，翠竹丛生，青松密茂。站在山包上向远方眺望，可以看见高高耸立的影珠山和飘峰山遥遥相对；一条从长沙通向岳阳的古道，弯弯曲曲地绕过山脚。板仓小溪顺冲而下，汇进红菱坝，流向远方。

1903年，杨开慧不满3岁的时候，父亲远涉重洋，出国求学，小开慧跟妈妈在板仓度过了童年时代。



杨开慧长到7岁那年,爸爸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在她家附近的杨公庙,有一所小学,即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那时,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7个女孩子单独开了一个班。杨开慧从小懂事,放学后要帮妈妈做一些扫地、择菜、刷锅洗碗等家务活。她见一些同学放学后去扒松毛柴,也随哥哥一起去扒,不怕脏不怕累。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

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是由从日本归来的一位姓黄的人创办的,学校比较开明,图书也多。杨开慧聪明又很用功,课余时间就借书看,喜欢看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丰富了她的知识,拓宽了她的视野,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辛亥革命发生不久,杨开慧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这个学校办了实业科,可以学编织、缝纫、绣花等。校长曾留学日本,思想开放,有时给学生讲日本明治维新,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讲兴中会、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事情,这些新知识撼动着杨开慧幼小的心灵。后衡粹女校要迁至长沙,杨开慧便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杨开慧随父母来到长沙时,已是13岁的大姑娘



了,聪敏秀慧,受人喜欢。父亲把她留在家里让她自学。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读书,除读父亲规定的书外,还挤时间读父亲书房里的儒家经典和唐诗宋词,一些文章可倒背如流。同时,她练习写毛笔字,字体俊秀挺拔。在学习之余,杨开慧还帮助妈妈做一些家务活,起火做饭、端茶扫地、洗衣洗菜,样样活都干得利利索索。

杨开慧在家自学时,经常听到父亲讲到“毛泽东”这个名字,听得次数多了,开慧想问个究竟。

191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开慧正在房中看书,忽听见父亲在外面屋子里连声叫好。杨开慧赶紧放下书,从内房走出来,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本学生的笔记本,坐在那儿,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杨开慧走到父亲身边,惊讶地问:“爸爸,这是谁写的呀?”

杨先生合上笔记本,递给女儿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杨开慧接过笔记本,只见上面题写着“讲堂录”3个大字,下面署名:毛泽东。

她坐在父亲身旁,打开“讲堂录”看着。看了一会儿,杨开慧立刻被引住了。虽然笔记中有些字不认识,但内容基本明白。字里行间,显露了毛泽东宏伟的抱负、闪光的思想、惊人的毅力。从此,她便



对毛泽东产生了十分敬佩的感情,希望能见到他。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当太阳刚刚在东边探头露面时,一群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男学生有说有笑地拥进杨昌济的寓所。他们都穿着粗布衣服,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和他们眼里闪烁着的热情而奔放的光芒,于是,这座安祥静谧的寓所霎时变得热闹起来,活泼起来。

“欢迎! 欢迎!”杨昌济欣喜地把诸生请到横堂屋落座。

“先生这里很好找,我们很远就看到先生寓所门上的铜牌。”一个走在前面身材高大的男生,不待落座,就用洪亮的声音说。

“哈! 毛泽东,这个门牌是我专门为你们挂的,免得你们不好找呢。”杨昌济摸了摸自己那短短的粗硬的八字胡,风趣地说,“来来来,现在首先让我介绍‘板仓杨’寓的各位组成人员。”

“这是我夫人向氏。”

向氏全名向振熙,平江人,向家几代



与杨家联姻，两家是世交。她年纪比杨昌济小几岁，衣着朴素，脸上总是挂着善意的微笑。

“师母好！”诸生一齐起立向向振熙鞠躬致敬。

“这是我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

“师弟、师妹好！”

“不过，大家都叫他们子珍、霞妹。”杨昌济笑着补充了一句。

“子珍、霞妹好！”

杨开智15岁，是一个真诚厚道的中学生，此刻，他也礼貌地与大家打招呼。杨开慧则藏到了父亲身后。

“霞妹怎么又害羞了？来来来，见过诸位学兄。”杨昌济乐呵呵地把女儿拉到大家面前。

接着，杨昌济指着站在开慧身边一个清清秀秀、衣着朴素的十四五岁少年介绍说：

“这是我朋友柳午亭的儿子柳直荀，他在广益中学读书。”

“柳弟好！”

杨开慧见他们又是异口同声、风趣调



皮的样子,忍不住抿着嘴偷偷地笑了。

杨昌济介绍罢家人,遂把诸生介绍给家人认识:

“这位是毛泽东,这位是蔡和森,这几位是陈昌、张昆弟、罗学瓚、萧三……”^①

杨开慧一时没有记全他们的名字,只是好奇地打量着正襟危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位叫毛泽东的男生,只见他衣着极简朴,但相貌魁梧英俊。留有稍长的头发,前额光滑饱满,好像容得下世间的一切;一对机警有神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好像永远在搜寻着什么;一双富于表情的嘴唇,也似乎随时准备张开,发出或机智幽默或掷地有声的话语。

毛泽东也特意地注意了一下杨开慧,只见她上身穿厚实的小棉袄,外面罩着一件紫蓝色底碎白花的灯芯绒罩衣,下穿黑棉裤。白白净净的小圆脸,长着小巧的鼻子,乌黑的丹凤眼,眼角微微上翘给人一种悠远而深邃的感觉,纤巧的嘴角含着天真的微笑,透着一种柔婉与亲和力。

师生落座后便开始议学议政,杨开慧不停地给

^① 邓燕:《骄杨泪》,华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0~11页。



他们端茶倒水,有时也坐在旁边听他们高谈阔论,她听的是那样认真,双手托腮,时而皱眉,时而点头,时而睁大眼睛,尤其是对毛泽东的谈论,更加注意,甚至怕漏掉一句话。

不知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诸生要起身回校,杨先生挽留大家用餐,杨开慧赶紧跑到厨房帮母亲烧菜做饭去了。

傍晚,送走客人以后,杨开慧打开笔记本,记下了这一天的心得。特别记下了毛泽东讲的一些话。

从这个时候起,杨开慧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毛泽东那宏伟的抱负,那与旧势力顽强斗争的毅力,那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朴实、诚恳、谦虚的态度,都成了她学习的榜样。从此后,只要毛泽东和他的好友到“板仓杨”聚会,便少不了杨开慧这位忠实的“旁听生”。毛泽东等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她也把这些大哥哥当作自己的老师,总是聚精会神地静听他们的议论。

就这样,在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与板仓杨家交往了5年,直到1918年初夏,毛泽东毕业,杨先生离湘去北京大学任教。在这5年中,毛泽东与杨开慧从相识到彼此了解,为以后相爱打下了牢固的情感基础。



三、相爱北京

1918年6月,杨昌济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在陈独秀任学长的北大文科任伦理学教授,17岁的杨开慧随全家北上,住在北京地安门外豆腐池胡同9号。

“五四”前夕的北大,人才荟萃,思潮涌动,是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一场震惊中外的新文化运动正在这里兴起。杨昌济十分注意向家乡的学生介绍北京的新思想新文化。还在一师的时候,他就曾自己掏钱购买《新青年》杂志,分赠给毛泽东等学生。杨昌济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向北京、上海、武汉一些名流学者介绍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帮助毛泽东与这些知名人士建立通信联系,以扩大眼界。离开湖南来到北京后,杨昌济仍一往情深地关怀、惦记着他在—师的高足弟子,他经常给他们写信,介绍北京的思想文化动态,还努力让他们能来北京进一步深造,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6月下旬,杨昌济去信,劝毛泽东来北大学习,同时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



人,成立了法华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人到法国勤工俭学。要他们抓住良机,出国学习。当时,毛泽东等正面临毕业,正在商讨毕业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民学会”的出路。毛泽东主张:“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因此,杨先生的来信提供的信息,正合毛泽东等的心意。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去北京。



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合影。第四排左二为毛泽东。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早在毛泽东等人动身之前,新民学会已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北上的火车走



到河南,铁路被黄河水冲垮,一时不能前进。毛泽东就利用候车时间,同大家到附近农村,考察那里的农民生活状况。等到水退路通,毛泽东等于8月19日才到达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先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先生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为了不过多地麻烦杨先生,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其他赴法青年的联络,毛泽东等7人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这是一个窄小破旧的四合院。他们8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间长不足一丈、宽仅有八尺的小屋中。

北京的冬天,寒风怒号,雪地冰天,十分寒冷。他们8个南方小伙子只有一件大衣,外出时大家只好轮着穿。到了这年年底,他们终于又搞到了三件大衣。但生财无方的毛泽东,仍无法搞到钱为自己买件御寒的大衣。毛泽东后来回忆道: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翻身,往



往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①

毛泽东等在京期间办了许多事情。他们在北大、保定育德中学、长辛店等处参加了留法预科班。毛泽东还两次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值得一提的是，经杨先生介绍，毛泽东进入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在此，他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新知识，并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信仰上，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有一个重大收获——他与杨开慧相爱了。

其实，早在来京之前，双方心里已埋下爱情的种子。1916年暑假，杨昌济偕妻子和女儿杨开慧回到故里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场休假。并特邀23岁的毛泽东去浏览他的藏书。杨昌济曾两次考举人不第，在老家开馆授徒，其家收藏的新旧书都很多。对板仓书斋，毛泽东素有夙愿瞻仰一番，有这样的机会岂会错过。过了几天，毛泽东穿着一双草鞋一个人步行100多里走到板仓杨家。

板仓杨宅是一座古老的平房，始建于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年）。杨昌济的高祖父为摆脱家族的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34～35页。



制约,那一年从长沙府金井乡蒲塘迁移到板仓,开始建宅,后人陆续添砖加瓦,至1901年杨开慧出生时,板仓杨宅已有上、中、下三栋房屋加东西两厢住房,房屋建筑结构为土砖木质,中间有天井,房屋院子面积约680平方米。俨然一大户人家。1916年毛泽东第一次到板仓时,杨开慧才刚满15岁。

那天是掌灯时辰,毛泽东来到杨家。杨昌济一见面抚掌大笑,急忙吩咐小女杨开慧为毛泽东端饭添菜。一边吃着饭,毛泽东一边向杨先生请教新发现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入夜,对杨昌济老师订阅的新书新报爱不释手,通宵展读。在板仓住了好几天,这是毛泽东生平中和杨开慧第一次长时间的接触。期间,毛泽东与杨开慧一道还拜访了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

那是一天晚上,杨昌济、毛泽东、杨开慧等在院子里乘凉闲谈,杨昌济提到柳午亭,并说:“柳午亭先生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一直住在高桥方塘冲。”

“这里去有多远?”毛泽东问。

“距板仓40多里路。”杨开慧抢着说。体育问题是此时的毛泽东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等人便去访问柳先生。

毛泽东在板仓待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回长沙。通



过这次长时间、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毛泽东渊博的学识、潇洒的风采在少女杨开慧的心中播下难以泯灭的情感。杨开慧的聪颖俊秀也在毛泽东盛装整个中国和世界的胸怀中，系上一根看不见的红丝线。

毛泽东与杨开慧相别只有两个多月，但在北京相见时，两人却异常兴奋。有人这样描叙他们相见时的情景：

应声出来的是身穿白褂黑裙、神态端正杨昌济 17 岁的女儿杨开慧。毛泽东看到楚楚动人的杨开慧兴奋异常。杨开慧的出现多少让毛泽东有些感到意外，他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盯着杨开慧，一时无语。杨开慧被毛泽东的目光盯得脸孔微红，她轻唤一声：“润之兄！”把如在梦中的毛泽东唤醒了。^①

自从毛泽东来到北京以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在故宫、在西山漫步，他们在吉祥剧院看戏，他们热烈地讨论着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共同编织着理想之梦，美

^① 张天民：《青年毛泽东》，中国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第 89 页。



好的日子在他们的热恋中流逝着。

转眼间,毛泽东就要离开北京了,一是要去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们;二是母亲病重回家探望。这天,杨开慧到火车站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因钱不够只买了一张去天津的车票,杨开慧得知后,责备地对毛泽东说:“钱不够也不说一声,就自己做主到天津再说。到天津你就有办法了?”毛泽东有些歉意地说:“都怪我事先没有准备。”杨开慧有些不高兴地说:“那不会向爸爸、妈妈要?”毛泽东连连摇头:“那是绝对不行的。我都这么大了,也有工作,只是这事太突然,事先没有准备。”

杨开慧见毛泽东这么说,也就不说什么了。然后她翻看自己的手袋,从中找出十来个银元,递给毛泽东:“没钱也不事先告诉我,我也就这些。”毛泽东接过,不好意思地对杨开慧笑笑:“够了,够了。”转身又回售票窗口,换了一张票。

当火车驶出站台的时候,蓝褂黑裙的杨开慧站在月台上,她手中举着一方白手帕,长久地望着,她对毛泽东充满了幻想,希望很快再见到他。分手时两人约好,以后相互通信,交流思想。1919年4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到湖南。两人开始通信,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就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四、订立终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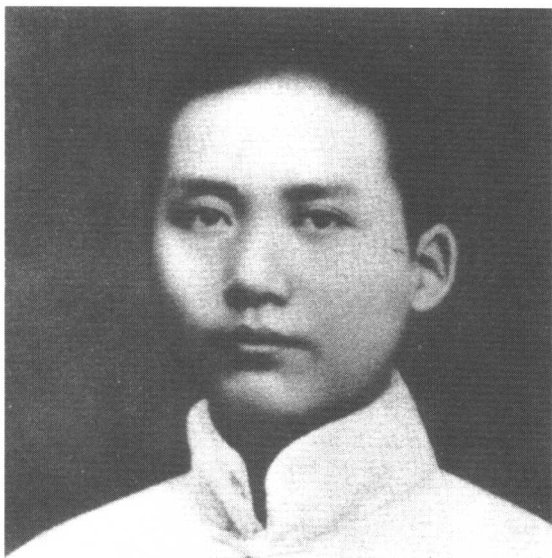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住进了修业小学校。因为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修业小学任教,经他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此时,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浪潮很快在湖南涌起,毛泽东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最主要的表现是,促进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并主编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写了大量的文章鼓吹革命抨击反动当局,并将出版的《湘江评论》寄给北京的杨开慧。

当时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对湖南掀起的革命运动又怕又恨,他镇压学生运动,强行查封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同时,张敬尧及其属下,在湖南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横征暴敛,民众对其十分愤恨,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史称“驱张运动”。毛泽东代表湖南民众的意愿,满怀激情地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为争取全国人民对“驱张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于1919年12月中旬,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到北京,毛泽东一边积极开展驱张请愿活动,一边时常



到杨家看望、照顾生病的老师及恋人杨开慧。

杨昌济来到北京后不久,老胃病发作,全身浮肿,无法上课,最后不得不搬到西山卧佛寺疗养,全家也转搬到此。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杨昌济的病情并未见好,反而加重,只好转到北京德国医院。



毛泽东 1919 年在长沙

一天,毛泽东来到北京的德国医院,看望杨昌济老师,一进病房就喊道:“老师!”杨开慧正在病房照料父亲,听到叫声,猛一回头,惊喜地看到了毛泽东,像见到亲人,便喊了一声:“润之”!

眼圈立即红了。毛泽东劝慰着杨开慧:“开慧莫急!你好吗?”不等她回答就对杨老师说:“老师!你的情况好吗?”杨昌济见到毛泽东也很高兴,他试图挣扎着起身,毛泽东赶快去按下他:“你不要动。”



杨昌济依在床边有些吃力地说道：“你来了好。就等你了！我这一病，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杨开慧和她母亲都没有了主意。你来了好，我也有许多事……”毛泽东边接过杨开慧拉过的凳子，边坐在杨昌济身边说：“不忙，不忙。先休息，事情慢慢说，来得及。”杨昌济苦笑着：“我怕的就是来不及了。”他不想带着遗憾离开这个让他留恋的世界。

杨昌济患有多种病。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医疗条件所限，杨昌济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他在交代后事，当着毛泽东的面，将杨开慧的手交到毛泽东的手里，用自己的手紧紧握住他们：“我还要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润之，照顾她吧！我不行了。”

杨昌济先生于1920年1月17日去世，终年50岁。

杨昌济逝世以后，毛泽东与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等29人，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名发表启事，称颂先生师德，哀悼一代名师。《启事》曰：

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以本年一月十七日午前五时病歿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学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溯自先生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学校，复留学于英国苏



格兰大学,既毕业,赴柏林考察教育,亦逾一年。辛亥冬季,全国兴革命之师,先生于是时归国,即回长沙任高等师范及第一师范各校教授,雍容讲坛,寒暑相继,勤恳不倦,学生景从,如是者七年有余。戊午岁,长沙被兵事,师范学校亦驻兵,教育事业将隳弃无可为,先生乃来北平,任国立大学伦理学教授。参稽群籍,口讲之暇,复有译述,精神过劳,因遂致病。如为胃病,继以泛肿,养疾西山,逾夏秋两季。入冬以后,病势日剧,居德国医院受诊治。医者谓其脏腑俱有伤损,医疗匪易,而先生之病亦竟以不治。以吾国学术之不发达,绩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以嗜学终其身。天不假年,生平所忘,百未逮一,为教育、为个人均重可伤也!先生即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歿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先生服务教育,亦近十年,揆诸优待教员及尊重学者之意,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俾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优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赉助,此则同人等所



感盼者也。不尽。^①

杨开智、杨开慧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杨昌济教授讣告》定于1月25日在法源寺举办丧事。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办理丧事，他事事都办得井井有条，处处都显得尽心尽力，这既反映了他对恩师的一片真情，也显示了他办事的能力。

然而，祸不单行，就在哀悼恩师杨昌济期间，毛泽东家里传来噩耗，年仅51岁的父亲毛顺生病故。毛泽东无法回韶山，只好忍着丧父之痛，去电长沙，让大弟毛泽民主持家父的丧事。

办完丧事，杨母与杨开智、杨开慧扶柩南回长沙板仓安葬。毛泽东一路护送到武昌，叮嘱师母、开慧、开智节哀，然后返回北京继续开展“驱张运动”。临别时，毛泽东紧紧握着杨开慧的手说：

“我在北京办完事很快就会回来，你在长沙等着我。”

毛泽东这次来京，还有其他一些收获。第一次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刊，如英国人柯卡普

^① 刘思齐、李国强：《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33～134页。



的《社会主义史》中译本和考茨基的《阶段斗争》等中译本；毛泽东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北方领袖李大钊频频接触，并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在上海活动近3个月，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南方领袖陈独秀多次会晤，共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在湖南如何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7月初，随着“驱张运动”的胜利，毛泽东回到长沙。



五、学潮先锋

1920 年春天,杨开慧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就读于长沙福湘女子中学。

杨开慧进福湘女中还费了一番周折。

福湘女中坐落在长沙市兴汉门外的长春巷,是外国的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校规、守则繁多。当时长沙的中学还是实行男女分校。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学校里的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非常激烈。仅有的几所女校,因为闹过几次学潮,保守的学校当局对新生入学卡得很严。受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此时的杨开慧也变得十分“过激”。她毅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那时候,封建王朝虽说已经被推翻,但社会仍保留着妇女蓄长发、缠小脚的封建习俗。只有接受了新思想的人,才敢剪掉辫子。所以,五四运动时期,剪短发也是一种革命行动。为此,一些学校不愿收杨开慧。杨开慧入福湘中学是经同她父亲一起留学日本的好友李肖聃先生介绍的。

李先生在福湘女中任教,是长沙市有名的国文教员,在社会上颇有声望。其女儿叫李淑一,就在



福湘女中读书,当时因为杨开慧自动剪短头发,被校方视为“过激派”不想收进。经李先生力争才予以报到注册。

杨开慧被编入选修班,选学英文、数学,与李淑一同住一寝室。从此,杨开慧与李淑一结下深厚同学友谊。新中国成立后应李淑一之邀,毛泽东曾赠诗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赞扬两人友谊。

福湘女中的清规戒律很多。吃饭前,洋老师领大家唱歌:“诚心诚意,感谢上帝,赐我饮食,养我身体。”经常进礼堂念圣经,做祷告。这叫“小礼拜”。每逢星期天,全校同学要整队到北门正街天主教堂去做“大礼拜”。除唱赞美诗、念圣经、做祷告以外,还得听牧师讲《圣经》。杨开慧对这一切看不惯,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校长是美国人,叫林支尼,她多次叫杨开慧蓄发,杨开慧反而把头发剪得更短,有的同学也跟着剪了短发。杨开慧不听《圣经》课,不做“礼拜”,每逢做“大礼拜”的日子,便推说有病,躺在寝室看进步书籍。

杨开慧来到福湘女中,给青年人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她在福湘校刊上发表文章,用生动、通俗、泼辣的白话文,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抨击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她还积极参加学生自发组织的“驱张运动”,并同阻止



学生运动的校方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下,杨开慧逐渐成熟长大。她企盼着毛泽东早点回来。

毛泽东是4月11日离京赴沪的,途经天津、济南、泰安、曲阜、南京等地,于5月5日抵达上海,然后回到长沙。途中毛泽东在曲阜下车看了孔子墓,看了孟子的出生地,还登了泰山。

7月的一天,刚刚下了一场透雨,天气显得格外凉爽。毛泽东身穿一件薄薄的旧长衫,腋下挟着一大卷宣传学习材料,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杨开慧见了,赶忙迎上前去,一手拉住这位久别的亲人:

“润之哥,你可回来啦!叫人好想!”

接着,她讲起自己的学习生活,讲起福湘学校的学生运动。

毛泽东也很高兴。他也讲起他的北京、上海之行。

“我在北京,同李大钊、邓中夏他们研究了湖南今后的工作。又去上海见了陈独秀先生,学了不少东西。关于你的情况,回来后,我都听说了,你们干得好。现在形势发展快,各方面都要人,省学联要你去帮忙,你意下如何?”

杨开慧高兴地说:“我去,我去,润之哥,我没有



经验,你要多帮我一些。”

“省学联”全称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是五四运动期间,在毛泽东倡导和指导下成立的。

当时,北京已成立学生联合会。为了把五四运动引向深入,北京学生联合会派了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邓中夏作为派往湖南的代表来到长沙。毛泽东立即把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打算告诉了邓中夏,得到邓中夏的支持。毛泽东便召集新民学会成员在楚怡小学开会。会上,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邓中夏,并提出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便把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当即得到所有到会会员的赞同。会后,经过几天的联络协商,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终于宣告成立了。

学联会成立后,发动学生总罢课,涌向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参加抵制日货活动,后学联会被张敬尧解散。随着驱张运动的胜利,学联会的组织得以恢复,毛泽东已不是学生,不是学联会成员,但他经常与学联负责人研究工作,商讨对策,指导学联活动,成为学联的实际领导者。毛泽东要杨开慧来学联工作,一方面是培养、锻炼,另一方面是关心与爱护,把开慧放在自己左右,成为一名工作上的伴侣。

杨开慧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遵着毛泽东



的意见,她担负了学联会的宣传工作,奔波于各个学校之间。整个暑假,杨开慧都忙于组织学校讲演队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统治的宣传。讲演队举着旗帜、敲着锣鼓,活跃在街头巷尾。杨开慧越来越忙了,一些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跑到长沙请学联会求援。她热情地接待着他们,为他们安排生活,给他们讲形势任务,讲斗争策略。有一次,衡阳来了一批学生,住在船山学社。杨开慧忙完工作看到他们睡的地铺仅仅垫着一层草席,会受潮伤害身体,便马上找几位同学去弄稻草。她发现有一位年纪小的女同学,就拉着她的手,亲切地问:

“你贵姓啊?”

“我姓朱,叫朱舜华。”

“你在哪里读书?”

“衡阳三师。”

“呵,你们那里的学生运动搞得蛮带劲嘛!”

“学校把我开除了。”

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杨开慧觉得这位姑娘很泼辣,又很倔强。便托人介绍她到崇实女子职业学校去代课。小朱非常感激。

杨开慧关心学生运动的发展,更关心妇女的命运。她联系的女同学越来越多了。这年10月下旬,



她有事去周南女校，了解到一位女学生跳塘自杀的情况。

这位女学生名叫袁舜英，只有 16 岁。她家在农村，出身贫寒，从小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她进入周南女校读书，还带来了农村劳动妇女勤俭朴实的作风，学习刻苦，不讲打扮，忠厚老实，乐于助人，受到同学的爱戴。她的丈夫姓李，是周南女校的英文教员，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他常为一点小事骂袁舜英，甚至毒打她。对此事，校方却认为是“家里的事”，是合法的。一天，那个姓李的英文教员竟当众百般羞辱自己的妻子，逼得袁舜英半夜投塘自尽了。

杨开慧走进学生宿舍，看见一些同学在伤心落泪，一些同学在悲愤交谈，另几个同学在轻声读着袁舜英留下的绝命书。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却又想不出伸张正义的好办法。杨开慧看着绝命书，强忍住眼泪，不禁想起去年长沙发生的赵五贞自杀案。去年 10 月，南阳街的女青年赵五贞，因反抗包办婚姻，带了一把剪刀，在花轿中自杀了。毛泽东满腔义愤，连续在报上发表九篇文章，揭露社会的黑暗，指明万恶的社会制度是赵五贞自杀的根源。主张打破迷信，改革婚姻，反对礼教，摧毁吃人的社会制度。今天袁舜英的死，实质不是一样吗？想到



这里，杨开慧放下死者的“绝命书”，愤然站起来说：

“同学们，这不是袁舜英一个人的事，这是我们妇女姐妹们的事，为了我们妇女的解放，我们不能靠学校，也不能靠什么人发慈悲，要靠我们自己！”

大家说：“你说怎么办？”

杨开慧两眼一亮，对大家说：“毛泽东先生最支持妇女解放，我们何不去找他？”

同学们大多数都在报上看过毛泽东的文章，听说要去向他求教，精神都振奋起来。随后，在杨开慧带领下，大家找到毛泽东。毛泽东细心地询问了事件的过程，然后耐心地向大家讲解：“现在这个社会，妇女受压迫的情况还很普遍，哭，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起来为妇女的解放斗争而呼吁，要想法把这次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同情，一致谴责这种压迫妇女的现象。”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杨开慧和进步同学马上行动起来。她们在大街上讲演，在校刊上揭露事件的真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袁舜英事件哄动全长沙城，很快激起了民愤。报纸上、街道上更是谈论不息，学校当局仓皇失措，赶紧开追悼会，隆重安葬死者，处分了李某。这次行动，为妇女解放运动壮了声威。杨开慧的名字，也在同学中广泛传开了。



六、共办书社

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已由“五四”前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在北京,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热潮的影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于1920年7月初回到长沙。

这时的湖南,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张敬尧统治的时候,公然提倡扶乩、卜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一时间,湖南“阴风飒飒,神气沉沉”。

湖南人民处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思想觉悟自然难以提高。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当务之急。还在北京时,他就思考着驱张胜利后,如何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问题。回到湖南后,毛泽东根据湖南文化界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他联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



和教育界人士方维夏、湘雅医学校职员赵运文等人,共同做发起人,于7月31日,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报纸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以下按语:

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文章说: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稀奇,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湖南人了不得。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它相干。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很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



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共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仁,愿于大家共负的责任中划出全力所能胜的一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

文章还说:

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胜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救救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①

8月2日,文化书社发起人在楚怡小学何叔衡住处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98~499页。



速,庶使各种有价值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大纲还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法。会议推定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为筹备员,负责起草书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筹备书社成立。

毛泽东创办书社的事让杨开慧知道了。一天,杨开慧来妙高峰下的惜阴街,找到了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已被任命为第一师范附小主事,主持一师附小的事务,相当于校长一职,这一职位使毛泽东在长沙获得相当地位,有了比较宽裕稳定的收入。但是,毛泽东的住处仍十分简陋,床上的棉被是旧的,竹席是旧的,那顶蚊帐也是旧的,床上没有枕头,放了几本书作枕头用。毛泽东身上仍是那一身半旧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

这时,毛泽东正在翻阅最近的报纸,看见杨开慧进来,随即说:“霞子,你来得正好,先看看这个吧!”

杨开慧接过报纸一看,一则题目叫《发起文化》的报道吸引了她。杨开慧快速地浏览了一下,兴奋地说:“太好了,我应该有自己的书社。”接着,毛泽东与杨开慧就办书社一事进行了深入交谈。

杨开慧深知,对毛泽东来说,生活艰苦一点倒没有什么,眼前的问题是创办书社的经费不足,几



位书社发起人，只有微薄的工资，拿不出多少钱，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扩大社会影响，毛泽东等已找了文教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知名人士，筹集了400多元，但经费仍十分紧张。



战友(油画) 许宝中 李泽浩作

杨开慧想帮助毛泽东渡过困难。她想到父亲去世时，北京的一些朋友给妈妈寄来一笔奠仪费还没有用完，可是自己和开智哥哥都还在读书，需要钱，家里再没有挣钱的人。想起压在妈妈身上的生活重担，她感到难于开口。但她想到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一心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一心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民众着想，这副担子该有多重啊！自己不为他分担，让谁为他分担？她决心赶回



家，劝妈妈把这笔钱拿出来。

杨开慧知道妈妈很敬佩毛泽东，回到家里，便从毛泽东生活说起。

妈妈一边煮饭，一边说：

“他还是那么忙吧？身体好吗？”

“他更忙了，正在创办一个书社呢！”

妈妈烧着饭，头也没有抬，只是说：

“他总是为大家的事忙啊，忙啊，忙得衣服也顾不上洗，饭也顾不上吃。”

杨开慧见妈妈没有问书社的事，就提醒说：

“妈妈，毛先生办书社缺钱，搞革命也缺经费呀！”

“要是你爸爸在世，就好办啰！”妈妈叹息一声，没有再说下去。她一向认为，女儿的话都有道理，毛先生办的事都是好事。就是没有想这件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是啊，可惜爸爸死得太早。”杨开慧看见妈妈脸上挂着泪珠，知道她还没有完全习惯于没有丈夫的生活，所以提起他就伤心。于是安慰妈妈说：“妈妈，要是爸爸还在，看见毛先生干了这么大的事业，该多高兴啊！”

妈妈擦去眼泪，点着头“嗯”了一声，表示赞同。

“妈妈，要是爸爸还在，他会怎样支持毛先生的



事业呢？”

妈妈抬头看了看女儿，回答说：“他会尽他的力量去做的。”

“那么，我们也尽我们的力量去做。”

“霞，你说什么？”妈妈惊讶地望着女儿！

“你们不是在恋爱吗？我从来也没有拦你们的路哇！”

“不，妈妈，我说的不是这个事。”杨开慧见妈妈误会了她的意思，随即说明：“我们把剩下的那笔奠仪费拿出来，给毛先生做经费吧！”妈妈沉默了一会儿。杨开慧又说：“妈妈，毛先生为天下穷苦人献出了全部心血。我们为天下穷苦人都有饭吃，有衣穿，就少吃一口饭，少穿一件衣吧！”

妈妈听女儿说得很动感情，很有道理，心里十分激动，站起身来，要开口却又不便开口。杨开慧走过去，亲切地扶着妈妈坐下，妈妈轻轻地抚着她的头，细声说：“霞，你们还要办婚事呀！”

杨开慧亲切地说：“妈妈放心，我们商量好了，不做新衣，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一句话，不作‘俗人之举’！”

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走进内房，打开抽屉，拿出那笔钱交给了女儿。

杨开慧手捧银元，禁不住喜泪交流，她深情地



望着妈妈叫道：“妈妈，好妈妈！”随即一阵风似的跑出屋子。一口气赶到惜阴街毛泽东的住处，将那包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感激开慧和师母的无私支援。钱虽然不多，但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们的帮助显得特别珍贵。

9月9日这一天，文化书社正式开始营业了，总经理是毛泽东的好友易礼容，长郡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陈子博等3人为营业员。书社租用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位于潮宗街56号，杨开慧约几个同学，将楼下楼上打扫得干干净净。那间大屋的两根柱子用布围了起来，做了阅览厅。书架上很醒目地摆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阅览台上摆着《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等几十种进步报刊。这是长沙市第一家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书社，来的人特别踊跃。文化书社工作人员不够，杨开慧既是热心读者，又是义务工作人员，力所能及地帮助毛泽东做点事情。

文化书社创办以后，自然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广大青年、学生、工人、各界进步人士都与书社发生着联系。没有多久，在平江、浏阳、邵阳、衡阳、宁乡、武冈等县都成立了分社，在长沙城



内的一师、一师附小等学校也设了贩卖部。毛泽东与杨开慧常常把书社当作联系进步人士的联系点。有一次,杨开慧在《新青年》上读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片段,心情分外激动,立即写信告诉衡阳的一位同学,要她赶紧到文化书社的衡阳分社去买,并要她好好学习。文化书社也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进步团体和出版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了毛泽东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的重要联络地点,也成了杨开慧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课堂。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与外地革命同志的来往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转,杨开慧成了接送这些信件的交通员。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爱好,频繁的接触,使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关系更加密切,结合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七、爱的风波

学子毛泽东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曾提出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在校学习期间不谈恋爱。他愿意谈大事。在陕北,毛泽东同斯诺交谈时,曾这样回忆: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也从来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①

毛泽东说到做到,在一师学习期间确实没有谈情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28页。



说爱,但并不等于毛泽东没有爱或被人爱,毕业后短暂的两次北京之行能使毛泽东与杨开慧恋爱关系公开化,说明毛泽东在一师与杨家的交往中打下了良好的情感基础。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是真摯的,杨开慧十分爱她所敬佩的毛泽东。1929年6月,杨开慧在板仓曾笔述她与毛泽东相思相爱的心路历程:

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结婚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旧仪式的结婚,并且我以为用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绝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操在自己的手里。我决不要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



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
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①

杨昌济夫妇开始对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赞同的，但是要招毛泽东为婿，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主要是考虑毛泽东比杨开慧大七八岁。后来见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恋爱关系越来越深，他们也就打消了顾虑。杨开慧向母亲表白：

“我是为母亲而生之外，也是为他而生的。”

母亲明了女儿的心迹，赞同了女儿的选择。

^① 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22页。



八、终成伴侣

转眼间,到了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在不断深化。他们俩都在向对方倾吐自己的爱慕之情。一天的夜晚,凉意透人。月如钩,夜深沉。毛泽东在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后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披衣坐起,望着窗外的寒星,思念着杨开慧,热切地回味着与杨开慧在一起的情景,体会着她深沉、含蓄的恋情,时而又觉得她似乎还有什么秘密在内心隐藏着。27岁的毛泽东被爱情困扰着,毛泽东没有一点睡意,他划了一根火柴,点亮了灯,抽上一支烟,然而在书桌上铺开纸,随手拿一支毛笔在墨砚上点了几下,沉思片刻,挥笔疾书,向杨开慧写了一首示爱信并附词一首。

第二天,毛泽东将词和写给开慧的信套在信封内寄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

杨开慧接到信后,心摇神颤,忍不住将消息告诉同窗好友李淑一,摇着李淑一的肩膀说:“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词属倾吐思念之情的感情



秘密。但从后来毛泽东写的《虞美人·枕上》^①一词中,可看出毛泽东思念杨开慧之真之切: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皆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其实,杨开慧也在深深爱着毛泽东,甚至更极,她曾这样记录自己的内心世界:

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 假若他被人捉着去杀了,我一定要

^① 此词于1994年12月2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①

当然,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的爱情是真摯的,但不是直接表白的,彼此之间还有点藏而不露。杨开慧承认,在此之前,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更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②

这一次毛泽东以词信为媒的真摯表白,使杨开慧激动不已。不过几天,杨开慧主动来到一师附小找毛泽东。

毛泽东自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为了生计,也为了便于以职业掩护革命活动,便受聘担任湖南省立一师附小的主事,相当于校长,同时兼任一师国文教员和一师校友会会长。

杨开慧来时,毛泽东正在上课。她坐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里,端详着墙上挂的一副对联:

① 《骄杨》,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第 7 页。

② 《骄杨》,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第 8 页。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杨开慧知道,这是毛泽东改写明代学者胡居仁一联以自勉,原联为:

若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杨开慧感到宽慰。她最怕毛泽东工作时废寝忘食。现在毛泽东的活动非常多,人都累瘦了。

看见零乱的屋子,杨开慧麻利地收拾起来。这时下课铃声响了,毛泽东下课回到那兼卧室的书房,一眼便看见了杨开慧,迎上去握住杨开慧的手,郑重地说:

“开慧,看了我写的词和信了吗? 我们结婚吧!”

杨开慧点点头,低声说:“我怕。”

“怕什么?”

“怕配不上你,人家都说你人才出众,我幼稚,怕给你丢丑呀。”

“傻妹妹,同意的话,来个喜事革命,婚事新办。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戴凤冠不请客,你看如何?”

“我不知道,要问妈妈,不过,我赞成你的主意,不



戴凤冠不坐花轿。不做俗人之举。”

“我看师母不会反对，就在月底如何？”

“看你急的，陪嫁的衣裳还没有做好哩！”

“这也是，我得做身新衣服，虽说不拜堂，也得像个新郎官，哈！哈！”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这对从新文化、新思想中熏陶出来的自由恋爱的新青年结婚了。

结婚这一天，正好冬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船山学社举行结婚仪式。说是结婚仪式，其实很简单，结婚那天，杨开慧不带嫁妆，不坐花轿，也没有拜天拜地。只是花了六块钱请帮忙的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陈昌的妻子毛秉琴等人吃了一顿饭。用杨开慧的话讲是不做“俗人之举”。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婚姻，对毛泽东和杨开慧来说是一件可庆可贺的大喜事。杨开慧嫁给了心爱的理想的人，更是感到自豪与幸福。然而，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曾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

毛泽东的结发妻姓罗，没有名字，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大毛泽东4岁，1908年嫁到毛家，1910年病逝。毛泽东从不承认这桩婚事。也不想在这美好时刻去回忆那不幸的事情。

这年寒假，他们相约去板仓过春节，并拜见母亲



大人。

板仓杨家下屋是一栋坐西朝东的房子，亲人们把他俩安排在第三进的侧屋里。这是一间清静的小屋，屋后是茂密的竹林，常青的松树，窗前的天井里，栽种着一棵桃树，一株山茶。室内的陈设和往日一样，整洁而简朴。木格子窗下，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开慧喜爱的书，桌旁一把藤椅，几张方凳。旧式的木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铺着白色的被褥，床头是白色的荷叶边枕头，这纯净简朴的房子，象征着他们的感情洁白无瑕。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了，这在清泰乡可是一件大事，乡亲们奔走相告，络绎不绝地来到板仓，既贺新婚，又贺新春，进屋一看，他们用的都是旧的家具，没有添置一点新摆设，大家都非常称赞，再一打听，他们结婚时，一没有办嫁妆，二没有坐花轿，三没有办酒席，既不要媒人送亲，也不披红戴花拜堂，大家都说，这是新人新事新风气，盘古开天头一回啊！

杨开慧和毛泽东一起迎来送往，与大家亲切交谈，拉家常，讲形势，谈古今，给乡亲们留下难忘的回忆。

杨开慧陪毛泽东踏看了板仓的山山水水，看了她读过书的杨公庙小学，也看了她小时候扒过松毛柴的棉花坡，还到了附近的杨家老屋、余家坳、罗家铺子，



走访了贫农家庭,基本熟悉了这三县交界的偏僻山乡。

他们在板仓住了十来天,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春节,又回到长沙了。在长沙的亲朋好友,也纷纷前来祝贺。在长沙,他们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家,还分别住在学校里。他们在妙高峰下一个朋友的一间楼房里,接待了交往最密切的几位朋友,每人拿出几角“添菜钱”,办了几个菜,大家热热闹闹地围在一张桌上吃了一顿饭,表示对他们结成革命伴侣的祝贺。



九、参加一大

幸福的婚姻是甜蜜的。但是,毛泽东没有沉迷于其中。他有许多要紧事要做,其中,为建党做准备工作是重中之重,为此在结婚前后,他处理了几件紧迫事情。

第一件事——动员弟妹投身革命。

按照年前的约定,毛泽东返回长沙与弟毛泽覃一道回到韶山。这时的家庭已发生大变化,先是母亲于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1919年冬病逝,100余天后,父亲毛顺生也去世,家里只有毛泽民、毛泽覃及毛泽建弟妹三人。当时毛泽民已结婚,妻子叫王淑兰。经毛泽东做思想工作,弟妹们都同意跟长兄毛泽东去长沙。临行前,毛泽东安排,把自家的猪赶到银田寺卖掉,还清欠款;别人欠毛家的钱,则当面讲清不要了;池塘里的鱼送的送,卖的



教育全家干革命(油画) 恽忻苍 作

卖;田地给穷人种,房子给穷人住,家具、农具分送邻里,此举措被史书称为“毁家革命”。从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毛家人全部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件事——建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陈独秀致信毛泽东



在长沙建立同样组织,并先后寄来上海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以及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毛泽东经过慎重的挑选,与何叔衡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由此建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第三件事——创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寄来的青年团章程和信件。请他在长沙发展团组织。在这之后,毛泽东开始从新民学会会员以及进步学生中发展团员。关于毛泽东建团活动,当时湖南一师附属学校的张文亮曾在1920年冬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

11月17日,接泽东信,送来青年团章程10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来信……(三)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做中坚分子,



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四)青年团你可以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1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9本。^①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团工作抓得很紧、很细。毛泽东在建团中,注重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提高团员青年的政治思想素质,杨开慧便是首批发展的团员之一。经过毛泽东等人的艰辛努力,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毛泽东担任第一任书记。

第四件事——召开新民学会新年大会。

1921年1月1日,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内,毛泽东召开新民学会新年大会。18名会员热烈讨论了三天,求同存异,把新民学会的宗旨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改造的方法,毛泽东主张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新民学会已演变成革命青年政治团体。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新民

^① 蒋建农主编:《世纪伟人毛泽东》(上册),红旗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02~103页。



学会已没有存在的意义。于是,新年大会后,新民学会便自行停止了活动。其中的“真同志”和积极分子加入到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或者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两个组织中去了。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湖南的建党活动搞得很好。全国建党已指日可待。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油画) 艾中信 作

192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转发的通知,要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

6月29日的傍晚,空气显得很闷热,一场大雨就要来临,暮色中的湘江轮渡码头上,两个行色匆匆的人悄悄搭上了一只拖轮船,离开了长沙。这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何叔衡,当时送行的谢觉哉曾在这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952年谢觉哉解释说,毛泽东和何叔衡的上海之行,是一件秘密的事情,不能表白,日记中这几个圈,是代表“共产主义者”5个字。

据史料记载,谢觉哉为毛、何赴上海送行。其实,从情理上说,还有一个人也来为毛泽东送行,这就是杨开慧:

6月29日深夜,黑云蔽天,将要下雨。毛泽东与何叔衡来到湘江码头。开慧提一口小衣箱,跟在润之后面,沿着大西门河街走着。江面凉风扑面,船上灯光点点,像是飘浮江面的火苗。轮船码头上熙熙攘攘,一艘大客轮升火待发。毛泽东、何叔衡即将乘坐这艘船到汉口,然后,从那里换船去上海。

开慧送润之、叔衡登上轮船。这是一次秘密的旅行,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没有几



个人知道,也谢绝了同志的送行。新婚别离,哪怕是短暂的分别,对恩爱夫妻说来,另有一番依依难舍的滋味。

开慧把一包茶鸡蛋和盐姜送在润之手中,叮嘱他:“要是下雨天凉,箱里还有一件薄毛衣。”这是结婚后开慧特为他赶织的。

汽笛一声长鸣,轮船离开了码头,迎着曙光,排开湘江汛期的浊浪,向着前方驶去。¹

毛泽东和何叔衡是经武汉转赴上海的。与其他代表以北大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立德里3号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张国焘主持会议。经过几天讨论,大会通过了两个主要文件即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为党的中央局书记,中共一大胜利结束。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积极开展党的各项工作。

1 《情系骄阳》,海南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4~55页。



十、发展组织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何叔衡便赶回长沙,着手开展党的工作。为了集中精力,毛泽东辞掉了一师附小的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担任,自己只受聘于一师任国文教员。

关于如何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是当务之急。而宣传必须有阵地,发展党员要有培训基地。为此,毛泽东想到了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毛泽东的想法得到了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船山学社是辛亥革命以后湖南一部分文人学士为讲述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而设立的民间组织,政府每月拨付经费400元。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湖南自修大学很快便办立起来,由贺民范任校长,毛泽东任指导主任。

自修大学是党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旨在培养党的干部。因此,毛泽东一改当时一些大学学费高、机械式教育、贵族式学校的办学老模式,创办自己有特色的学校,在《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中规定了办学方针,招生条件和学习方法。



办学方针是：

发现真理，造就人才。

招生条件：

只凭学历，不限资格。

学习方法：

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
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

由于青年人对自修大学不了解，9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个人，即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员的夏明翰。但是，后来经过做工作，各地前来学习的青年达100多人。

湖南自修大学注重自修，没有上课时间，各人自由研究。在这里，学员们可以自由地选学文学或哲学，可以自由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可以广泛阅读进步书刊，还可以边学习边参加社会活动。学生每天读书记笔记，写一篇文章，学校内还有一个图书馆，收集有大量的进步书列，供学习者阅读。毛泽



东和他的许多朋友都参加自修大学的活动,杨开慧也参加了自修大学的学习。

杨开慧从板仓回到长沙后转到周南女校读书,该校是教育家朱剑凡创办的第一所湖南女子中学,前后有过一批名师和知名校友。向警予、蔡畅、帅孟奇、丁玲等人也在此校读过书。当时,湖南知识界号召“男女同校”,杨开慧便串联周南女校5个同学,毅然离开周南女校进入岳云中学读书,遂成为湖南男女同校的第一批女生。1921年冬,杨开慧离开岳云中学,来到自修大学学习。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还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



送学员(油画) 陈衍宁 作



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人。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

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交朋友。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同杨开慧一道去。先后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一天,毛泽东对杨开慧说:“现在正在学生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你是第一批C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争取早日转党。”

其实,此时的杨开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杨开慧置身在这所新型学校,心情格外舒畅。在毛泽东的引导下,杨开慧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进一步成熟,同时在这里,她认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青年团骨干,继续从事省学联的宣传工作,还与毛泽东一道经常深入工厂、学校、矿山去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织。杨开慧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在毛泽东的指导帮助下,杨开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工作经验进一步丰富,且立场坚定、大公无私、意志坚强,基本符合入党条件。

一天,负责组织工作的何叔衡找杨开慧谈话。

杨开慧平时尊称何叔衡为“叔翁”,虽然是熟人,此时他代表组织和自己谈话,不免有些紧张。



毛泽东与杨开慧

MAO ZE DONG YU YANG KAI HUI

何叔衡说明来意,郑重其事地问了杨开慧几个问题,并给了她一张表格,杨开慧接在手里,看见“入党申请书”几个字,激动得心怦怦直跳,赶紧回去关起门来怀着虔诚的心,认真地填写起来。1921年冬,杨开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斯年,她正好20岁。



十一、居清水塘

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是一个离城很近而又幽静的地方。塘里水波粼粼,清澈见底,四周都是菜园。靠近塘边那一栋四缝三开门的木板平房,突出在碧绿的菜地里。平房的围墙外边,有几处菜农居住的茅屋。左边小山丘上,有几棵常年绿荫的斑竹和几棵小松树。1921年冬,毛泽东租了这栋木板平房——清水塘22号,作为党的秘密机关。毛泽东选定这里做党的秘密机关有以下考虑:一是交通方便,靠近火车站,出火车站要不了多久便到了,便于和全省各地党的组织联系;二是靠近船山学社,当时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从清水塘去船山学社,只要横过铁路,通过小吴门便到了;三是距离文化书社这个党的联络地点也很近;再者,清水塘地点偏僻,又有农舍、瓜棚掩护。夏秋时节,瓜棚绿荫掩映,人在瓜棚中穿走,不露行迹。

杨开慧已经停止学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成了职业革命者。搬家前,杨开慧到清水塘22号看了好几遍,请木匠任树德来维修房子。任树德是毛泽东在



自修大学认识的泥木工人,也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第一个工人。政治上非常可靠。任树德带了两个帮手,按杨开慧的要求把房子做了修整。考虑到往后要在这里开会,杨开慧让工人在房屋外的路面上铺了沙石碎瓦,防止下雨路滑。

自父亲去世以后,杨开慧的妈妈向振熙一直住在板仓,一年来长沙几趟,住在舅舅家。杨开慧和毛泽东商量:老人 50 岁啦,身边没有人照顾,自然会感到孤寂,倒不如和老人家同住。她一开口,老人满口答应。做学生时,杨母就喜欢毛泽东,她很同意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她对杨开慧说:“霞,你和润之放心做事,茶饭我来做,反正只有三个人。”

搬家这一天,天气格外好。温暖的阳光,照着幽静的庭院。杨开慧和妈妈一起,安排好厨房,整理好行李,趁妈妈生火煮饭的时候,她又把办公和开会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布置好各个房间,清点好报纸、杂志,整理好那一袋袋的资料,已经是下午了。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回来,外面来过几班人找他。这些日子,他身兼数职,工作更加繁重了。他除了担任书记外,还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在日程上安排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根



据党的一大方针，迅速推动全省的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他整天顶风沐雨，深入工棚、车间、矿井，找工人谈话，他来往于自修大学、文化书社等地找骨干接头。他派出党的干部，到外地发展党、团组织。另外，因为他的公开职业是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所以还要到一师师范部去教课。

杨开慧到门口望了几次，不见人影，杨母只好把饭菜焖在锅里。

直到黄昏时分，毛泽东才回来。他走进屋子，看室内外井井有条，十分高兴，忙说：

“开慧，你同妈妈忙了一天吧！我没有帮忙，不怪我吧？”

杨开慧笑着说：

“等你帮忙，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杨母说：“饭菜都凉子，快吃吧！”

“累了妈妈真不好意思。”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吃了一顿团圆饭。

吃完晚饭，毛泽东嘱咐杨开慧准备椅子和油灯，要在堂屋开座谈会。

当夜幕笼罩大地的时候，开会的人三三两两地沿着菜畦小径，来到清水塘。他们中有工人、有教员、还有店员、学生。会议内容是研究开展工人运动问题。杨开慧给每个人泡上茶，然后坐在门旁一



边听、一边记下座谈的重点。

散会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又回到煤油灯下开始了新的工作。毛泽东伏案写文章、起草文件，杨开慧整理报纸和各地来信。

数九寒天到了，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毛泽东常常通宵工作。杨开慧担心他深夜着凉，睡前总要弄好铜汤壶，备好烘笼，上好热水瓶，把准备好的饭菜暖在锅里。

有一天，毛泽东从新河火车站访问铁路工人回来，已经是深夜了。他看完杨开慧整理好的材料，又开始紧张写作。杨开慧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灯下凝神沉思，便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去，为他的烘笼加点炭、热水瓶里添些开水，然后从锅里端出热喷喷的饭菜，送到桌上。她怕打扰他的思路，没有叫他，便又睡下了。

鸡叫头遍的时候，杨开慧睁开眼，望见毛泽东仍坐在窗前。他全神贯注，挥笔不停，摆在桌上的饭菜一动也没动。门外的北风却刮得更猛了，开慧翻身下床，轻轻地给他披上棉衣，毛泽东这才搁下笔，深情地说：“你快去休息，不必为我多操心了。”

过了一会儿，当杨开慧再次把凉了的饭菜重新热好端到桌上的时候，毛泽东发现她还守在身边，惊讶地问：“霞，你怎么还没睡？”



她指着饭菜轻声说：“你不吃，我睡得着吗？”

“好，我吃！”毛泽东的确饿了，端过那一碗黄辣椒蒸小鱼，吃得津津有味。

杨开慧见他吃得那样香，甜滋滋地笑了。

白天，杨开慧的工作繁重而复杂，她却总是处理得有条有理。

毛泽东订了许多种报刊。杨开慧遵照毛泽东的要求，逐日细看，剪下有用的材料。每天坚持看报、剪报，为毛泽东分析问题提供有用的资料。

来自全国和全省的革命同志，工友农友，要找毛泽东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由她先接洽，摸清真相，分出轻重缓急，然后再安排毛泽东会见的时间、地点。

她常常冒着风雪，奔走在湘区区委的各个秘密联络点，送去毛泽东的指示和党的文件，带回社会动态和各种情报。

她还得挤出时间到船山学社，找何叔衡商量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工作。有时还去上课，或找夏明翰研究省学联合会的工作。

她在清水塘担任交通联络工作的这些日子里，面对赵恒惕军阀政府的白色恐怖，面对长沙市的满街鹰犬，工作是那样的大胆，又那么细心。一些秘密文件，需要送到或通过危险地区时，她总是亲自



毛泽东与杨开慧

MAO ZE DONG YU YANG KAI HUI

去送。她机智、从容，着一身普通妇女装束，带着一包书或一包衣服，将机密文件夹在里面，不露一丝痕迹。不管形势如何紧张，她总是神情坦然，履险如夷，从来没有出过事。



十二、岸英出生

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回到湖南，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2年5月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仍担任书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结合湖南实际，在1922年下半年，先后发动和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安源路矿、长沙铅印、长沙泥木等十多处4万余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形成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中，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与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活动，并取得伟大胜利。而毛岸英正好出生在罢工取得胜利的那一天。

长沙泥木工工作艰苦，工资低下。根据当时的规定，甲工每日铜元42枚，可折合银元3角，工资发的又是“鸟票”。这是湖南官钱局印的纸币，这种币经常贬值。1922年湖南全省又遭天灾，粮荒严重，物价暴涨，铜元贬值，工人干一天活儿的收入，往往只有1角多钱，连糊口都无法维持。当时，长沙有五六千泥木工人，其行会叫鲁班庙。鲁班庙由勾结官



府欺压工人的社会痞子把持,根本不让工人说话,因此要想维护工人利益,必先成立泥木工自己的组织。7月份,长沙泥木工要求增加工资,甲工每天银元3角4分,乙工2角6分,遭到长沙县署拒绝。

此时,毛泽东正在帮助泥木工人组织工会。毛泽东通过任树德等积极分子发动泥木工人,建立基层组织“十人团”。任树德是毛泽东交的第一个泥木工人朋友,为人老实,在同行中颇有威信。他常到船山学社做零活,毛泽东多次与他谈话,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到9月初,“十人团”发展到108个,会员1000余人。9月5日,泥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长沙木工会章程》,选举任树德为工会总务股主任。毛泽东起草的《长沙泥木工会章程》共18条,规定该会的宗旨是:

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

经过周密的分析和安排,罢工条件已备,机会已到,毛泽东准备开会具体部署罢工事宜。

这一天,杨开慧收拾完屋子,便走出清水塘的正门,坐在小丘旁边的樟树下,注视着通向这里的菜畦小路,等待着前来开会的工人们。这时的杨开慧已怀孕10个月,繁忙的工作,艰苦的生活,使她的身体显得瘦弱,精力也比平时差一些。尽管毛泽东多次嘱咐她要注意休息,但她还是坚持工作着。尽



量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以减轻毛泽东的负担。

不一会儿,菜地里出现几个穿草鞋的工人,泥木工会的负责人任树德、朱有富等都来了。杨开慧招呼大家赶紧进屋。



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油画) 朱辉 作

大家围着一盏煤油灯坐下,泥木工人罢工决策会开始了。先由任树德汇报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朱有富等人谈了社会上对泥木工人要求提高工价的反映。大家一致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决定明天开始全体罢工。在毛泽东的细心指导下,大家就如何成立罢工委员会,散发罢工宣言;



如何推定纠察员、维持秩序；如何通电全国，伸张公道，向省议会请愿，都一桩桩一件件做了具体研究。会议连续开了好几个钟头，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罢工宣言才结束。杨开慧在外面放哨，不顾夜寒风冷，一直送走最后一名工人才回到屋里。

第二天，轰动全城的泥木工人大罢工开始了。所有建筑工地都停了工，连省长公署和外交署准备庆祝“双十节”而进行的“扎牌楼活动”也停工了。长沙城里一片冷冷清清的景象，大街小巷，到处都能见到泥木工人张贴和散发的罢工宣言书。

不少人在那里读着：

……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贍眷……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当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决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削……

泥木工人的纠察员在整队游行。他们高举“坚持罢工”、“请求各界援助”的旗帜，通告全市泥木工人遵守工会统一命令，不要自由行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纪律性。



罢工在继续，斗争十分激烈。长沙县署在继续顽抗。各地声援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来。如北京长辛店、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长沙织造、缝纫、印刷、笔业等行业工人来信来电予以支援。为了取得罢工的胜利，毛泽东对罢工的每一句口号、每一项要求、每一个步骤，都有周密的考虑，具体的部署。白天，他在泥木工人中进行组织发动；晚上又邀约罢工委员会的成员秘密开会。杨开慧也一样，把整个精力都投入到这场罢工斗争中。白天，她把毛泽东对罢工的部署传给各个联络点；夜晚，她冒着秋寒，为毛泽东召开的秘密会议站岗。她的脸面更消瘦，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两腿发肿，脚背隆起，行动也感到不太方便了。但是，她却悄悄地掩盖着，以免毛泽东分心。

23日这一天罢工达到高潮，由于长沙县署无理拒绝工人要求，毛泽东亲自指挥4000多名泥木工人在长沙教育会坪集合后，浩浩荡荡地朝长沙县公署进发。工人们举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的横幅，还举着写有“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字样的标语牌。队伍两边有1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维护秩序。身穿旧对襟衣、工人模样的毛泽东，走在队伍中间，不时领着大家喊口号。请愿队伍很快到了县衙。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下半夜，当局才决定，



第二天下午在省政务厅召开工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罢工斗争出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斗争到了关键时刻。

而这时，杨开慧怀孕也到了关键时刻。22日上午，毛泽东大清早便赶到船山学社去了，他要召开紧急会议，商量组织4000多工人到长沙县署请愿的事情。吃过早饭，杨开慧就感到不舒服。她靠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却越感到身体不对劲儿。妈妈知道快要生了，急得团团转。家里总要有一个照顾，自己分不开身，不能送开慧进医院，润之又不在，怎么办呢？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有一位女友来看杨开慧，急忙雇人力车，把她送进了湘雅医院。

经检查，杨开慧是难产，可能要动手术，动手术必须家属来签字。

杨开慧心里清楚，此时的毛泽东工作更加繁忙，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罢工的胜利或失败，关系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关系着几千工人的命运，关系着几千个家庭的穿衣吃饭问题，这个时候怎么能打搅他呢？想到这里，她忍住疼痛，勉强抬起头来，对那位女友和医生说：“不要去找他吧！他很忙，你们随势决定就是。”

医生叫李振翩，参加过这新民学会和驱张运



动,和杨开慧很熟,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能来医院不得而知,于是他安慰她说:“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只要他来看一看签个字就是。”

“不,一分钟也不要耽误他,他有要紧的事。”

杨开慧又着急又不便说出毛泽东不能来的真实理由,经过杨开慧反复劝阻,医生不再坚持了。

但是,毛泽东还是知道了。23日凌晨,天还没有大亮,毛泽东一副工人打扮,急匆匆赶到医院来了。他进门就是关心地询问杨开慧的情况。随即走到床前,用手摸一摸杨开慧的前额,亲切地望着她的脸,显出很不放心的样子。杨开慧见他两眼网着血丝,眼窝发黑,轻轻地摇着头说:“我不要紧,你快去办你的事吧!”

毛泽东看见她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战胜困难的信心,便安慰杨开慧好好休息,建议医生最好不要做难产手术。他又托咐那位女友多加照顾,便匆匆离开医院,飞步赶到泥木工人的请愿队伍里去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亲任首席代表,领着十几位工人代表大步走进政务厅。当政务厅长吴景鸿摆出一副臭架子,打着官腔指责工人罢工是违法行为时,毛泽东当即翻开随身带来的“省宪法”,理直气壮地指着其中扮饰民主的条文说:



“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飞涨，我们6000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家属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依法请求提高工人工资，犯什么法呢？”

毛泽东的一席话，问得吴景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是，吴景鸿毕竟是个久经官场、老奸巨滑的家伙，他发现眼前这位工人代表讲话头头是道、句句有理，于是眼珠子转了几转，皮笑肉不笑地问道：

“先生贵姓，你究竟是什么人？”

毛泽东随便答了个姓，接着镇定自若地朗声回答：

“先生问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对不起，改日再谈吧。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价问题。”弄得吴景鸿狼狈不堪，陷入无言以对的窘境。

经过一番艰苦、激烈的斗争，当谈判进行到下午8点时，官方被迫接受了罢工条件，持续了19天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而此时，杨开慧在湘雅医院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毛岸英，没有动手术，母子都平安，一家人都很高兴。这一天是1922年10月24日，对毛泽东和杨开慧来说，真是双喜临门。



十三、婚后分离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以后，两人以党的工作为重，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两人心心相印，相互关心，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哪怕是很短分离。但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工作的要求，暂时的分手又是必须的。

毛泽东代表省工团联合会与时任省长赵恒惕的斗争，促使他婚后第一次离开杨开慧。

1922年11月11日至13日，时任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毛泽东率领11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等23人，会见省长赵恒惕，就政府对工界的态度、工人集会、结社、信仰等问题同赵恒惕及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等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省工团联合会是11月成立的，当时湖南全省工人运动非常高涨，全区已有13个工会、会员3万多人，绝大多数工人都参加过罢工，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优秀工人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放在一些工会中任主要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决定把各行业、各产业工会联合起来，成立全



省工人统一组织,以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11月,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四个铁路工会,在新河成立粤汉铁路总工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各工会都派代表参加。成立大会通过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随即,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代表粤汉铁路总工会出席,并推举为会议主持人。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讨论通过由毛泽东等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干事局总干事,并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之事通知全国。省工团联合会议成立以后,中共湘区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针对赵恒惕当局对工人运动的诬蔑,决定派代表利用湖南省宪法,向省政府及赵恒惕作论理斗争。

赵恒惕,衡山人。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走后,赵恒惕和谭延闿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长沙,两人共同主持湘省军政,后与谭延闿争权,湘军内讧,逼走了谭延闿。从此,他成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大权独揽,割据一方。为了收络人心,赵恒惕颁布了省宪法,规定民主与自由。同时,又玩弄手段,限制人们尤其是工人的自由与权利。因此,毛泽东组织工人同赵恒惕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说理斗争。12月11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各工会代



表 23 人来到省府。在赵公馆的大厅里,赵恒惕高高在上,在赵恒惕左面陪坐的是周瀛干、警察厅厅长石成全、政务厅厅长吴景鸿。《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对这次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毛泽东不卑不亢,神情自若地提出他们的要求:“第一项,请政府表明对工界的态度。我们认为,政府对工人罢工非常反感,因此才有黄爱、庞人铨被杀之事。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对工人自然是个损失,但实际上,它对政府所造成的损失更大,工会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反而越封越多,不怕死的工人领袖也越杀越多。到现在已经有了 20 个工会,几万会员,政府要杀是杀不完的。这样做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招致了全国对政府的责难,这是很不明智的。”

赵恒惕做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政府冤枉啊!除了那次,我对工人全采取保护主义,并无镇压之意。近来工潮不少,省里并没有干涉,就是证明,但是无政府主义不行,怎能无政府?政府我不是在这儿坐着么?”



毛泽东认真记下赵恒惕的话。然后抬起头来对赵恒惕提问：“关于集会结社问题，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的和平集会之权。对此，省长怎么看？”赵恒惕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他想了想谨慎地说道：“省宪法完全有效。人民集会结社，只要是守法的，政府不加干涉。”

毛泽东又把他的话记下来，再次提问说：“那么请问，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这个团体是否例外？”赵恒惕干脆地回答：“不例外。”毛泽东紧盯着追问：“你是说它符合省宪法之规定，因此它合法？”赵恒惕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

毛泽东又把这些话记下来。然后他看一眼周瀛干，再看一眼吴景鸿、石成全，向他们微微一笑。毛泽东的问题其实质是对这些人的，赵恒惕当然不明白了。他的这些手下人从心里反对赵恒惕的回答，但是上司的话已经说出了口，他们反对也没有办法更改，他们只好吃个哑巴亏。他们坐在那里，回避着毛泽东嘲笑的目光。



这时,赵恒惕说话了:“诸位问我对工界的态度,我已经做了明确回答,现在轮到我了,我问工界对政府是什么态度?你们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赵恒惕提的问题,毛泽东是有备而来的:“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对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的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说全是违背事实。工人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对工人并没有什么利益。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的痛苦,常有种种劳工运动。这些运动都集中在要求增加工钱,减少劳动时间和改良待遇这三个方面。”

赵恒惕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追问了一句:“就这三个方面?”毛泽东点着头:就这三个方面。比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铅印活版工人罢工等等,都没有脱开这三件事,也没有打过无政府主义的旗号。”赵恒惕松了口气,连连赞扬道:“工人采取这种态度极为得当,知道你们不是不要政府,政府我也就放心了。”



毛泽东做事历来严密而周到，他听赵恒惕这样一说，就追问道：“赵省长所说的话，都已记录在案。我们打算向工友们公布，省长以为如何？”赵恒惕有些得意忘形了：“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没有想到毛泽东还有许多问题：“以下还有七个问题……”赵恒惕翻了翻眼睛，他本想赶紧把这些代表打发走，好回到内室里抽袋大烟的，他的烟瘾犯了，有些忍耐不住了。赵恒惕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流出了眼泪，急切地说：“你都一并提出来我听听”。

毛泽东看着这位省长大人的样子，脸上掠过一丝不屑的微笑：“第四个问题：工人与政府接头问题；第五个问题：设立劳资裁判所的问题；第六，人力车工会被警方摘牌的问题；第七，理发工会的营业自由问题；第八，笔业工会罢工拖延不决的问题；第九，机械工会的问题；第十，缝纫工会的问题。就这些。”

赵恒惕打着哈欠，根本就没有听清毛泽东到底说了什么，他的心思全在大烟上，他真有些受不了，不耐烦地摆着手：“算了算了，我都答应了，下去与吴厅长、



石厅长、周知事你们商议吧。”

说完，起身到后房抽大烟，左右下属尾随而去。

……

赵恒惕回味着刚才的会见杨景问：“这个毛泽东是他们那个工团联合会的什么人？”石厅长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于是他恶狠狠地答：“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

赵恒惕又转而问吴景鸿：“政务厅长，你说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简单吗？”他这一问，吴景鸿已经听出意思来了，赵恒惕觉得毛泽东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值得深究的，他巴不得给他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呢。听赵恒惕一问就无所顾忌地说道：“我认为很简单。这个毛泽东说话滴水不漏，没有一句多余的。口口声声不离省宪法，这明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一套嘛。而且他的目的全部达到了。”赵恒惕赞赏地说：“嗯！我琢磨也是。我明明白白感到他要把我引到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回答对他有利，结果还是上了当，顺着他的意思回答，像是吃了迷魂药。”



吴厅长一边继续讨好地给赵恒惕找台阶：“省长也是，不得已。今天他一提出省宪法，我就知道要上当了。也没有办法，省宪法是咱们自己订的呀！”这时，与毛泽东打过交道吃过亏的周瀛干有点得意了：“您跟他一打交道就明白了。这个人不简单吧？如果上次围攻县公署的时候抓几个正了法，也就没今天这事了。今天可倒好，不但没正了他们的法，反而被迫承认他们合法，还允许他们公开登报。”

赵恒惕被周某的幸灾乐祸口吻所激怒，撂下烟枪，瞪着眼睛大声说：“换了你，你敢说省宪法不算数，说他们非法？再说谁答应他们登报了？我只允许他们工友们公布。”周知事这时有些不知深浅地接着往下说：“他肯定会登报，到时候你一过问谁允许你们登报了？他准会回答说公布就是登报，登报才能公布。不信你等着瞧。”

警察厅长石成金插话：“别看他在省长面前彬彬有礼，其实他们这些‘在会’的人个顶个都是‘过激派’。他们得了外国的钱，到中国来搞无政府主义，一心一意



要推翻政府。就是这个毛泽东，领头闹工运动，一年罢工十次，胜利九次，失败一次，那一次还是黄爱、庞人铨搞了半截的。”周知事拍着手，像自己的话得到了证明似的：“听听！多可怕！对这种人严厉镇压真是不得了。”赵恒惕一摆手做出逐客的姿势：“好吧，你们各位忙自己的事去吧，对付毛泽东，我来想办法。”^①

赵恒惕真要对毛泽东下毒手了。

一天深夜，毛泽东正在清水塘家中起草文件，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杨开慧起身开门。郭亮敏捷地闪身进屋，随手带上门：“泽东同志，赵恒惕下了通缉令，要捉拿你！你已经给石成全下了死命令，石成全狗急跳墙了，你要避避风头，赶快！”

“噢……”毛泽东放下书，站起身，笑道：“我们上次逗了他一次，怎么，我们的省长大人这么不经逗，急了？”

杨开慧担心地看了毛泽东一眼，说：“润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你以为他是小孩子呀，你们哪里是逗啊，而是斗！他是军阀，他又不是不

^① 张天民：《青年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02~206页。



知道你两年前驱逐张敬尧的厉害,你们之间的斗是阶级争斗,是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的争斗,你还是赶快走吧!”说着,她从躺柜里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包裹,举到毛泽东的跟前。

“霞,我现在怎么可以走,这里还有这么多工作等着我。”毛泽东把包裹放回到床上。

杨开慧有点急了,说:“你是湖南党的领导人,你的个人安危关系到党的事业,我去坐牢,你也不能去,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吧,润之。”

毛泽东深情而感动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又看看正睁着一双眼望着自己的儿子,说:“岸英这小伢子都没有睡,这小家伙瞪着我,看来是和他妈妈意见一致的喽。”

郭亮说:“泽东同志,这儿的工作你就放心吧。刚才我们都做了研究和分工。你的安全很重要,绝对不能出差错,我已安排了人立刻送你走,送你的人就在门外。”

毛泽东想了想,说道:“好吧,这次就算我给他赵恒惕和石厅长个面子。算我落荒而逃吧。正好中央通知我近期去广州一趟,要开个重要会议,我就提前起程了!郭亮同志,湖南的工作,就多拜托同志们了。”

1923年4月,毛泽东离湘赴沪。据4月14日



湘区团委代理书记戴晓云给团中央的报告记载：“润之，少奇不日赴粤，开西全校会议。”即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粤汉铁路不通车，毛泽东绕道上海，随国际代表马林等自沪提前赴粤，参加三大的筹备工作。

离湘前，毛泽东两次召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会议，向党中央派来湖南工作的李维汉介绍湘南工作情况和经验。

这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婚后的第一次别离。春色和煦，微风拂面，却似有秋的味道。毛泽东依依不舍地把搂抱在自己怀中的岸英交给杨开慧，又伸手为她理了理被风吹落在额头上的秀发，转身离开了清水塘 22 号。

1923 年 6 月 12 日到 20 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 31 号的一座两间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内召开了。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参加这次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个转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随后，中央委员会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开会，



毛泽东被推为中央局秘书。中央局相当后来的政治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

根据中共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也就是说,中央局的核心是委员长和秘书。这就意味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这时他正好 30 岁,而立之年。

中共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在工作之余,毛泽东常去谭延闿的住处。谭时任孙中山帅府建设部长。7 月由孙中山任命为湘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当时正为讨伐赵恒惕作准备。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谭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另一方面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采取“联谭倒赵”的决策创造条件。

9 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上海。不久,他又临时离开上海到湘南。16 日,毛泽东来到长沙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毛泽东回到清水塘家里,一家又团聚了。毛泽东这次离开湖南历时 5 个月,但对毛泽东与杨开慧



来说这次分离有点长,双方都要默默地承受着由于离别而带来的暂时的情感痛苦。毛泽东突然回来对杨开慧来说是一个惊喜,然而更让毛泽东惊喜的是大儿子毛岸英摇摇晃晃地学会走步,二儿子毛岸青也出生了。毛泽东对家中的两条“小龙”又是抱又是亲,别有一番父子情。

然而,这幸福的时光仅有短短的两个月。中央通知毛泽东回上海筹备并准备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已是深秋时节。夜深人静,月光如水。屋内烛光闪忽,毛泽东和杨开慧在窃窃私语,似有说不完的话语。

东方欲晓,半钩残月,悬照横塘。霜凝露重,寒风刮脸。毛泽东告别岳母,吻别岸英和岸青,由杨开慧陪着,离开清水塘,向火车站走去。他们依依不舍,但彼此都不作声,默默地、缓缓地走着,一直到火车站。杨开慧目送毛泽东上车,热泪潸然而下。火车徐徐开去,她站在月台上不停地挥手。她是在心痛毛泽东。毛泽东孑身一人在外,身边没有照顾,工作忙起来,就顾不上吃喝,顾不上运动,顾不上身体。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次毛泽东归来,消瘦多了,又在咳嗽,现在又要远行,实在让杨开慧放心不下。



此时此刻，毛泽东的眼泪也止不住夺眶而出。他身虽在车上，心却还在杨开慧身上。爱妻杨开慧上要敬母亲，下要养孩子，里里外外要操心，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在她肩上，实在于心不忍。前一阵子，因为误会两人还闹别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应该啊，但是为了革命事业，还得暂时割断儿女情长，与爱妻共勉。毛泽东坐在车窗旁，一边沉思，一边用笔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一会儿，一首献给妻子的情诗油然而生：

贺新郎

别友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①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
斜阳残照，暮鸦零乱，
红尽天涯花几许。正是旧愁欲醉，
乱红如雨。新欢却苦。几时住。
香篝灯下，
月明在，
渐如水。对别处。
曾是怨春未归，
此时悔春未归，
泪眼不曾垂。
东风知我欲东归，
送君千里，
应惜行人衣。

毛泽东《贺新郎·别友》手迹

① 此词于1978年9月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十四、迁居上海

毛泽东到上海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的通知说：“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候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会议决一致的主张。”就这样，毛泽东作为湖南的代表遵中央之命先来到上海。

早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并帮助中国国民党，并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阵线”的决议案》。8月，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和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

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派系林立、理想模糊、纪律涣散，屡次起义，均遭失败。为了联合力量，集中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加快中国革命进程,孙中山准备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接受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依照民主的原则,整顿和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云集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他的座位是39号。在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言,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议案发表意见申明自己的主张。毛泽东的表现显示出了其积极的参政意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订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最后,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他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当时他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代理文书科主任及组织部秘书等职。同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这项职务是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被任命的,此次



会议还决定，中共中央分设宣传、组织、工农、妇女等部。

至此，毛泽东离开妻子已达半年之久。现在上海工作，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工作之余，念妻盼子之情油然而起。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为了暂时的团圆，也是为了在工作上有一个好助手，毛泽东决定接全家来上海居住。

此时的杨开慧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快端午节前夕，她带着孩子——岸英、岸青和母亲，还有嫂子，从长沙坐轮船去上海。

嫂嫂李一纯是杨开慧的同学，也是挚友。她曾是周南女校的活跃分子，会唱歌、跳舞，还会演讲。向警予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同她很要好。李一纯同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叫杨展。现在，开智在北京上大学，李纯在家闲着，上月蔡和森、向警予来长沙，邀她去上海，到中央机关妇女部做文印工作。于是她跟杨开慧一家坐船到上海。

几声汽笛鸣，轮船靠了上海黄浦码头。她们从船上下来，老早就看到毛泽东在码头上张望。他还是那个样子，穿着长衫，留着向两边分开的长发，脚上是圆布口鞋，沉静的脸上流露出开朗的笑容。见面后，杨母说：“润之，到了大城市，你还是这样艰



苦啊!”

此时的杨开慧仍然剪着短发,穿着白布上衣,青布裙,脚上穿着自己做的青布鞋,一副文静、秀气的学生打扮。岸英能走路了,跑过来叫“爸爸、爸爸”,毛泽东双手抱走他,在额上脸上亲着。

杨开慧递过岸青,毛泽东抱着左看右看,在小脸上亲了又亲:“这是我的小岸青,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小岸青。”回头对开慧说:“你生岸青时我不在家,真是难为你呵。”

杨开慧笑着说:“往后你该照应着我们母子一些才是啰……”

一家人说着笑着来到住地。

慕尔鸣路,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这里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慕尔鸣路现在改为茂名北路。这里有一段全是两层楼房,临街一面大且都是拱形门楼,进去是一个个小里弄。里弄大都是麻石小巷,两旁是石库门两层楼,有的三门,有的四五门。

当时中央机关就在茂名北路与威海路口 583 弄的云兰坊内。这里过去称甲秀里,内有五幢房屋,他们就住在弄里靠南的一所房子里。

对毛泽东一家人的住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会计的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一书中有详



细的回忆：

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房子，用上海话说叫做两楼两底。我们决定找这个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居民以广东人最多，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有利，所以才定了下来。这个房子，楼上楼下大小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是住房必须有个户主，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有十口人常住。对外就说一家人，向警予为户主。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房子的前厢房。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抽出时间做了很多工作。

来到住地，蔡和森、向警予和罗章龙早在门口迎候，向杨师母问好。

罗章龙是浏阳县人，长沙一中的学生，杨昌济



教过他，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后来到北京大学读书，经常到杨家来，所以与杨开慧及其母亲很熟。

大家乐呵呵地安顿下来，向警予特地关照加了几个菜，为杨母、杨开慧和李纯洗尘。

毛泽东、杨开慧住在前厢房，他们把仅有的一张方桌抬到窗户下面，然后摆开两条长凳，上面搁上几块木板，铺上草席，将长凳的四角绑上四根竹竿，挂上夏布蚊帐，搭成了一张便床。夫妻俩又为孩子、母亲和嫂子另外开了铺。一家人就这样住下了。

晚上，两人坐在床沿上，杨开慧凝视着毛泽东，关切地问：“这回身子还好吗？看你，比在长沙瘦多了。”

毛泽东把杨开慧的手拉起来，摸了又摸，深情地说：“还不是老样子，只是最近身体感到不舒服，晚上睡不好。”

杨开慧笑着嗔怪道：“我早就说要来！你爱开夜车，生活上没有人照顾怎么行？”

毛泽东笑道：“好，好！现在你不是来啦！你放心，我身子结实得呢！”

然后，毛泽东向杨开慧介绍了一下这里的情况：这里是中央机关，“钟英”是代号。有机关刊物《向导》，蔡和森主编，一周一刊。文虎也就是罗章



龙,担任会计,掌管财务;警予为妇女部长,做女工工作;李一纯去妇女部搞文印;你在这里做资料工作,管报纸的传阅和资料剪辑。报纸每天由小王到几个信箱去取。小王叫王煦春,是个大学生,兼做机关的保卫工作。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兼中央组织部长。杨开慧听了笑道:“我一定服从你这位组



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右)、次子毛岸青合影

织部长的工作分配。好在警予姐在这里,我向她多学点。”在向警予的帮助下,杨开慧很快熟悉了情况。

三户楼里有严格的制度,不准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上街游逛,不到外面照相。只有杨开慧初来上海时,经过向警予的同意,例外地带



着岸英、岸青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这就是杨开慧右手抱着岸青、左旁依着岸英的那张母子三人照。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关于杨开慧的珍贵的历史记录。杨开慧来后,主动协助警予做一部分内务工作,杨母帮助烧饭。

一天,向警予来看望杨开慧,谈到上海小沙渡纱厂工人的情况:小沙渡是纱厂工人区,产业工人十分集中,党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邓中夏已经在那里组织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就是缺少做妇女工作的帮手。杨开慧自告奋勇,经常抽空到小沙渡去做些工作。

从杨开慧的住处到小沙渡,有一段长长的路,步行要走个把钟头。她白天协助毛泽东整理材料,吃罢晚饭,就和搞工人运动的同志一道,到工人区去了解情况。这里的工人比湖南第一纱工人还要苦,生活非常悲惨。日本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从农村里用一些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孩子。把他们当牲口使。这些被称作“养成工”的童工,吃的是猪狗食,做的是牛马活,每天上下班都由工头押送,住的地方有专人看守,不准和社会上的人接触,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满身脓疮,有的被折磨得像根枯草,实在干不动活儿了,便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厂门,倒在阴沟里死去。



日本资本家不怕羞耻地说：“在上海，找一百条狗难，找一百个工人容易！”

杨开慧来到纱厂女工住的“鸽子笼”里，看到景象更为凄惨。女工不敢结婚，怀孕就要被开除。有的女工怀了孕，为了不让日本资本家发现，只得用带子把肚子紧紧捆起，有的胎儿就这样被憋死。如果生下孩子，做母亲的女工第二天就得拖着虚弱的身子去上班，好多女工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拖死，即便养了小孩，上班时间也不能喂奶，因为资本家规定，不许工人停车，不准带孩子进工厂。看到日本纱厂工人的悲惨生活，杨开慧非常悲愤，她找到邓中夏，要求为工友们做点事。经安排，她到小沙渡工人夜校上课了。

工人夜校和沪西工友俱乐部在一起，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槟榔路（今安远路）口三间朝东的平房里。屋里设备很简陋，只在一块黑板，几张桌子，几条凳子。夜校北边是奔流不息的苏州河，对岸是一片荒凉的潭子湾。夜里，这一带冷冷清清，是侦探出没、流氓横行的地方。杨开慧不畏艰难，每周都要抽出时间去上课，风雨无阻。开头她讲湖南话，上海工人听不懂，她便耐心地一字一句慢慢讲，后来她也学着讲一点上海话，越发受到工人的欢迎了。杨开慧给工人夜校上课不是第一次



了,早在长沙搞工人运动时,杨开慧与毛泽东一起在长沙的新河给铁路工人办过夜校。这次讲课,杨开慧显得很熟练。杨开慧很生动地给工友们讲“工人”二字的含义。

“你们认识‘工’字吗?”杨开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工”字,教大家念一遍,然后她把毛泽东对“工”字的通俗解释告诉大家:

“这个‘工’字只有三画,意义却很深,上面这一横代表天,下面这一横代表地,中间这一竖就是我们工人阶级,不管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我们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一席话,讲得工人们心里热乎乎的,一个个都抬头挺胸,目光炯炯,脸上放出光彩。“工友们,继续往下学吧!”杨开慧在“工”字下面写了一个“人”字,叫大家念一遍,接下去就问:“你们看,如果把‘工’、‘人’两个字连在一起,是个什么字?”

认识的人就说,那是个“天”字。杨开慧点着头,提高了声音说:“对!只要工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就能做天下的主人!”

杨开慧在上海给工人上课除了用上述方法讲一些粗浅的革命道理外,更多的是宣传湖南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的情况。听了杨开慧的讲解,小沙渡工人



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工人们，特别是女工们，更加爱戴杨开慧。在夜校上完课，她们常常轮流伴送杨开慧回家。黑暗的里弄里，经常荡漾起热情的谈笑声。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会员发展很快，年底已达一千来人，一支坚强的工人骨干队伍迅速建立起来了。

这时，繁重的工作折损着毛泽东的身体。他既是中央局委员、秘书，又是中央组织部长，还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执行委员。党中央的重大决议和文件，由委员长陈独秀和他共同审阅签署。蔡和森主编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一周必须出一期。蔡和森一人负责，人手太少，这阵子蔡和森哮喘病复发，只得休养，担子全都落在了毛泽东的身上，他天天工作到深更半夜。杨开慧常常买些饼干给毛泽东充饥。

毛泽东在上海工作期间，有愉快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杨开慧及孩子来到身边，毛泽东生活上有人照顾，精神上感到充实，除去了对妻子和孩子忧虑。但是在工作上毛泽东却感到不快。

一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困难严重。国民党一大决定对国民党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只有重新登记审查同意的，才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在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党员多，成分复杂，有同盟会时



就入党的元老级党员，也有已下野离职的部长、省长、军长、师长等要员。这些人基本上分成仇视共产党的右派和与共产党实行联盟的左派。为争党权政权两派斗争非常激烈。毛泽东等共产党员成了国民党右派排挤、打击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在党内毛泽东与独秀在国共合作的策略上、在农民问题上有分歧意见，尤其是在农民问题上双方分歧更大。毛泽东认为几次大规模的罢工失败、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原因教训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能赤手空拳，孤军作战，必须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结成联盟，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才能解决。早在他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去中央工作前，他曾经派人到衡山做农民运动的试点工作。后来他在广东听彭湃报告海陆丰农民运动，很有启发。但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没有解决。陈独秀当时只注意同国民党的联合，着重搞统一战线，而忽视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只强调工人运动，忽视农民运动。每次中央例会，毛泽东提出革命同盟军问题——农民问题都遭到陈独秀拒绝。

毛泽东在两党内部都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再加上工作不顺利，心情不舒畅，终于积劳成疾。他的身体累垮了。杨开慧很为毛泽东的健康



担心,劝他回湖南休养一段时间。毛泽东熟悉农村,对农民有浓厚的阶级感情,也希望回到家乡,一边养病,一边做农民工作。正好陈独秀来看望他们,夫妇俩把想法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批准了他们的休养方案,并说:“蔡和森刚好出院,身体已康复,你把工作先移交给他吧。”

这时已经是岁末年初,临近春节了。毛泽东、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扶着杨母,乘轮船返湘。



十五、回乡“养病”

192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四),毛泽东、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回韶山来了。在这之前,毛泽东在长沙和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交换了工作意见,看望了许多同志,然后在板仓过春节。春节过后,毛泽民到长沙接兄嫂及两个侄子回家。

杨开慧第一次到韶山。沿路上,毛泽东、毛泽民兄弟俩不停地给杨开慧介绍韶山的情况。毛泽东说:

韶山冲是一个狭长的谷地,和湘乡、宁乡两县交界。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冲。四面群山环抱,峰峦耸峙,松柏长青。南边有十八罗汉山,西边有仙顶峰、石鼓寨、笔架山。对面还有黑石寨、八仙吹箫山、观音山、祝融山。树木满山遍野,再过两三个月,满山的映山红——杜鹃花就要开放了。各种山花会把青葱的山峦点缀得五彩缤纷。比起上海,这里多宁静,空气多清新!



杨开慧静静地听着。她对韶山的一切,都感到格外亲切和新鲜。毛泽民接过话说:“嫂子,你不知道,韶山是围绕南岳的七十二峰之一,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动听的故事哩!相传在唐虞时代,舜帝南巡带着妃子和大臣们登山游览,并在山上奏起了韶乐、仙乐,惊动了许多奇禽异兽,凤凰飞鸣着,麒麟欢舞,它们都向舜帝朝贺,为此,人们便把这里叫韶山。”

“啊,这就是韶山名称的来由!”杨开慧被这美丽的传说所吸引。

说着说着,他们来到韶山冲的上屋场。乡亲们听说毛泽东、杨开慧回来了,便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有平时很少出门的老婆婆,有没有出嫁的姑娘,还有年轻的媳妇。有的拿着新鲜蔬菜,有的提着糍粑,有的用围裙兜着鸡蛋,到上屋场来了。上屋场顿时热闹起来。男子汉们坐在横堂屋里,围着毛泽东亲亲热热地谈天说地。方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茶碗。灶屋里,一个上穿灰色粗布衣,下穿青色粗布裤的妇女忙着烧茶水,大家都以为那是临时请来帮忙的女工。婆婆、姥姥领着妇女们挤进灶屋,一边问候主人,一边睁大眼睛寻找杨开慧,当主人把那位“帮忙”的女工介绍给大家时,都惊呆了。



啊,原来她就是杨开慧!这位有学问的女先生,竟和乡下穷人穿戴差不多。她们真算开了眼界,彼此之间的距离很快就缩短了。

毛泽东回韶山时,正值春节期间。借春节农闲机会,毛泽东带着杨开慧,以“走亲戚”为名,到群众中访贫问苦。他们经常走在山林边,田边的小路上,坐在长工佃户的屋子里,跟贫苦农民亲切交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时,毛泽东的“病”也好了,他和杨开慧筹划在韶山办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办农民夜校。

由于穷,由于生活所迫,许多年轻人无钱读书,几乎是文盲或半文盲。为了宣传革命的思想,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毛泽东决定开办韶山农民夜校。

3月初,第一所农民夜校在毛氏宗祠开学了。杨开慧带着识字课本,来上第一课。

学生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的失学青年,很多已是种田的汉子,农村的大姑娘了。晚饭后,他们提着油灯,姑娘们手里拿着针线活儿,仨仨俩俩来到毛氏宗祠的课堂里。杨开慧先给大家发识字课本。这种政府印发的平民教育识字课本,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大家翻了翻就放下了。杨开慧拿起课本,告诉大家说:“今天晚上学认第一个字:人。”杨



开慧问大家：

“我们是什么人？”

大家齐声说：“农民。”于是杨开慧在黑板上写了“农民”两个字。接着，就教大家念一首歌谣：

农民苦，
农民苦，
打下粮食交地主；
年年忙，
月月忙，
田里地里仓里光！

大家跟着念了一遍，感到又好懂又好记，杨开慧一讲便讲到他们心里去了。整个教室里静悄悄的，原先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姑娘们也偷偷地坐在课桌边的凳子上。杨开慧用平静而有力的声音继续说：“‘人’字两边分，地主是人，农民也是人。没有农民的苦，哪来地主的富；没有农民的忙，哪有地主的粮！”

农民们不仅记住了字，更重要的是记住了杨开慧讲的道理。

杨开慧接着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手”、“脚”，教大家读了一遍说：



“每个人都有一双手，也有一双脚。我们用双手劳动，用双脚走路，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为什么种田的人没有饭吃，织布的人没有衣穿，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只落得两手空空？为什么那些地主老财有手不劳动，吃的是鱼和肉，穿的是绫罗绸缎？农民和地主都有两只脚，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脚不走路，出门要别人抬着走？”

农民们越听越觉得有理，越听越激动，有人站起来问：

“先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杨开慧很严肃地望着大家说：“要解放我们的手和脚。从前的人都说，是地主给了我们地，财主给了我们钱，是他们养活了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明白，是农民养肥了地主老财，他们是我们身上的蛔虫，是青枫树上的霍拉子，蛔虫和霍拉子都是专吃别人，养肥自己的。我们只有一条路，用自己的这两只手，去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洋财东，才能解放我们自己。”

杨开慧就这样，用具体的身边事实，深入浅出地给农民传知识讲道理，非常受欢迎。韶山地区的农民夜校很快发展到二十来所，杨开慧冒着严寒，提着马灯，先后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家祠堂和杨家庄等地方为夜校讲过课，得到大家一致好评。



第二件事——成立雪耻会。

这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斗争,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抓捕演讲学生100多人,随后万余群众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集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杀人,当场死十余人,伤数十人,捕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激起各界群众的义愤,湖南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6月2日,长沙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接着韶山、银田寺一带也成立了雪耻会分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秘密农民协会为中心,在各乡已建立的20多个雪耻会的基础上,发动成立了湘潭二区上七都雪耻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在成立会上,毛泽东讲述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介绍了长沙、湘潭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情况,号召韶山人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开展反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会后举行了600多人的游行示威,并组织了宣传队,开演讲会,编演节目,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漫画和标语,大造革命舆论。雪耻会还检查洋



货,烧毁鸦片,收缴烟枪等。

第三件事——成立韶山支部。

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根据以前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农村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几个月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培养下,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等很快成长为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



韶山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油画) 黄铁山 作

一个凉爽的夏夜,天上繁星闪烁,塘里蛙声似



鼓。在毛泽东住的那间屋子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大家都很兴奋，又有些拘谨，他们随毛泽东爬上小楼，杨开慧将最后一个人带上楼，招呼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坐下，然后从一本厚厚的书里抽出一张马克思半身像，拿出一面印着镰刀斧头的红旗，端端正正挂在墙上，做完这些，她朝大家笑了笑，便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掩上门，站在门口放哨去了。

小楼上，会议开始了。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以及在农村建党、开展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接着，由毛福轩介绍了庞叔侃、钟志申、毛新枚、李耿侯的个人简历，说明了培养他们入党的经过。在毛泽东的带领下4个人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向党宣誓：

努力革命

牺牲个人

服从组织

阶级斗争

严守秘密

永不叛党

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正式诞生了，大家公推毛福轩为支部书记，党支部对外联络代号“庞德甫”，



决定在银田寺建立合作书店,作为联络点。韶山支部开始了工作。

第四,开展平粿阻禁斗争。

到了7月份,韶山一带旱情十分严重,快两个月没有下雨了,稻田干裂,水塘干涸,树草枯焦,有的人拖老带小,挑着破烂的行李,外出逃荒了。

这些日子,毛泽东正在四外奔走,了解灾情。杨开慧也经常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情绪。当时,虽然韶山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有了党组织。但是,如果眼前的灾荒不能渡过,党组织就得不到群众拥护,革命活动也难进一步开展。如果能发动群众战胜灾荒,不仅能巩固已建立的党组织,还能把当前斗争推向前进,为韶山地区的革命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怎样发动群众战胜这场灾荒呢?毛泽东和杨开慧认为:现在地主豪绅趁火打劫,囤积粮食。只有发动农民起来同地主老财斗,才能解决粮荒问题。

大清早,毛泽东便出门找钟志申、毛福轩商量办法。3个人找了个避阴的地方坐下,谈起旱情。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坐等老天爷下雨,更不能幻想地主老财发善心,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组织起来斗争。”停了一会儿,他又笑着说:“谷米是有,就看大家敢不敢要?”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办法。他说:“地主老财囤积谷米,农民在饿肚子,我们可以发动农民反对囤积,要求平粜。土豪劣绅要偷运粮食出去卖高价,群众买不到自己生产的粮食,我们就可以发动群众阻止偷运。农民也有一张嘴,也要吃饭,公公道道出钱买来不算犯法。”毛福轩和钟志申听了,顿时心里亮堂起来,觉得现在正是发动群众与土豪劣绅作斗争的好机会。他们决定当晚就召开雪耻会的委员会,开展平粜阻禁斗争。

雪耻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派人找当时韶山大土豪时任团防局长的成胥生,叫他拿出谷米平粜;另一方面发动群众,监视地主老财,防止他们外运谷米。当得知成胥生有一批谷子运到银田寺,准备从那里下河,偷偷运到湘潭去卖时,毛泽东便指示庞叔侃、钟志申立即组织一批雪耻会会员,把那批谷子扣下来。

这天夜里,100多个农民,点起火把,带着扁担箩筐,将成胥生准备运走的谷子全部扣下来了。第二天钟志申和庞叔侃去找成胥生,斩钉截铁地说:

“谷子被雪耻会扣下来了,要钱就是六十文一升,不减价就让农民挑走,一个钱也不给!”

成胥生见农民力量大,来势猛,与以往大不相同,只好战战兢兢地答应了雪耻会的条件。这时的



团防局长威风已扫地。韶山地区其他的地主老财害怕得要命,主动找雪耻会,也同意拿出谷米平粜。这场轰轰烈烈的平粜阻禁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韶山所开展农民运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慌与害怕,特别是平粜阻禁斗争,他们更加感到毛泽东的厉害,他们一刻也不能容忍毛泽东。团防局长立即派人向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告密。赵恒惕下令湘潭团防局捉拿毛泽东。

8月的一天,毛泽东和毛福轩在谭家冲开会。会议开得正热烈时,毛泽建的哥哥毛泽嵘气喘吁吁地跑进屋,递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润之兄:

赵恒惕得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你接信后,火速转移。

这封信是湘潭开明绅士郭麓宾写来的。郭麓宾任湘潭县议员,一天,他在湘潭县长杨鸿仪的办公室看到了赵恒惕给湘潭县团防局发的急速逮捕毛泽东的电令,于是赶快写了封信,暗中差人送到



韶山上屋场。杨开慧得信后又派毛泽嵘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完信后,他向毛福轩交代完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工作,并对今后韶山的工作作了指示和部署。在群众的掩护下,经长沙去了广州。因为,此时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几次来信,诚聘毛泽东去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党中央也决定派他去广州开展革命活动。

为了继续毛泽东在韶山未做完的工作,也是为了掩护毛泽东,杨开慧带着孩子,继续留在韶山。在得知毛泽东已安全到达广州后,杨开慧带着孩子,于1925年12月16日离开韶山,经长沙去广州。



十六、南迁广州

毛泽东离开韶山,几经转辗,于1925年9月,到达广州。关于毛泽东从长沙到广州一路行程情况,当年与毛泽东同行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周振岳在1974年有一段回忆:

一九二五年我在湖南第一纺纱厂工作,夏天时(八月间),湖南工团联合会派我和庞叔侃等同志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郭亮同志对我说,你和毛先生一路走。毛主席、庞叔侃和我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从株洲坐民船到衡阳,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雇了一个挑夫给毛主席挑行李,就是一个背包和一个小皮箱,没带竹箱,从衡阳开始我们就走路了。毛主席很喜欢写东西,路上一休息就打开小铜墨盒子,用毛笔写起来。走到宜章又住了一个晚上。高静山告诉毛主席,这几天路上不太好走,赵恒惕的兵在到处搜索,前几天就抓走了三个学生杀



害了。毛主席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把他在路上写的东西烧掉了。从宜章我们走到了坪石,然后又到了韶关。在韶关我们见到屈子健。我们到了车站遇到一个老乡要到广州,正好没有路费,毛主席就答应给他钱,让老乡到广州。在韶关,毛主席一个人到了湘军整理处。屈子健送我们上火车后,他就留在韶关。^①

到了广州后,因身体极度虚弱,毛泽东住进东山医院,进行短期疗养。

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第一次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次是出席国民党一大,这一次则是急急匆匆逃亡广州。此时的广州已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中共在三大以后,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推动孙中山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并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统一战线,整编了国民革命军,因而促成了全国的革命高潮。毛泽东一到广州就感受到十分浓烈的政治气氛,街头到处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标语和宣传画。高举红旗的工农队伍不时地从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137页。



身边走过。无数革命青年怀着献身革命的愿望,从全国各地纷纷投奔到这里,广州真是一座革命的熔炉。毛泽东在医院稍作短暂休养后便投入到工作中去。

当时,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国民党二大),毛泽东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与汪精卫、陈孚木一起负责起草宣传问题议案。汪精卫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陈孚木为广州《民国日报》的负责人。10月5日,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为由不再兼任宣传部长,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当日予以通过,并请毛泽东即日到部任事。就这样,国民党的宣传大权掌握在非常善于搞宣传鼓动工作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利用这块阵地大显身手,其得意之作是创办《政治周报》。

《政治周报》是这样产生的:五卅运动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和地买办阶级进一步相互勾结,加紧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日益激烈,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国民党右派,极力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林森、谢持、邹鲁、张继、叶楚傖等在北京西山碧云



寺孙中山灵柩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所谓“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反动决议，以后又在上海成立所谓“中央党部”，这就是西山会议派。与老右派猖狂活动的同时，还出现了戴季陶、蒋介石等新右派。他们也竭力制造舆论，准备夺取革命领导权。

为了反击国民党新老右派的猖狂进攻，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以国民党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亲任主编。他以《政治周报》为阵地，写了许多文章，对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斗争。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问世。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
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政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



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①

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周报》的主编,同时也是主要撰稿人。在第一期上,除了发刊词以外,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右派在宣传中提出的反共、反“赤色帝国主义”两个主要运动口号,还写了许多文章,如《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颂声来于万国》、《邹鲁与革命》等,在第二期上还写了《赤化原来如此》等杂文。同时,毛泽东还在《政治周报》发表了一批分析资产阶级各派,以及我们对其政策的文章。其中主要有《向左还是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

^① 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清楚地告诉人们：

第一，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

第二，“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是资产阶级的右翼的政治代表；

第三，国民党右派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

第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由其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

第六，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

毛泽东的这些文章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资产阶级各派的阶级本质，对于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于维护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5日创刊到1926年6月5日停刊，共出了14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只有半年，但影响却十分广泛。它在广州、上海、北



京、开封、重庆、昆明等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及香港都设立了分售处,每期发行约4万份,是当时销售量很大,很有影响的刊物,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对于这个刊物,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

我担任了《政治周刊》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①

另外,在广州期间,毛泽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蒋介石是国民党新右派的典型代表。毛泽东在广州期间,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反共的阴谋事件。针对这些事件,毛泽东进行了坚决斗争。一是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下令调由共产党员李之龙任舰长的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抵制黄埔后,又造谣说中山舰擅自到黄埔要轰炸黄埔军校,赶走蒋介石,随即蒋下令逮捕李之龙,并围攻苏联顾问办事处,采取了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44页。



一系列针对共产党员的行动。此事件史称“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信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极力主张给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坚决回击。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茅盾后来回忆说:

中山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同我谈起大局形势,记得主席说了大体是以下的一些话:蒋介石现在掌握的實力唯第一軍,而第一軍的下級軍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有覺悟的,就省城而言,蔣的實力是大的,但就全局(指粵、桂兩省及第一軍以外軍)而言,蔣的實力是小的。他此番製造中山艦事件,向我們突然進攻,一是威脅;二是試探。我方示弱,他就要得寸進尺,我方強硬,他就要知難而退。故我方萬萬不能示弱妥協,要堅決同他鬥爭。毛主席還極力主張“把我們當時掌握的武裝力量集中在粵、桂邊境某地(我忘其名),同時說服國民黨左派撤出廣州,爭取第一軍外各軍(他們同蔣本來有矛盾)反蔣,至少使他們中立,名正言順地聲討蔣背叛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以武力對武力,逼蔣下



台,削除他的兵权……假若我方退让,则他们会由于蒋的利诱和威胁而倒向蒋。”^①。

毛泽东积极将上述意见和主张向苏联军事顾问团代表团长季山嘉和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长子)提出。但是,季山嘉坚决反对,陈延年犹豫不决,说“不敢做主”,要“请示上海中央”才能决定。最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接受,相反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从而使蒋介石首先顺利地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

中山舰事件后,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了共产党员 250 多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极力建议把这批党员派到其他军里去,继续建立一些叶挺独立团式的军队,但是,陈独秀又拒绝了这一正确的主张。

二是《整理党务案》。1926 年 5 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等等。这是蒋介石企图限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

^① 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 1980 年《新文学史料》第 3 期。



地位、阴谋篡夺国民党党权的又一个严重反革命步骤。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去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议上讨论“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同时，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表决时，他也没有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何香凝、柳亚子。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的退让妥协方针，“整理党务案”最后还是被通过了。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便被迫全部辞职，毛泽东也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杨开慧和母亲携两个孩子也来到广州。住广州东山庙前街38号。这是一座简陋的二层楼房。砖墙、瓦顶，大门对着街道。楼下住的是萧楚女，楼上大小三间，毛泽东、杨开慧一家人就住在这里。《政治周报》通讯处也设在这里。

杨开慧来到毛泽东身边，除了生活上照料，主要是担任秘书，协助毛泽东工作。毛泽东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在杨开慧的协助下完成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写作于1925年12月1日，是毛泽东研究农民问题的第一篇著名的



文章。当时党内大部分人不注重农民问题,有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农民,有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毛泽东早就注意到农民问题,在韶山“养病”时,毛泽东和杨开慧就做了一些农民调查,这次来到广州,毛泽东对党内一些人,特别是对陈独秀不注意农民问题的态度十分不满。为了引起党内一些人的重视,毛泽东准备写一篇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杨开慧来到广州后,毛泽东先让她整理在韶山的调查材料。在韶山期间,杨开慧除了与毛泽东一起走门串户了解农民状况外,毛泽东去广州后,杨开慧留下来继续做农民教育与农民协会的工作,自然多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杨开慧很快将更好的材料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熬了几个通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草稿终于写成,然后交给杨开慧誊正后发表。杨开慧拿起草稿,伏案誊抄,一只脚则放在摇床



1926年,杨开慧在广州。



上,轻轻摇着快要睡着的岸青。稿件很快抄完了。但是,发表却经历了一番曲折。陈独秀反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一些意见,拒绝在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后来,直到1926年2月1日才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和3月13日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中国青年》第116、117期合刊上予以发表。

此外,杨开慧还协助毛泽东做一些教育和发动农民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在林伯渠主办的中国国民党政训班担任理事,讲授农民运动。当时听过课的一些老同志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

这年三月上旬,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杨开慧陪着毛泽东同志到讲习班的教室来了。她穿一件深灰色的粗布对襟上衣,下面是一条青布裙。毛泽东同志仍然穿着那件灰布长衫。今天,杨开慧除带着笔记本外,腋下还夹着一沓图表,走到教室门口,她先将那沓图表交给毛泽东同志,自己便走到门边一条长凳前,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课。接着,有好几个妇女走进来,坐在她身边。课堂是楠木搭成的,倒也宽敞明亮。学员们一排排地坐在条



凳上,全神贯注地望着黑板。毛泽东同志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十个刚劲挺拔的大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且用图钉在墙上钉好图表,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课。^①

到了6月初,北伐就要开始了,政治讲习班提前结业,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在杨开慧的协助下,从中选派了50个人回湖南做基层工作。这批学员出发之前,杨开慧随毛泽东看望大家,并且亲切地同学员进行交谈。杨开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醒大家思想上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要和那里的工人农民站在一边,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

7月5日,北伐军从衡阳多路进攻,杨开慧每天都要仔细阅读报纸,了解前线消息。据报道,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湖南已有6000多个乡成立了乡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00多万人,她把刊登这些消息的报纸不断地送给毛泽东,有时还激动地念给他听。当她接到8月29日的《湖南日报》看到关于平江战役的报道时,一

^① 《杨开慧》,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110~111页。



口气读了两三遍。那篇报道说,北伐军刚开始攻击,成千上万的农民便携带锄头、柴刀,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前线,杀死北洋军有两百多人。

这年10月,北伐军进入武汉。国民政府也准备从广州搬到汉口去。毛泽东调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去了上海。杨开慧结束广州的生活,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回到长沙。



十七、孙嫂相助

1926年11月,杨开慧回到长沙后,与母亲孩子一起住在长沙望麓园。

杨开慧回到长沙并没有闲着,她此时已怀孕六七个月,每天接待来看望她的同志们,耐心听取他们关于各地工农运动的情况汇报。

柳直荀、李淑一夫妇来了。柳直荀在省农协工作。他告诉杨开慧,全省有50多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100多万,去广州讲习所学习的50多名学员,回来后都在各县担任农运特派员。

郭亮、任树德来了。他们对杨开慧说,北伐军刚进湖南,湘区党委就动员广大农民直接参战。还组织了工人运输队,帮助运输物资。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准备邀请毛泽东回来指导。

王淑兰、毛泽建来了。王淑兰是区妇联主任,毛泽建在衡山一带从事农运动。两人告诉杨开慧,各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韶山一带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10多人,在韶山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潭特别区委。



杨开慧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高兴。另外,杨开慧还抽出时间去看望福湘女中和岳云中学的教师和同学。同学们变化太大了,大部分同学都出嫁了,有的嫁在革命家庭,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有的嫁给北伐军官,当了军官太太;有的嫁给地主阔佬,做了少奶奶。他们从不同角度,向杨开慧倾吐自己的心里话,表白对革命的态度。有一位同学的谈吐引起了杨开慧的注意。这是一位福湘女中的同班同学,在校时思想上进,曾参加过驱张运动,后来嫁一位北伐军官,出嫁后思想随之变化,对农民运动看不惯,见到杨开慧就诉苦,说丈夫在外打仗,农民却抄了她的家,指责农民运动太过火。杨开慧严肃地开导她:“这不能怪农民运动,土豪劣绅压榨农民才有今天的下场,你和你丈夫真要革命,就该站在农民一边。”

杨开慧把她所听到和看到的对农民运动的各种反映整理出来,供毛泽东参考。

毛泽东是11月上旬离开广州到上海的,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首先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农民运动,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1月底,毛泽东经南昌来到武汉,在汉口建立



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12月3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电请毛泽东到湖南对大会进行指导,电文称“敝会于东日开幕,现在讨论各案。先生对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回到长沙与杨开慧又一次团聚。



考察农民协会第一乡(油画)

毛泽东这次回湘,还有一项主要任务,即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以回击国民党右派、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地主豪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污蔑。而此时的家庭负担过于繁重,杨开慧既要照顾母亲,又要照顾两个孩子,而且杨开慧又有身孕,为了减轻杨开慧的家庭劳动,毛泽东



决定请个保姆,并委托人联系。

这一天,长沙城又被呼啸而来的北风推入了冰窖,9点左右,杨开慧正与丈夫在客厅接待一个来自农村的地下党员,忽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她打开,见来者是一个年约30岁的农村妇女。她个子不高,剪着短发,上身穿一件补缀了多处补丁的短棉袄,很干净,显然是刚换上的,下身是灰色长裤,也很干净,再往下看,一双大脚特别引人注目,见此模样,杨开慧心里已猜出几分。

“请问这里是姓杨的人家吗?”妇女彬彬有礼地问。

“是的。”杨开慧微笑着把妇女请进了家门,“我姓杨,你就是孙嫂吧?”

“我是的,我经人介绍来你家当佣工,你是我的主人,你叫我的名字好了,以后好呼唤。”孙嫂快人快语。

孙嫂叫陈玉英,湖南宁乡县坎塘人,出身于一个“讨米世家”,父母终年沿街乞讨,陈玉英从小就做童养媳,婆家姓孙,故被称为孙嫂。

“不,你年纪比我大,我们都叫你孙嫂好了。”杨开慧让孙嫂坐在椅子上,亲切地说:“孙嫂,人是平等的,现在你来我家是给我帮忙的。我们不分主次,不分彼此,不分你我,我们就和姐妹一样,刚走



了那么远路,你先歇歇吧。”

孙嫂见杨开慧如此体贴一个满身泥土味的农村妇女,便放宽了心。

这时,毛泽东也走了过来。

“润之,这位就是孙嫂。”杨开慧先把孙嫂介绍给丈夫认识,然后又向孙嫂介绍说:“这是我先生毛润之。”

“哦,孙嫂你思想满解放嘛,头发也剪了,也没有裹脚,和杨开慧一个样。”毛泽东打量了孙嫂一下,风趣地说。

孙嫂来之前得知毛泽东是个大人物,夫人杨开慧也是一个出生于书香世家知书达理的人。听毛泽东说和杨开慧一样,觉得太不像话了,她忙摇摇头,微笑着说:“不一样,不一样,我一个粗人怎么能与杨先生一个样呢?”

孙嫂是从小在苦海里泡大的童养媳,长大后给人家当了十多年佣工,几乎每一家主人都把她当成下等人看待,而今这两位主



1956年,陈玉英与女儿孙燕合影。



人,却能如此平等、热情相待,她暗暗庆幸自己终于遇到了一对好主人!

孙嫂来到毛家,确实是一件庆幸的事情。毛泽东可以放心地赴外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了。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杨开慧为毛泽东准备好行李,两人畅谈至深夜。次日清晨,杨开慧冒着凛冽的寒风,穿过大街小巷把毛泽东送到江边。毛泽东离开长沙后,经过湘潭到了韶山,随后又去湘乡、衡山、醴陵。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农民运动有了深刻的了解,获得了为湖南农民运动鼓与呼的有力发言权。

孙嫂在毛家受到了一家人的看待。一天,杨开慧与平日一样,拿出一块大洋给孙嫂去买菜。孙嫂一回来就给杨开慧报买菜的价格,并把剩下的几个铜角子交给她。

“孙嫂,这零钱你留着,下回买菜再用。”杨开慧把孙嫂递来的钱轻轻地推了回去,“以后你买菜自己做主,不要这么详细告诉我。”

“这怎么行?”孙嫂不安了,“我是你家的佣工,我应该把开支一笔一笔地都向你报账才是。”

“孙嫂,我说过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既是一家人就应该互相信任。”

对杨开慧的信任,孙嫂真是非常感激。从此,



孙嫂真的把自己当作毛家人了。

快过年了，孙嫂的亲戚郭婶子来看孙嫂，并带来一只鸡，给孙嫂回家过年用。但是，郭婶子一走，孙嫂就把鸡宰了。

杨开慧见后不解地问：“孙嫂，你这么快就把鸡杀了，离大年三十还有七八天呢。”

“杨先生，我不回家过年了，我要在这里帮你，鸡给你补身子。”孙嫂边说边利索地收拾着鸡。

“这怎么行？我怎么吃你的东西？”杨开慧急了，回到屋里拿出钱塞给孙嫂。

孙嫂坚决不收，“你不是说我们是姐妹关系？既是姐妹，你就不要这个样子了。”

平等的对待，使得孙嫂非常愿意为毛家多做点事情。



十八、武昌安家

1927年元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2月12日,毛泽东从长沙到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2月底,举家北迁,杨开慧和母亲、孙嫂一起带着孩子们来到武昌,住在督府堤41号。

这是一幢武汉常见的黑瓦平房,外有一道灰色的围墙,里面有两个天井,天井两侧排列着十来间小房,毛泽东夫妇住进靠左边的三间房子里,前面一间他们夫妇住,当中一间是书房,后一间是杨母、孙嫂带着两个孩子住。

这是杨开慧随毛泽东第三次迁居外地。第一次迁居上海,住半年之久。第二次迁居广州,住近一年。毛泽东为了革命东奔西走,家眷只好随之飘荡。毛泽东有毁家革命之美名,也有携眷革命之佳话。杨开慧既是良母,也是孝儿,更是贤妻,她是毛泽东工作上的好助手,生活上的贴心人,毛泽东一刻也不想让妻儿离开自己。

毛泽东这次来武昌主要是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农民运动武昌讲习所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批准筹办的。邓演达、毛泽东、



陈克文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毛泽东是讲习所的主要负责人。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最早注意农民问题的人，是农民运动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他了解农民，有较为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被称为“农民运动王”。这次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又是毛泽东亲自联系而促成的。

在讲习所开学前，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了。

这篇文章的发表同样凝聚着杨开慧的汗水。

毛泽东住进督府堤的当天晚上，就伏案继续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润之，还有几天写完？”在旁的开慧一边为丈夫研墨，一边问。

“形势紧迫，我必须赶在这两三天内完成此稿。然后先交给《战士》周刊发表，以后再由《向导》和《中央日报》刊载。”毛泽东头也不抬，边写边答。

《战士》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中央日报》则是国民党中央办的日报，《向导》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那好，明天一早我就帮你誊完稿子，



直接交给报社发表。”说着开慧从案头拿过一小叠稿纸,就在另一张桌子旁坐下。

“开慧,你就要生孩子了。这事我来,你要好好休息。”毛泽东停下笔头,关切地说。

“没关系,我这是生第三个孩子,我生孩子很有经验了,不必担心!”

毛泽东见妻子如此从容,这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能帮忙的人。家里文件资料一大堆,找一个既要保守党的机密又能看得懂他字的秘书,委实难找。只好顺从妻子。

当夜,毛泽东由于心情激动,写到凌晨四点多才搁笔休息,但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又醒过来。当他刚睁开眼皮,突然发现身边的妻子不在了。“开慧”,毛泽东急忙下床寻找。他找到书房,见妻子已在书房挑灯抄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稿,目睹妻子娟秀整齐的文字,毛泽东情不自禁地称赞起来:“我的好秘书,抄写起来,真是又快又好!”^①

^① 邓燕:《骄杨泪》,华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80~281页。



文稿出来以后,正如毛泽东所言,先在《战士》周报上刊载,随后,《向导》、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开始连载,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出版单行本,5月和6月《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向报》刊印的《报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先期开课。教务主任周以栗,训育主任陈克文,事务主任柳季刚,秘书夏明翰。毛泽东主持领导实际工作。开学之前,各地农村来了一些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要求入学。但是他们文化低,入学考试成绩不好,工作人员问毛泽东收不收他们,毛泽东知道有些人有不同看法,便让杨开慧去了解情况。她和其他同志一起到学员住处,调查这些学员从事农民运动的经历,倾听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意见,征求他们对办好农讲所的建议。经过调查,杨开慧和同志们认为,这部分学员对农村情况熟悉,跟穷苦农民贴心,这些学员经过训练回到农村搞革命,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指示工作人员将这些学员收下。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正式举行,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



府及各团代表百余人,还有国际工人代表团,会议由邓演达主持,周以栗作报告,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讲话,法国、英国、美国的代表也相继演说,大会发表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这一天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忙了一天,没有回家。

然而,就在这一天,杨开慧住进武昌医院生了第三个孩子。事隔三天,毛泽东才抽空到医院看望。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后共生了三个孩子,每一次临产毛泽东都不在身旁,实在有点内疚,所以毛泽东一走进病房就说:“三天了,我都没有来看望你,真对不起!”

杨开慧撑着虚弱的身子,两眼闪着幸福的光,风趣地说:

“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这时陪在医院照料的孙嫂抱出才出生四天的小孩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孩子,并风趣地说:“让我来看看,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叼去吧!”

见丈夫高兴的样子,杨开慧也倍感欣慰:“当年岸英刚出世你就给他取名,现在这伢子出生四天了,你打算给他取什么名?”

“开慧你莫急,我前两天就想好了呢。”毛泽东好像怕自己的声音大了会惊了儿子,压低嗓子说:



“古往今来，天下做父母的都是望子成龙，我毛泽东也是一个吃五谷的人，我当然也是望子成龙嘛，因此，我想给三伢子命名为岸龙，开慧你以为如何？”

杨开慧满意地点了点头。第二天，杨开慧便出院回家了。

在武昌工作期间，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生活很苦，穿着很随便，毛泽东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没有替换的衣服，一件洗了只有等晾干再穿。有一次，孙嫂刚把白衬衣洗了，毛泽东要去上课，由于衬衣没有晾干，杨开慧要出去借一件，毛泽东说：“衬衣没干，长衫也可以穿嘛。”说完便穿上那件灰长衫上课去了。杨开慧的穿着也很朴素，经常是一身白粗布上衣。他们吃穿都很随便，从不讲究。

日子虽然很苦，但是，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对孙嫂很好。

初到武昌时，孙嫂不熟路，又不识字，搞不清街道地名。有一次，她上街买东西，走错了路，费了很大周折才回到督府堤。结果，中午饭也被耽误了。毛泽东和杨开慧没有责怪她，当知道是迷路后，毛泽东关心地说：“孙嫂，大城市街巷多，容易迷路，我给你想个办法，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就可以问路或请人送你回家来。”



说完,毛泽东便在一个白布条上写上“督府堤41号,陈玉英”。孙嫂外出时,随身带上条子。从那以后,孙嫂再也没有走错回不了家。

转眼间,到了4月份。此时,北伐革命取得节节胜利,而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关系却非常紧张。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工农革命群众,武昌形势陡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6日在武昌召开。毛泽东积极参加这次大会,并提出“迅速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提案。然而,陈独秀仍然坚持右倾投降路线,拒绝讨论毛泽东的提案。并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会上的表决权。一向忧国忧民的毛泽东此时的心情非常沉闷。一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登上黄鹤楼。看万里长江,烟波浩翰,望龟蛇二山,雾气迷蒙,粤汉铁路上的火车,鸣着嘶声的汽笛,长长的江汉码头,只显出一片模模糊糊的影子。毛泽东和杨开慧慢步并行,谁也没有说话,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忧虑,早已把两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此时的心情已无法用一般语言表达。毛泽东触情生情,随即赋诗一首: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仅是整个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开始。接着：

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2000多人。

4月28日，李大钊在北平惨遭杀害。

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

5月21日，长沙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这天晚上，何键部三十五军的团长许克祥，突然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等机关，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这一事件史称“马日事变”。然而，在毛泽东长期教育、组织下的湖南工人和农民进行了英勇的还击。几天之内，长沙附近的几个县的10余万工农武装拿着大刀梭镖，身背鸟枪，从四面八方涌向长沙，将长沙包围起来。被困城内的许克祥千把人吓得屁滚



毛泽东与杨开慧

MAO ZE DONG YU YANG KAI HUI

尿流,乱作一团。可是陈独秀却从武汉传来命令,要湖南临时省委立即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结果农民军一撤,反革命势力反扑,开始了全省范围内的大屠杀。同志们大惑不解,纷纷奔向武昌督府堤41号,向毛泽东寻求答案。



唤起工农千百万(油画) 陈衍宁 刘秉礼 梁照堂 梁器奇 作

从5月下旬起,杨开慧用全部精力来接待湖南的同志们,为了保密、安全,她打开督府堤通向长江边的后门,亲自把同志们接进来,又亲自将同志们送出去。找毛泽东的人越来越多,杨开慧总是热情接待,妥善地为他们安排住宿,很多人都住在汉口旅社,毛泽东、杨开慧还安排他们组织宣传队,分赴武汉街头,向广大群众说明湖南农民运动的真相,



揭露国民党右派的罪行,要求严惩发动“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说明形势指明方向,毛泽东和杨开慧来到了湖南同志们的中间。

这一天,武汉下着一场暴雨,江面上波涛翻滚,浊浪排空,狂暴的北风,冲击着门窗,压弯了树木,街上的一切活动都仿佛停下来了。这时候,有两个人撑着伞,蹚着泥水,顶风冒雨来到汉口旅社门口。他们走进第一间屋子,有人欢快地喊起来:

“毛委员!”

“杨开慧!”

躺着的站了起来,坐着的走了过来,亲切的招呼里带着忧愁,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脸色都很严肃,淋湿的衣衫往下滴水。大家都明白,毛泽东要与大家讨论重要事情。

杨开慧用手臂擦了擦额上的水珠,低声问道:“湖南来的同志们都在这里吗?”

杨开慧把大家召集来,安排就绪,自己便走到屋门口,警惕地看着院外。外面,大雨哗哗地下着,屋子里静悄悄的。一个关系到湖南党和革命前途的会议在风雨中开始了。毛泽东细心倾听大家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征询着他们对今后革命斗争的意见。当同志们谈到长沙马日事变时,许多人悲愤交集。毛泽东在听完大家的意见后,对当时的形势作



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马日事变客观上讲是国民党的叛变,主观原因却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现在,武汉的汪精卫正在同蒋介石加紧勾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悲剧很可能在武汉重演。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们再也不应该坐视等待,再也不应该对国民党对政府抱任何幻想了。我们必须大胆地领导工农群众去战斗!

雨小了,风还在吹。杨开慧向毛泽东轻轻地点点头。毛泽东站起来,坚定有力地对大家说:“同志们,马上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正如毛泽东所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悲剧在武汉重演了。7月15日,汪精卫撕下了国民党左派的伪装,在武汉又开始大屠杀。国民党军队到处在搜捕共产党人。

有一次,毛泽东单独外出,在湖北省农民协会门口碰到两个人,拦住他要找毛润之。他看见那两个人带着手枪,就故意停住脚步,从容地告诉他们:“毛润之刚刚从门口出去,向那边走了。”那两个人赶紧顺着毛泽东指的方向追去了。他却不慌不忙,大摇大摆走向另一个方向。回家后,毛泽东把这件事给杨开慧讲了,杨开慧更加对毛泽东的安全担



忧。每天早晨,毛泽东外出之前,她总要先打开房门,观察动静,每天夜里,不论毛泽东回来得多么晚,她总是等候着他。有时,毛泽东外出参加会议,她还亲自陪送。

由于形势紧张,毛泽东便安排杨开慧、母亲、孙嫂带孩子先离开武汉回到长沙板仓。毛杨一家人结束了在武汉的生活。



十九、依依惜别

杨开慧等离开武汉后，毛泽东留下来参加了一些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八七会议。

会议室设在汉口三教街 41 号（现为鄱阳街 139 号）英国惠罗公司的隔壁、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莫卓夫的寓所二楼。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为临时主席。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 21 人，毛泽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产生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有革命基础的湘、鄂、赣、粤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毛泽东留下在中央机关工作，被毛泽东婉言谢绝。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只好决定毛泽东为特派员回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并组织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于 8 月 18 日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内，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了改组后的



湖南委第一次会议,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的行动计划,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悄悄地回到板仓与家人告别。

此时已是夜深人静,板仓上屋杨宅屋前仍是蛙声阵阵,间或从屋后棉花坡山林中,传来一两声夜鸟鸣叫,使夜晚变得更加静谧。天上,繁星依然在围拱着银河,仿佛一条宽阔的银带穿过无垠的天际延伸开去。一勾瘦月悬挂在天空,愈加显得苍白,杨宅的屋宇在月光映照下,越显得清晰。

杨开慧正在油灯下看书,忽然听到后门传来连续四下的敲门声。不是幻觉吧?杨开慧的心跳加快,她侧耳一听,真的是与丈夫约定的敲门声。杨开慧顾不上穿好鞋子,踏着鞋摸黑跑到后屋开了门。见到一身农民打扮的丈夫,紧紧地抱住了他,好久才低低地喃喃地说:

“润之,你回来了!这么久,我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是啊,送走你才十几天,怎么就这么久?”毛泽东也用双手抚摸妻子的头,“我也是每天都挂念你和三个伢子呢。我们进屋去。”

毛泽东已是数次来板仓,第一次是学生时期来板仓谒见恩师杨昌济,第二次是新婚之后拜见众乡亲。而这回板仓只能与妻子秘密相会。杨开慧关



好门，拉着丈夫的手，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房间，她先给丈夫端来洗脸水，随之到厨房煮了碗可口的面条端给丈夫。大概是饿极了，毛泽东没几筷子就把一碗面吃了个精光。接着，他把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会议精神向杨开慧作了简要介绍。

“开慧，因任务急，也为安全起见，我天亮之前就得离开，到安源和株洲去组织秋收起义的军事力量。我这次一走，恐怕需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家里的事，就全靠你来承担了。”毛泽东深情地看着妻子。

“润之，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杨开慧依偎在毛泽东怀里。“要不是岸龙还没断奶，岸英、岸青还小，我真的想跟你一起去参加秋收起义。你不知道，我们分开的这十几天我多么难熬啊，我一天也不想离开你。”

“我何曾不想带你一起走？三个伢子都小，他们只能留下来，而他们都离不开母亲呀。开慧，你放心，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把心留给你和孩子们。不要在乎这一段时间，还记得当年我送给你的那首诗词的最后一句吗？”毛泽东说的诗词是指《贺新郎·别友》。

“记得‘重比翼，和云翥’。”

“是呀，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一句吗？”



当时我让你生气之后,心里非常难受,就写了这首词对你表示歉意,写到最后总觉得犹未尽,可一时又想不出更合适的字句来表达你我的夫妻之情。忽然我想到《尔雅·释地》中有一句‘一目一翼,相得乃飞’。还有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因此我就用比翼鸟来比喻我们的夫妻感情。现在临时分别一下,愿有一天会重新比翼双飞的。”

听到丈夫提到那首词,饱含了对自己缠绵缱绻的情感,杨开慧心里仿佛注入一般甜甜的蜜。她娇羞地抱紧了丈夫。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天快要亮了,他俩刚起床,母亲向振熙就已来到门口。

“妈,我昨夜吵醒您了吗?”毛泽东赶紧起身把岳母请进屋里。

“没有,没有,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向振熙十分欣喜地连连点头,“润之,你在武汉我们整天为你担心。此次回家,多住些日子。你在家多住一天,我们就少操一天心,少挂念一天呢。”

“妈,我马上就走了,您放心,我不会出事的。”

“这么快就走?你昨夜才回来了呀!”向振熙一愣。

“嗯,时间紧迫,妈,我这次出去,恐怕要一段时



间才能回来,有劳您对孩子们照顾了,您自己也要多保重。”

“你放心,我们都会照看好孩子们的,只是你要早去早回啊。”

“好了,润之,去看看孩子们吧。”杨开慧这么一提醒,毛泽东先看了看酣睡中的岸龙,轻轻拍了拍他的小脸,俯下身吻了一下,往岸英、岸青的睡房走去。这里是以前杨开慧的哥杨开智的卧室,现在孙嫂带着两个孩子在睡觉。两个孩子也许白天玩得太累了,他们睡得是那样的深沉、酣甜,连他们日夜念叨着的父亲此刻站在他们身边却全然不知。这边孙嫂也没有醒。杨开慧与毛泽东默默地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牵着手悄悄地走出房间。

“岸英、岸青这些天适应板仓的生活吗?”

“挺适应的,兄弟俩在这里比在武昌玩得更开心。”说到儿子,杨开慧脸上洋溢着母爱的光辉,“兄弟俩几乎每天都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尤其是大儿子,昨夜你回来之前还缠着我问你呢,说要听你讲孙悟空的故事。”

“唉,我这个当父亲的,欠孩子们的太多了。”毛泽东欣慰之余又有些内疚。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抓紧时间向杨开慧交代一些事情。

“开慧,秋收起义准备的比较仓促,胜负难定。再



则,今后的斗争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三个伢子能否在板仓平安度过这一段时间是我担心的,我建议:一、让三个伢子暂时都跟你姓,以避免敌人的耳目。二、你在板仓要多加小心,一旦有什么风声,就到亲戚家避一避,保护自己,孩子们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三、生活费我会想办法寄来,如果一时难以寄回或不足,你可以先向亲戚朋友借,以后我一并偿还。孩子们已懂一些道理了,你要经常教他们认字,给他们讲故事、讲革命道理。我小时候,读书较迟,后来又耽误了几年的读书时间,二十五六岁才读完一师,太迟了。岸英他们千万不能和我一样,如果我有三个三长两短回不来,你一定要送他们去读书……”

“润之”,杨开慧不知道形势如此严峻,以致从来从不啰唆的丈夫今天作了这么郑重的交代,特别是当她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时,她不禁地哭了起来:“润之,我一定要跟你去参加秋收起义,你一介书生却要舞枪弄棒指挥队伍打仗,我不放心,我一定要跟你去。你知道,我的生命,就是为你而生的,假如你死了,我一定跟着你去死;倘若你被敌人捉去杀害了,我一定跟着你去死,我和你共一个命运,我要陪伴你。”

“不哭,不哭。”毛泽东轻轻地拍着妻子的肩,“我刚才说的是最坏的打算,我的命还算大。你不



记得了,前些年张敬尧、赵恒惕不都要捉拿我吗?我还不是都化险为夷了?上个月在武汉遇险不也避开了?你不必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倒担心你的安全问题呢。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我走了以后,都得靠你呀。”说话间,岳母向振熙端来一碗“板仓茶”,煮了几个“太平蛋”,还煎了几块南瓜饼。毛泽东吃完早点,来到横堂屋向挂在正屋的杨昌济画像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在杨开慧的陪送下,从后门出去,踏上了吉凶难卜的秋收起义道路。



二十、暴动失利

告别了妻儿，毛泽东一路奔波，从长沙来到株洲。了解了一下株洲暴动的准备情况，又从株洲直抵安源。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潘心源、王新亚、蔡以忱等各方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缜密地研究秋收暴动计划，确定了起义部队的编制和进军路线，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起义部队共有3个团，第一团由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农民自卫军组成，其中包括湖北通城、崇阳的百余农军。钟文璋为一团团长。第二团以安源路矿警队，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加上安福、醴陵、萍乡、衡山农军，王新亚为二团团长；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军为基础，苏先骏为三团团长。以上三团合计43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

战斗部署是：第一团赴铜鼓与第三团会合，夺取浏阳县后直捣长沙。第二团由萍乡攻夺醴陵，歼敌后挥师长沙。第三团自铜鼓进攻浏阳，成功后进攻长沙。



安源军事会议后,毛泽东匆匆动身前往第三团驻地江西铜鼓。未料,走到湖南浏阳和江西铜鼓交界的张家坊时,被当地地主民团抓住,而且差一点儿被处死。好在毛泽东机警过人,一路上镇静自若、思忖着对付敌人的法子,终于化险为夷,渡过险关。

对这段历史,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作了颇为详尽的描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了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两百米的地方,我才得以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



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摇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脚底擦伤得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住处,又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①

毛泽东脱险后,直奔铜鼓县城起义部队指挥部。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秋收起义爆发了。

起义首先从破坏敌人交通开始。

9月9日这一天,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52~53页。



株洲的铁路线。

9月10日,长沙猴子石、新河、白水一带铁路、桥梁、水塔被炸,火车无法通行。

9月11日一辆军车被陷,界汉、株萍两路火车停开。

同时,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武装起来的农民,捣毁团防局,处决土豪劣绅,割电话线,有力地配合起义军的战斗行动。



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油画) 高虹 彭彬 何礼德 作

起义部队军事行动起初很顺利,醴陵、浏阳很快被打下。紧接失利接踵而来,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起义前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发动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14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量薄弱遭何键正规军的反攻,几乎全军溃散。



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终未能实现。

秋收起义失利,毛泽东不愿意把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起义队伍断送掉,便拒绝中央要他攻打长沙的命令,把所剩的 1000 余人的队伍带到文家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才通过毛泽东战略退却的主张,退向罗霄山脉一带的井冈山农村。

然而退却的道路也充满着艰辛和危险。部队进入萍乡芦溪时,遭江西军阀的伏击,伤亡较大,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牺牲。路上,1000 多人枪的队伍,笼罩着一片愁云。随处可闻不满和抱怨的议论声。有人甚至公开丢开枪支弹药离队而走。其中,还有些是军官。毛泽东心情也不佳,初次搞暴动就失利,又违背中央攻打长沙的指令而退向与长沙相背的萍乡。这如何向同志们和党中央交代。再加上毛泽东脚伤愈加严重,走路非常困难而又拒绝坐担架,此时的毛泽东既感到责任重大,又感到形势严峻,妻儿之事无法顾及,目前的燃眉之急是部队的去向。



二十一、井冈来信

秋收爆动在长沙地区造成很大反响，土豪劣绅怕得要死，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的小命被农民割去，反动军阀恨得要死，想寻找起义军一口吃掉。在板仓的杨开慧也在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她一边打听毛泽东的下落，一边在积极参加当地党组织的活动。处决李三胡子便是最有影响的一次。

李三胡子是绰号，真名叫李月桃，其儿子是湖北汉阳兵工厂的厂长。李三胡子仗势欺人，群众对其恨之入骨，便张贴出“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点了劣绅李三胡子的名字。秋收起义失利后，土豪劣绅开始反扑，李三胡子认为时机到了，便派人到处查对笔迹，扬言要抓人。杨开慧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找来好友郑家奕和板仓的地下党员缪配秋商量。

缪配秋说：“应当吸取马日事变的教训，不等敌人动手，先给他一个下马威！”

郑家奕也主张打击敌人的气焰，杨开慧欣然同意他们的主张，并做了具体安排。

这一天晚上，郑家奕带着几名农会骨干包围了



李三胡子的住处。他们手拿梭镖大刀，还带有两支枪，威风凛凛。睡梦中惊醒的李三胡子，吓得要死，战战兢兢地隔着门缝问：“你们要多少钱？”郑家奕告诉他：“我们不要你的臭钱，要你的命。”这时，大家早已按捺不住了，持枪的农会骨干向着李三胡子开了一枪，李三胡子栽倒在地。

镇压李三胡子的举动打击了土豪劣绅的气焰，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威风，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警觉，他们组织清乡队，大肆捕杀革命群众，杨开慧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杨开慧和战友们面临一场更加严峻的斗争。为了安全，在郑家奕的建议下，杨开慧准备去平江外婆家避一下，并将孙嫂叫来做了一些安排。

“孙嫂，今晚我有一事与你商量。”

“你有什么事吩咐我去办就是。”

“孙嫂呀，毛先生在外许久没有消息，那些坏人不仅要捉他还要捉我。”杨开慧哽咽着说：“为了免受牵连，你过两天就回家吧。”

“杨先生呀，千万不要这样说。”不等杨开慧说完，孙嫂就接过了话茬儿，“你和毛先生平时对我这么好，现在你们有难，我怎能离开你们？再说，岸龙现在还没有断奶，岸英、岸青都小，老太太手脚又不灵便，你一个人怎么撑得起这个家？我虽然是个粗



人,多少还可以帮你做些事,杨先生呀,杨先生,我实在不想离开你呀!”

“孙嫂!”杨开慧几乎哭出声了。“我……我也希望你能长期在我身边,可我……我要连累你了,而且……而且我已拿不出你的工钱了。因此,我还是请你尽早回家,和你的家人团聚吧。”

“不走! 不走! 杨先生,你就是拿棍子赶我,我也不离开你!”孙嫂紧紧握着杨开慧的手,连声道:“你就是被坏人抓去坐牢,我也要陪你一起去坐牢。你家里没有钱,我不要你的工钱。杨先生呀,你就让我留下来吧。等将来你和毛先生的事业成功,孩子们都长大成人,那时候你就是不让我走,我也会回家去的。”

“孙嫂! 你真是一个好心人呀!”杨开慧不禁流出了感激的热泪。

杨开慧外婆向氏家住在平江县和长沙县交接的一个名叫向砖厝里的僻静山乡,离板仓仅十余里路程。砖厝里向氏是一个书香门弟,在当地颇有名望。如今,杨开慧的外婆外公虽已去世,但她的三个舅父与板仓的姐姐向振熙一家始终保持着亲密来往。尤其是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因此,当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龙来到向家时,向明卿不仅出门相接,还特意收拾了一间清静、宽敞的房间安置杨开



慧母子。

年近五旬、文质彬彬的向明卿对外甥女说：“霞妹，现在外面风声紧，你就安心住在舅舅家吧，不要急。”

“舅舅呀，润之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写信给他，也不知地方，你说我能不急吗？”

“唉，当今世道，做好事总是难得好报，世道不公，世道不公呀！”向明卿连连摇头叹息道：“霞妹，情况即已如此，你再急也是无用，还是宽心等待吧，说不定过几天就有润之的来信了。你和润之的感情那么好，我想润之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把你母子挂在心上的。”六舅继续给杨开慧宽心。

杨开慧在六舅家住了一段时间，仍没有丈夫的音讯，想念之情非常迫切，白天常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晚上睡不着，一闭眼毛泽东的身影就呈在眼前，长期过度地思念丈夫，使杨开慧变得越来越憔悴，身体也感到不舒服。

向明卿夫妇见外甥女在自己家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愁出病来，慌了手脚，忙去乡里请了一个老中医。老医生一按杨开慧手脉，便说是因胸闷致气淤积而成，使胃肠出了问题。他给杨开慧开了几副草药，并劝她千万不能再忧郁下去，否则病难以治好。



杨开慧只吃了两副药病便有所好转。但是，她的精神仍是振作不起来，每天依然是愁眉苦脸，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向明卿见外甥女仍不开心，便托人买回一些报纸杂志，让杨开慧解闷。杨开慧一见报刊如获至宝，整天翻报，一是看能否找出一点关于丈夫的消息。二是解闷打发时光。一天，杨开慧在《京报》副刊上读到一个叫袁枚功的人写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说现在社会女权已高于男权。杨开慧认为该文章观点极不公道，便写了一篇题为《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予以驳斥，该文章称：

无意之中，看见《京报》副刊上的一篇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我才知道现在国民政府所许有我们者仍是一个不彻底的平等。但这绝对不是国民政府之过，是我们女子无彻底的要求之过。我不禁又要长叹惜了！要男女平等，必须先承认女子是一个“人”。因为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也有承继财产权。现在的办法，已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那么，分明说女子是附属于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



男子的人了。无须于父母的财产了。要知道承继财产权绝对不是须需要不须需要的,是“人”既有承继财产的事实,女子是“人”,当然是一样有这种事实!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来,我们来,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罢!必须达到女子不论结婚的与不结婚,和男子一样。有承继财产权目的,才能算得男女平等的法律。现在我们还在受附属品的待遇,而袁牧功先生还说女权高于男权,请袁先生先承认我们是“人”再来谈话罢。^①



这是杨开慧留给后人的唯一的一篇评论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寄出去。

一年一度的除夕又在眼前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杨开慧更是坐卧不安。但是,无论贫富,都要过年。这一天,雪花飘飘,北风寒吹,杨开慧在屋里正忙着,突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杨开慧仔细一听,忙说:“是孙嫂来了!是孙嫂来了!”杨开

^① 《骄杨》,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第 11 页。



慧顿时来了精神，赶紧迎出去。

“杨先生，有信了！有信了！这是你的信。”孙嫂一见开慧，就急不可待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高兴地说：“这是我今天一早去罗家铺取来的，你快看是不是毛先生寄来的？”

孙嫂送来的是一封辗转了两个多月才转到板仓的信，信皮已经磨破，地址很陌生：江西宁冈济世生药店。但这字体杨开慧一眼便认出来是毛泽东的字。杨开慧即刻百病全消，把信紧紧捂在胸口，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杨先生，你快看信呀，你怎么不看信？”孙嫂见杨开慧这个样子，赶紧提醒。

“孙嫂，谢谢你！你知道吗？这是毛先生的来信呀！最起码他是活着的，是记挂着我们的呀。”杨开慧终于克制住自己十分激动的心情，拆开信封。

信写得很大气又很匆忙，不像是在桌子上写的，几个字就占去了一张信纸的一大半：

我来药店，开始生意不好，蚀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

这寥寥数字，杨开慧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读了又读，看了又看，真是读不完，看不够，她赶忙将这



消息告诉儿子。

“岸英，你爸爸来信了，你爸爸现在平安无事了，你爸爸现在生意好做了！”

“妈妈，爸爸去做什么生意呀？”岸英高兴地问。

“岸英，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妈妈再告诉你。”杨开慧一手拉着岸英的手，一手握住孙嫂的手：“孙嫂，感谢你及时转来这封信！要不是这封信，这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说着两串晶莹的泪珠无声地从她的眼里夺眶而出。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止住泪水，高兴地说：“这封信，我可是天天盼，夜夜盼，今天终于把它盼来了，孙嫂请帮我收拾一下东西，我这就去跟我舅父舅母去拜别，咱们回板仓过年去。”

杨开慧高高兴兴地在板仓度过了 1928 年的春节。



二十二、相互牵挂

毛泽东写给开慧的信中谈到：开始生意不好，蚀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确实，毛泽东的“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

毛泽东起义队伍于9月29日来到永新县三湾村。三湾，地处九陇山下，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抱，树木葱郁。经过长途跋涉的疲惫之师终于可以歇歇脚了。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针对目前部队的状况，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全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皓、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一、三两营及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和辎重队；在军队内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过三湾改编，兵精将锐，面目一新，留下来的700多人跟着毛泽东于10月3日来到宁冈古城。毛泽东在古城的文昌宫书院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10月27日，毛泽东带部队到了茨坪，开始建立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此期间，毛泽东给杨开慧写一封



信,但是由于路途遥远,敌人封锁,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杨开慧手里。

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后,对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地方武装进行改造。先后攻克茶陵、遂川、永新等县城,并建立党组织和地方工农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井冈山革命根据搞得红红火火。



伟大的进军(油画) 潘世勋 冯椒生 作

然而,不管工作有多繁重,生活有多艰苦,毛泽东时常在挂念着远方的妻儿,通信是他们互相联络情感的主要方式。

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第一封信是通过罗家铺子转送的。罗家铺子是下板仓路边的一个小店铺,店主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板仓人,为了安全起见,两人约定来信直寄罗家铺子,每当“邮来周石林”的信,店主人



就知道,这是毛泽东用化名寄给杨开慧的信。

但是,在那个年代,转战在罗霄山脉的毛泽东要与杨开慧保持着通信联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通常要利用各种渠道、各种形式,经过许多周折,才能联系上一次。毛泽东使用化名和利用江西、福建党的秘密机关,有时将信直接寄往长沙,由杨开慧的舅舅收转。寄往长沙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下学宫街18号杨开慧的五舅,一处是西长街生生盐号杨开慧的表舅向朗卿,再由向朗卿转给六舅向明卿。每次的信都是大信封里装小封信,外头信封写下杨开慧舅舅的名字,里面小信封上写着“霞”或“杨霞”收等字样。信由进城贩布的邻居缪仲和带回板仓。

杨开慧寄给毛泽东的信,则由缪仲和带到长沙投邮,要在平江石洞时,就托付附近顾顺铺里的一名挑脚工人师傅将信捎到长沙邮寄。

杨开慧的信由邮局寄往江西井冈山下一个药铺,这个药铺是一个地下交通站,由交通站将信交给毛泽东。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杨开慧寄给毛泽东的信件不能直接邮往井冈山,她只好先把信寄到长沙、武汉、上海等地的亲友那里,再通过他们递送到毛泽东手里。杨开慧在信封上常写着这样一些地址:“长沙局关祠某号托某人再转交;或写上某某里弄某某号转交。”经过这些联络地点,再经过地下党



组织将信捎上井冈山。

通过这些复杂的交通网络,毛泽东与杨开慧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次,毛泽东由江西寄来一封内容很重要的信,盐号的账房先生收到此信后,不知内情,没有及时告诉向明卿,把信放在抽屉里几个月不转给向明卿。毛泽东久不见来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为了全家的安全,从此与杨开慧断了联系。毛泽东得不到杨开慧的消息非常着急。并多方打听,当他通过陈毅得知李立三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且知道毛泽民也在上海时,便给李立三去信一封,打听杨开慧母子下落。信云: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信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况。我大病三个月,现在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信,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毛泽东^①

^① 王村山等:《毛泽东书信赏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5页。



李立三接信后,立即找到毛泽民,了解杨开慧的情况后复信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给杨开慧写信。

毛泽东在牵挂杨开慧母子,而杨开慧更思念远方的毛泽东。

转眼间,到了1927年的年底,12月26日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杨开慧又该做什么了。这一天,杨开慧对孙嫂说:“孙嫂,麻烦你帮我到店铺买一斤肉,今晚我们做点好吃的。”说着把钱交给孙嫂。

孙嫂心里很纳闷儿,近来经济紧张,杨先生一个铜钱要当两个使,平时只买一丁点儿肉给孩子们熬汤喝,今天又不是什么节日,怎么舍得买一斤肉?

纳闷儿归纳闷儿,孙嫂还是把猪肉买回来了。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杨开慧亲自下厨,与母亲一起做红烧肉和炒菜,还下了面条。不一会儿,一人一碗红烧肉面就端上了饭桌。孩子们一见红烧肉都喜笑颜开,拿起筷子就大口吃起来。孙嫂虽然端着碗,却愣住了,想问个究竟,“杨先生,今晚为什么要吃红烧肉面?”

杨开慧对着孙嫂一笑,慢慢地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先生的生日。”

“怪不得……”孙嫂这才恍然大悟。



“这红烧肉毛先生平时最爱吃，面条代表平安长寿。咱们吃完面就能平安长寿。我们也祝福毛先生在外平平安安，长命百岁。”杨开慧诚恳地说。

夜深了，孩子们都睡了，而杨开慧怎么也睡不着，便走进书房，提笔写下《寄爱一》：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摆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方休。^①

杨开慧思念远方的丈夫，除了情感上的原因外，还有生活上的考虑。毛泽东爱开夜车，工作忙起来常听说不按时吃饭、睡觉，快到严冬了，有无御寒衣被，听说他的脚受伤了是否愈痊。杨开慧真想插上翅膀飞到毛泽东身边精心照料他，想到这里杨开慧经常彻夜不眠。在一首诗中，杨开慧真切地表达了其内心世界：

^① 邓燕：《骄杨泪》，华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60页。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落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①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情感联络全凭鸿雁牵，一旦通信不畅，杨开慧在情感上是多么的难受，她曾在日记式的《散记》中写道：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个晚上的时辰。十多天了，一月了，总不见来信。我检（简）直要疯了，我设一些遐想，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②

① 《骄杨》，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第 4 页。

② 陈冠任、冯光宏：《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杨开慧》（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版，第 541 页。



收不到毛泽东的来信是难以煎熬的,收到毛泽东的信却是十分狂喜的,杨开慧在《散记》中记载了收到毛泽东来信之后的喜悦心情: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检(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这几个小宝我终于不能去逃避。他终于有了来信了。我接着欢喜得眼泪滚流下来了。^①

^① 陈冠任、冯光宏:《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杨开慧》(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553页。



二十三、恐怖袭来

情感上的孤独在折磨着杨开慧的同时,生活上的困难也在考验着她。

毛泽东在离别之前,嘱咐杨开慧生活上该开支就开支,不要苦了自己,会寄来钱的。但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由于敌人封锁严重,再加上部队困难,官兵一致,没有薪水,毛泽东再没有给家里寄来钱。毛泽东曾给在上海的大弟毛泽民写信要求他给杨开慧寄点钱。后来,毛泽民主持的地下印刷厂被敌发现,便转移到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47号,创办了华新印刷厂。由于工作地点的变迁,毛泽民与杨开慧的联系一度中断,生活费难以寄到。

这样,杨开慧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连食油都买不起,眼下又值青黄不接的春季,板仓的许多农家都面临着缺粮食的问题,有的人家甚至断了炊。杨开慧的邻居缪三婶便是一家,她一家5口人,每天上山挖野菜充饥,眼下离收稻还有一个多月,再没有粮吃就要饿死人。看到此景,杨开慧对母亲说:“我们还有一些粮食,我今晚给缪三婶送一点米过去。”



“不是妈刻薄小气，当年你和润之要开办文书社，妈不是把你父亲的奠仪费全给了你了？现在我们家的谷仓也只剩下三四石稻谷了，这些粮食也仅够我们一家老小的口粮，要是给别人一点，我们也熬不到收稻时。”稍顿，向振熙老人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咱家也十分拮据，前两天孙嫂捉了几条小鱼，没有油都做不成，只好拿到火炭里煨熟后拌点盐给岸英三伢子配饭，岸英他们都小，说不定什么时候伤风感冒什么的，家里拿什么给他们看病？我还想节约一点口粮到时候换点钱急用呢？”

“但毕竟我们家米缸还有一些米，缪三婶婶她家一粒米也没有了，我们救济一点是一点呀！”

“好吧，我的女儿心地太善良了。”

就在这种粮食紧张到一粒米一滴金的情况下，杨开慧毅然为他人着想，救济了几户断炊之家。

情感上的孤独在折磨着杨开慧，生活上的困难在考验着杨开慧，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威胁着杨开慧，那就是白色恐怖。

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失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进了疯狂的报复，一批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1928年3月27日，历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曾参与南昌起义的工人运动领袖



郭亮,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后被秘密杀害,时年27岁。

3月20日,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在武汉被捕,5月1日被害,时年33岁。

3月20日,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夏明翰在武汉被捕。他在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壮丽诗篇后,从容就义,时年28岁。

5月4日,曾任湖南学校女生部部长、中共衡县县委妇女运动委员、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和她的丈夫担任中共衡山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的陈芬,在耒阳的一次战斗中双双受伤被捕。灭绝人性的敌人把陈芬的头砍下来,装在木笼里,挂在城门口“示众”,时年25岁。

8月20日,毛泽建也被敌人杀害,时年23岁。

以上这些牺牲的人士,不是杨开慧的朋友就是亲人,他们的死震撼着杨开慧的心灵,更激起她对丈夫安全的担忧。然而更震撼杨开慧的事情是伍若兰之死。

伍若兰,湖南耒阳人,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毕业,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2月与率领工农革命军



攻入耒阳的朱德军长结婚。1929年为掩护朱德脱险,将敌人引向自己而惨遭杀害。被杀害后,敌人把她的头挂城示众。

杨开慧是在湖南《民国时报》上看到关于伍若兰被害情况的,其中还有一篇欣赏人头的文章。

“世上竟有如此残酷无人性的国民政府和如此冷酷无情的作者!太可恨了!太无耻了!”杨开慧看完报后激愤地说。

“什么事这么生气?”母亲听到女儿的叫声急忙问道。

“一个好端端的女人被敌人砍头示众,居然还有人欣赏人头呢。”杨开慧不解心中之恨,将报纸往地上一摔,又用脚狠狠踩了几下。

“天地良心,这样的人的良心定是给狗吃了。唉……”

向振熙老人悲愤地叹了口气:“谁家的女子被没良心的人砍了头?”

“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她今年才27岁……”杨开慧又带哭音了,“她死得好惨,上个月底被抓住就砍了头,还把她的头挂在长沙城门口。”

“好狠哪!这些人不得好死,会遭报应的。”向振熙老人又愤愤地斥骂了一句。忽然她想到什么脸色陡然苍白起来,“你说的那个朱德莫非就是和



润之一起做事的朱德军长？”

“是……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杨开慧终于明白母亲联想到了什么，赶紧把话吞了回去。但向振熙老人还是抱住女儿哭了起来，“霞妹呀，你赶快到平江六舅家避难吧！坏人把朱军长妻子的头砍下来了，还能放过你？”向振熙为女儿的安全担起心来。

其实，杨开慧也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杨开慧已知道井冈山的“朱毛”早已是国民党反动派捕捉的“共匪”首领。伍若兰作为朱德的妻子已命归黄泉，我杨开慧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命运会如何呢？死神离我杨开慧还有多远？我杨开慧作为一个普通女子死不足惜，但我死后，3个年幼的儿子由谁来抚养？他们的生父润之现在四处打游击，每天都在与死神打交道，不能养活亲生儿子。他们的大叔毛泽民远在上海、天津，为党做地下工作，生活也很困难，无力收养3个小侄儿，二叔毛泽覃听说也跟他大哥上山打游击，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无法抚养3个小侄儿，把孩子托给毛家已不可能。杨开慧寻思着，突然想到一弟杨开明。杨开明尚未成家子身一人，来去自由，就让他收养3个孩子吧。想到这儿，杨开慧便提笔给杨开明写信告诉自己的想法：



一弟：

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栗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于）是乎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利（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上一个父亲，那不是有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自然地成长，而



不至于受到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杞忧堪噓，书不尽意，祝你一切顺利！^①

杨开慧给一弟杨开明写好信，还没有发出去，一个更大的噩耗向杨开慧袭来——杨开明被敌人逮捕。

原来，彭德怀率部上了井冈山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杨开明被任命为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被派到武汉负责重新组建党的工作。不久他在前往湘鄂西根据地贺龙部队工作时，不幸被捕，被押往长沙。

杨开明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板仓，整个杨家大屋似被闷雷击中，杨开明的母亲顿时昏死过去。

杨开慧强忍心中悲愤，筹划救人之策，她认为，北京名人蔡元培、章士钊是父亲的生前好友，让他们出面营救，或许有点希望，于是，母亲在哥哥杨开智的陪同下坐火车去北京找蔡、章二人。因为杨开

^① 《骄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9~10页。



明是杨昌济唯一的侄儿，杨昌济生前也很看重他。章士钊当即带上蔡元培的信件，乘飞机赶到长沙，多方活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碍于章士钊和蔡元培的面子，基本同意保释，但要求杨开明向国民党低头认错，并公开忏悔，方可出狱。杨开明坚贞不屈，誓不低头，何键便向他下了毒手。

1930年2月22日下午3时，在去刑场的路上，杨开明不断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何键！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敌人见他一路高呼口号，影响太大了，就残忍地用刀刺进杨开明嘴里搅动，直到把舌头搅碎，杨开明虽然喊不出声，还是昂首挺胸地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告别，最后牺牲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上。

杨开明的壮烈牺牲，对杨开慧的打击太大了，她也在做最坏的打算。她常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案写东西，她把自6岁起到28岁的经历都写下来了，在写到与毛泽东相识、相知到相爱时，她激动了，她这样写道：

……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



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共这一个命运！^①

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为病弱的朋友把他的情形
 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那相信他的单身生活
 非常成功。自从他完全了解了他对革命事业的
 使命，我有一个新希望，不觉得我是为他而生的
 理想像以前，他一天到晚都在想，我一定要跟着他去
 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共这一个运
 命。因为我的意志又要求下本来了。

写完后，她把平时写的《寄爱》等材料连同这个类似“自传”的东西用油光纸一层层包好，分几处藏在屋里墙壁的砖缝之中。她多希望如果一旦自己去世后，丈夫回来能看到倾吐其肺腑之言的书信啊！然而，毛泽东至终都没有看到爱妻对他的表白。1989年当地政府在修缮板仓旧宅时发现了藏在墙缝中的十分宝贵的杨开慧遗书。

1989年在板仓故居复壁内发现的杨开慧手迹

① 邓燕：《骄杨泪》，华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86页。



二十四、开慧被捕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队伍进一步扩大。继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之后,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部也来到井冈山。几万红军聚义井冈山,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总头子蒋介石坐立不安。他调集湘赣两省6个旅18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施第一次“会剿”。为了“围魏救赵”解井冈山之危,也是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朱毛”红军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建立人民政权,到1930年上半年,以赣南、闽西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央苏区逐渐形成。

就在这时,以“左”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人头脑发热,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条“积极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并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具体口号。为实施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各路红军纷纷攻向大城市。



首先攻克大城市的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1930年7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进行混战,湖南军阀头子何键将主力调至湘桂边界,长沙空虚。彭德怀乘此难得机会率红三军团1.7万人于27日攻入长沙。这是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占的唯一一座省城。后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何键进行疯狂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三军团在长沙只待了十几天便被迫退出。

长沙被红军攻克,让李立三高兴了几天。很快长沙又丢掉了,又使得李立三失望。此时,中央命令毛泽东和朱德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再攻长沙。

彭德怀退出长沙后在浏阳东北的永和市与毛泽东、朱德会师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这支扩大了“朱毛”红军根据中央命令再攻长沙。由于总体上敌人强大,工事坚固,而红军力量弱小又没有破城的有效武器,虽然红军勇敢作战,甚至采用了“火阵”,但围攻长沙半个月仍无法破城,反而遭受了重大伤亡。最后红一方面军只好撤出战斗。

红军两度攻打长沙,使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丢尽脸面。何键曾任“湘赣剿匪”总指挥,井冈山的朱



毛红军不但没有被剿灭,反而自己的老窝差点儿被“朱毛”剿灭。所以红军一撤何键便开始了报复,除了屠杀革命群众外,何键把报复的矛头指向了“朱毛”红军的总头领毛泽东:一是挖毛泽东的祖坟;二是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关于何键挖毛泽东祖坟的事,有以下传闻记载:

1930年10月,离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家都三年多了,反动派却突然记起韶山是毛泽东的老家,演出了一幕闹剧。

这日,秋风阵阵,落叶声声,韶山滴水洞的山脚下,来了两乘轿子,轿中走下韶山的劣绅、乡长李性恂和一个拿罗盘的风水先生。只见他俩鬼鬼祟祟在虎歇坪一带转了大半天。

这事立刻引起了周围农民的关注。晚饭后,大家聚集在毛佑生家里,猜测着李性恂和那风水先生的来意。大家议论纷纷。“哼,黄鼠狼逛鸡窝怕没有什么好事。”

“他还问我毛泽东的祖坟在哪里呢!”
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插进来说。



大家一听，顿时明白了李性恂的用心，同时又觉得此事有更大的背景。李性恂无恶不作，这个地头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

果然，此事大有来头。原来，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打得大败而逃。更使他恼羞成怒的是，彭德怀指挥的红军趁他的主力部队远离长沙，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际，竟从平江、浏阳一带突然杀出，消灭了他几个团不讲，竟一举攻占了长沙，不仅烧了他的省政府和四路军总指挥部，还差点儿要了自己的老命。要不是一个局的侦缉员事先了解情况，从前线溜下来，带着他逃到湘江河边，如按他原计划往省府跑，恰好落入红军之手，他在那个侦缉员的带领下，被马弁们前拖后推地拥着走，经北门外的环城马路逃到湘江码头，坐着小鱼船过了河，逃到河西的裕湘纱厂，才保住了一条狗命。

后来，他在蒋介石的帮助下，重占了长沙。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剿灭



红军。可剿灭红军又何谈容易，硬的也用了，软的也用了，可谓机关算尽，心计已竭，可还是没有个上乘之策。

这日，何键的拜把兄弟吴凯南献计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之所以猖獗，非实力之所攻，乃天荫之功。我听说韶山是舜帝南巡演韶乐的地方，灵秀非凡，想必是毛家得地灵之光，我们不妨派人到韶山挖掉他的祖坟，断他家的龙脉，那毛泽东的红军就不会有这样兴旺了。”何键连夸吴凯南的计策“高妙”，便派自己的副官处长熊道乾率一个连到韶山去挖毛泽东的祖坟。

熊道乾一行来到韶山，找到乡长李性恂，叫他先带人探听毛泽东祖坟的地方。李性恂绞尽脑汁，靠蒙哄吓骗，终于打听到了毛泽东祖父的坟在“八仙吹箫”的虎歇坪一带。于是为了找到具体的地点，他带风水先生演出了开篇那一幕。

这件事激起了韶山人的义愤，孙辈造反，祖辈地下尸骨何故？再说毛泽东是为老百姓的活路才带头造反的，怎能让他受这个打击呢？大家都决心站出来护坟，与



李性恂作对。且说,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的消息传到毛泽东的堂兄和儿时的老师——毛宇居的耳朵里,他在大吃一惊之后,冷静地摸了摸胡子,便计上心来。

一个星光明亮的夜晚,几十个男女老少齐集在虎歇坪的山上,有的平土,有的担草皮,一会儿,硬是将毛泽东祖坟毛翼臣的坟平掉了,并在坟上整成一片旱土,在周围植上草皮,谁见了都以为这是一块旱粮地。至于那块墓碑,人们将它埋到了一米多深的地下。

一个晚上,没有星星,月亮也被乌云遮住了,整个韶山冲一带一片黑暗。熊道乾带着一连枪兵进了冲,朝滴水洞扑去,他们按照李性恂指定的路线进发着,他们刚刚来到东茅塘一带,只见山上黑乎乎的,树林密不透风,老鼠虫蚁在草中穿梭,枪兵见此情景心里一阵阵发毛。突然,山上响起了“呵哟呵哟”的喊声,“轰隆轰隆”“噼噼啪啪”的枪声,声音在夜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随着刮下山麓的阵风,如同千军万马冲来。枪兵们都是经过沙场的,是从炮子堆里爬出来,领略过红军游击队的厉害手段,顿时以为中了



埋伏,人生地不熟,吓得手脚都酥软了,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撞撞碰碰地冲外逃窜,一窜竟窜至了离韶山冲18里远的永义亭。这时,他们才惊魂初定,大口地喘着气,这时李性恂来告诉他们,说那些“枪炮”声,喊声是当地农民守红薯赶野猪时发出的,“炮”声就是鞭炮。“机枪”就是鞭炮挂在铁桶里燃放,另外的响声是响竹、木脚敲出的。匪兵们才知上了他们一次当,第二日他们恼羞成怒地爬上滴水洞山上,可出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遍地的红薯蔓和挖掉了红薯后平整了的旱土,旱土旁边倒是有一片坟堆,可哪座是毛泽东的祖坟呢?他们傻眼了。

李性恂在匪连长身边耳语了一阵,匪连长派出十几个枪兵朝一个村庄狂奔而去。不一会儿,枪兵们抓来一个50多岁的老头,他就是毛宇居。枪兵们用“吹火筒”顶着老人的胸膛,威胁他说出毛泽东的祖坟来。毛宇居自知这些家伙不会轻易罢休,只好两害相衡取其轻,指着一石坟说:“那就是。”

.....

一会儿,匪兵们撬开石板,起出棺材,



把骨骸抛落满地，熊道乾狂笑了。但是他马上觉得冷气攻心，他看到那红绯绯的棺材，耳边却响起了他父亲那颤抖的声音：“伢子呀，挖人家的祖坟，可是造孽的事！将来会遭报应的！再说，两家相争，虽是各为其主，可死人何辜？一旦结下这血海深仇，子子孙孙都被拖累啊！伢子，你要躲掉这差事呀！”可他没能躲脱，端了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管，再说何键还许他事成之后有赏金。此时，他再也没有心思想领赏的事了，那萧瑟的秋风，那呼呼作响的松涛似是丛中埋伏着成千上万的阴兵朝他袭来，他有气无力地下令：“回去——吧……”

熊道乾回到长沙，夜里常被噩梦惊醒，他梦见那白惨惨的骨骸，红绯绯的棺木；那头颅、骨颅眼洞里透出绿莹莹的惨光，那咬紧的嘴唇在阴沉沉地朝他喊：“还我房子来”；白天，他好像时刻都听见跟踪的脚步声……不久，他疯了……^①

^① 文热心：《毛泽东与故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3～56页。



最后,他脱下那身“老虎皮”,回到沅陵老家,就在这种疯疯癫癫中死去。

其实,熊道乾等人挖的并不是毛翼臣的坟,而是当地财主毛俊贤的坟。

这一次何键的挖坟阴谋没有得逞,但是迷信风水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甘心。1939年冬,国民党陪都重庆密电长沙,再次密谋挖掘毛泽东的祖坟。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王茂泉拨了数百元光洋专款,找了党徒唐锦忠、李桂明实施,将具体时间定在1940年农历正月十五晚上,因为这天韶山村里人都闹元宵去了。只是韶山人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国民党一伙又无法弄清毛翼臣坟墓的方位,无从下手。国民党导演的最后一次“毁坟断脉”闹剧遂告流产。毛泽东的祖坟安然无恙,而实施挖坟计划的唐锦忠新中国成立后被枪毙。

1952年9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韶山塾师李漱清时,听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挖坟闹剧,爽朗地笑道:“何键叫作有办法,打不赢就挖坟,祖坟都给他挖了,又奈何!”

1986年12月28日,韶山管理局在修建虎歇坪游道时,意外地挖出了埋藏地下已有50多年的毛翼臣墓碑,毛泽东祖坟由此得到重见天日,修复后供游人参观。毛翼臣墓碑长约3尺,宽1尺,厚3寸,



棱角分明,系祁阳石雕刻,碑文如下: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镌

显考毛翼臣老大人之墓

内辛山外戌山,男貽昌孙泽东、泽铭、

泽淋敬立

碑文中貽昌即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泽铭、泽淋即毛泽东的两个弟泽民、泽覃。

何键报复毛泽东的另一招是捉拿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她日夜思念毛泽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盼望夫妻早日团聚;杨开慧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日夜照顾他们,教育他们,希望孩子们快快成长;杨开慧还是向振熙老人的女儿,她日夜奉献孝心,无微不至地赡养着老人,企盼老人健康长寿。杨开慧更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她经常参加当地党组织的会议,做革命的宣传工作。她天天在盼润之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早日成功。然而,杨开慧早已成为湖南国民党新军阀头子何键的眼中钉。

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何键派侦缉队来捉杨开慧。这一伙人刚离开长(沙)、岳(阳)古道就迷了路。他们碰见了家住板仓的当地农民杨乐初:“杨



开慧家住什么地方？”杨乐初看见这帮凶神恶煞的家伙，身上背着长枪短枪，情急智生，便指着稍远处的朱家屋场说：“噢，就在那边”。敌人一阵跑步奔朱家屋场去了。杨乐初急匆匆地跑回板仓杨家下屋，向杨开慧报告了敌人来的消息，使杨开慧第一次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敌人是不会甘心的。板仓的父老乡亲都在为杨开慧的安全担心。他们从早到晚，轮流守在山上，守在路上，观察敌人的动静。

果然，敌人又出动了。8月底的一个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老农缪一爹正在山上放牛，看见清乡队，带着一些穿黄衣的人，大约二十几人，都背着枪，他立即通知了杨开慧的邻居缪三婶，缪三婶丢下针线，推开孩子，马上带着杨开慧走小门，穿后山，来到余家坳他兄弟媳妇家里。他们像照顾自己的亲人那样，把杨开慧藏在自己的楼上，为她端茶，做饭。杨开慧在此住了一夜。

敌人在杨家下屋守了一夜，没有发现杨开慧。第二天早晨，敌人憋着一肚子火气走了，杨开慧回到家，看见一家人都在为她担心，心情也很沉重。母亲流着泪说：“霞，听妈的话，你带上孩子和孙嫂一起，到你舅舅家躲几天吧！”杨开慧体贴母亲的心，加上平江那边有些事情要办，随即答应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

MAO ZE DONG YU YANG KAI HUI

到了平江不久,杨开慧知道了红军二打长沙的消息。心情焦急万分,便匆匆地赶回板仓。当时,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到了长沙南边的田心桥一带,由于敌人封锁交通,联系隔绝,这些情况,杨开慧并不知道。

从平江回板仓的路上,杨开慧碰到了许多从长

裕英我最受之姐：臨許久
 起居多福
 學業日增為碩現發頭腦且生輝子請駁面診治能如見
 致秋中功課極精傷風足頗為之佳物也與吾
 姊至好素承規矩有暇望賜數行以慰思念天
 氣將寒惟珍重不一此間
 大安
 弟 兩學長均此間安地未力
 愚妹楊開慧書上



杨开慧书信手迹



沙撤回来的赤卫队员。有人告诉杨开慧,红军围攻长沙十多天,没有打下来,蒋介石又不断增援,红军便主动撤至湘赣边一带去了。

她心里明白,这一次敌人的反扑,将会比前几次更疯狂。进入长沙县境,她又进一步了解到:红军围攻长沙时,清泰桥和飘峰山一带的农会、赤卫队、运输队都很活跃。第一次打长沙没有暴露的同志,这次基本上都暴露了,敌人一反扑,同志们都要遭殃了。想到这儿,杨开慧抄小路,穿树林,躲过敌人的搜捕,天黑以后,她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进家门,母亲又吃了一惊,颤声颤气地说:“霞,你怎么又回来了?”说着,就掉下眼泪。杨开慧安慰她说:“妈,你想宽些,不要哭,革命总是要流血的。”母亲止住眼泪,告诉她说:“你千万要小心,不要到处走动,福临铺和清泰桥都成立了铲共义勇队,他们四处活动,每天都在捕人杀人,天主寺旁边那丘田里,已杀了400多共产党员和农会委员。”不一会儿,缪三婶和几个妇女来了,她们告诉杨开慧,这几天,板仓一带来了一些生人,有的卖瓦罐,有的补伞,有的卖布。杨开慧凭着多年秘密工作的经验,预感到自己此时的处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但她顾不了这些,只是笑一笑说:“不要紧,我留心就是了。”



实际上,杨开慧的处境比她预料的更加危险,敌人已杀红了眼。红军撤出长沙后,何键以“清理战场”为由,成立了湖南省清乡司令部,自任司令,在一星期内,仅长沙一城就屠杀了未及撤出的1万余名红军及地方武装人员,还有几千名市民。

长沙与平江交界处,已被铲共义勇队封锁。铲共义勇队已接到清乡司令部的训令,说红军攻打长沙时许多平江人参加了,从平江到长沙,或从长沙去平江的,都是共产党的“探子”,可以先斩后奏。因此,长沙这边的铲共义勇军听到说话带平江口音的人就开枪。平江那边的铲共义勇军听到带长沙中音的人也开枪,路上到处都躺着无辜被杀害者的尸体。

在这种腥风血雨中,杨开慧最终没有躲过敌人的魔爪。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有个50多岁的人,挑一担瓦罐,停在板仓门口的水塘边,隐蔽在一株老槐树下,守候着杨开慧家的大门。杨开慧从缪家大屋回来,本想翻后山回家,不料在路上碰见一个卖布的。那家伙鬼头鬼脑,引起了她的警惕,她绕过了棉花坡,甩掉了卖布客,从前门回了家,正好被藏在水塘边老槐树下的密探发现了,密探赶忙奔向福临铺,给范庆熙报告情况。



范庆熙是长沙县清泰都口五区“铲共义勇队”队长，其儿子范裕厚是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官，为了讨好何键，他曾给何键写了一张邀功请赏的“状子”，诬称“毛泽东之妻毛杨氏，三次带兵从井冈山攻长沙未遂。隐居长沙东乡板仓杨公庙一带，组织苏维埃，自称主席……”范庆熙曾两次组织人抓捕杨开慧未逞，非常恼火，板仓附近的“卖布客”、“沙罐客”和各种小商贩都是范庆熙安排的密探。这次接密报，范庆熙暗暗自喜。他吩咐手下晚上美食一顿，上半夜睡觉，夜里行动。晚上10时许，范庆熙纠集了80多名匪徒，分成8个小组直扑板仓，午夜时分包围了板仓下屋。刚刚上床准备休息的杨开慧听到村里的狗叫得很厉害，再细一听，房周围有杂乱的脚步声和树枝摇曳声。她意识到自己已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连忙起床，拿出早已清点好的党的机密文件。轻轻推开房门，快步来到小杂屋里点火烧毁。这时，敌人已破门而入，闯进杨开慧母亲住的房子，凶神恶煞地逼问道：“杨开慧在哪里？”杨老太太没有回答，在敌人的威逼下，带着匪徒走向与杨开慧的房屋相反的其他屋里，她想让女儿借此机会逃脱敌人的魔掌。

然而，有两个匪徒已踢开杨开慧的房门，闯了进来。杨开慧早已穿好那件破旧的灰底红格旗袍，



从容地抹了抹旗袍上的胸襟，轻蔑地扫视了一下匪徒，说：“要走就走。”一个匪徒把杨开慧五花大绑起来，推到上堂屋。接着匪徒们在房里翻箱倒柜，里外搜查但却一无所获。

这时，天已大亮，四邻及乡亲们知道杨开慧被捕的消息后拥到板仓大屋。本村两位农民不顾敌人的阻拦，推上两部装上竹篓的土车子，将杨开慧、岸英及孙嫂一块送到汨罗白水车站。乡亲们泪汪汪地看着敌人把杨开慧她们押上开往长沙的火车。

到长沙后，被何键紧紧控制的《大公报》于10月29日刊登了杨开慧被捕的消息：

毛泽东妻子拿解警备司令部

共首毛泽东之妻杨氏，系长沙清泰乡板仓地方杨怀中之女。生有三子，自毛倡乱后，杨氏率子女匿居娘家。最近清泰乡成立农民铲共义勇队，清查户口，异常严密。日前经人密告该义勇队该队团派队前往将杨氏及其长子又女工一名一并拿获。解送警备司令部。前日已经军法官详加审讯。^①

^① 邓燕：《骄杨泪》，华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97页。



二十五、遭受酷刑

敌人将杨开慧、毛岸英及孙嫂关进协操坪监狱。协操坪监狱号称国民党的模范监狱。一座阴森森的四合院里散落着几十间牢房，牢房里关满了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杨开慧等三人一块被关进一间昏暗潮湿的号子里。这一天是1930年10月24日，毛岸英8岁的生日。

杨开慧被捕，最高兴的是何键。

这一天，何键穿着长衫，道貌岸然地在督办公署小礼堂参加舞会。

清乡司令部执法处处长李琼跑来向何键报告杨开慧被捕的消息。何键走上讲台，举起酒杯，眉飞色舞地宣布道：

“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泽东的妻子、共产党要犯杨开慧，已被拿获！”舞场上响起了一阵阵鼓掌声。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也传进了城乡地主豪绅的耳朵里，他们嘴里念佛：“不除掉杨开慧，我们天无宁日。”于是，一封封请求斩首示众的信函传到何键手里。



杨开慧被捕,使得国民党湖南省政界政客们高兴了一阵子,他们认为,捉了杨开慧,不但能破获共产党的组织机关,还可以进一步掌握毛泽东的行踪。这样一来,他们便能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升官发财。因此,何键将杨开慧列为重大“政治犯”。要求执法处好好审问。

1930年10月29日上午,执法处长第一次提审杨开慧,他一看到杨开慧进来,就把手中的惊木堂往桌上重重一拍:

“你就是毛泽东的堂客杨开慧!”

“你知道还要问?”杨开慧投去轻蔑的目光。

啪!李琼又一拍惊堂木:“好你个杨开慧,放明白点,你现在是共匪要犯,你的性命在我们手中,你要老实交代,否则……”

“你们才是匪!”杨开慧毫不示弱:“我落在你们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便!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好硬的一张嘴!”李琼横眉竖眼了:“快说,毛泽东在哪里?清泰乡共产党组织都有哪些人?都给我如实交代清楚!”

“不知道。”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不知道?经常书来信往,会不知道?”

“不知道!”



“别嘴硬，快说，毛泽东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不开口，好，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李琼暴跳如雷，手一招，上来四个彪形打手，他们一齐动手把杨开慧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开她的上衣，用皮鞭、竹鞭轮番朝杨开慧身上抽打。

“说！毛泽东在哪里？”李琼见杨开慧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快撑不住了，把惊堂木一拍嚷道。

“不……知道！”杨开慧忍着巨痛，仍是这一句话。

“还嘴硬！来，重刑伺候！”李琼咆哮起来。

两个打手即刻把杨开慧拖起，又把她压跪在地，用一根碗粗的长棍压在她的膝盖上，两人各踩在棍子的一边，使劲地踩，杨开慧只感到膝盖骨都在炸裂，豆大的汗珠雨点般地落下来。杨开慧终于忍不住了，昏死过去。

当她慢慢地睁开眼时，已躺在了牢房，岸英趴在她身旁已哭哑了嗓子，孙嫂也哭肿了双眼，同牢的七八个女牢友也在落泪。

“岸英呀，你莫哭，你莫哭，妈没事。”她一边吃力地说，一边蠕动身子，想伸手给儿子抹泪。然而身体蠕不动，手也抬不起，浑身刀割般地疼痛。

“妈妈，……血……血这边有，那边有，呜



呜……”岸英边哭边用小手给妈妈拭着身上的斑斑血迹。孙嫂扶着杨开慧，一点一点地喂水喝。突然，牢房的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了。看守叫唤：“陈玉英出来”！并扬了扬手里的提票。

杨开慧见敌人要提审孙嫂，怒上脸来：“要拷问就拷问我，她是我家帮忙的客人，她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是按票提人。”看守不乐地挥了挥手，两个士兵把孙嫂拉走了。

“杨开慧同志，别太难过，到这里的人那个不受毒打？”有个年过四旬的牢友颤抖抖地走到杨开慧身边，婉言相劝后，又吐出自己的忧虑，“杨开慧同志，我担心这位大嫂能否经得住敌人的毒打？”

“我家孙嫂是一个好心人，而且非常坚强，我信得过她。不会有问题的。”说到这儿，杨开慧停不停，喘了口气，继续说：“她不该受此苦难，是我连累了她。是我连累了她呀！”两串泪珠从杨开慧苍白的脸上簌簌而下。

敌人对孙嫂审讯很策略，他们先装出一副慈悲的面孔，挑拨孙嫂说她只不过是给杨开慧当用人，何必跟她受此罪。只要把与杨开慧往来的人，他们的姓名、住址讲出来，如果不知道这些，也可以把他们的相貌讲出来。他们又问岸英姓毛还是姓杨，毛



泽东来过板仓几次，来过几封信，信从何而来，等等，说了这些，就可以马上回家。而孙嫂总回答自己只管做工，不晓得他们的事，岸英姓杨不姓毛。因为，毛泽东在与杨开慧分别时，为了妻与子的安全，让孩子姓杨，所以岸英对外一直称姓杨。敌人诱供不逞，便对孙嫂施刑，但孙嫂始终不改口。

折磨了两个钟头后，遍体鳞伤的孙嫂被拖回牢房，她也许比杨开慧结实一些，被拖回时还很清醒。她一见到杨开慧，就爬到她身上，低低地说：

“杨先生，我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粗人，但你放心，不该说的话，我死也不会说。”

“多谢孙嫂，多谢孙嫂。”杨开慧吃力地信任地点了点头。

敌人用高压欺骗的手段治服不了杨开慧和孙嫂，于是魔爪伸向年仅8岁的岸英。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把岸英带到审讯室，进行盘问。

“你姓毛，叫毛岸英对吗？”

“不对，我姓杨叫杨岸英！”

“你爸爸那天回来了，对不对？那天你爸爸还用手巾包着一包糖块给你吃，是不是？”

“没有，我没有见到我爸爸。”

“你撒谎！”



“你们才撒谎呢！”岸英毫不畏惧地说。

敌人在岸英身上打注意的企图失败了。但是，敌人并不罢休，继续刑讯杨开慧。

这是敌人第三次审问杨开慧，所有大刑具都摆上了。杨开慧一走进去，执法处长李琼便吼叫起来：

“杨开慧，你要死还是要活！”

杨开慧大声地说：“要杀要砍，听便，从我口中得到什么，休想。”接着便是敌人的吼声和行刑声。

他们给杨开慧压杠子，往手指甲盖里插竹签，整整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杨开慧昏死过去。

杨开慧被拖回牢房后，岸英一下子扑在妈妈身上痛哭起来，他见妈妈身上的衣服全被撕破了，便疯了一样地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往妈妈身上盖，大声哭道：“谁打我妈妈，我长大一定要报仇！”

慢慢地杨开慧苏醒过来了，她把脸贴在儿子的脸蛋上，母子的泪水流在一起，她坚强地说：“岸英，你要记住，爸爸正在井冈山打白匪，爸爸一定要打回来。”

岸英摸着妈妈身上的伤哭着说：“妈妈，痛的厉害吗？”

“妈妈是共产党员，什么都能扛住。”她忍着巨



痛对儿子说：“以后不管妈妈在不在你身边，都不要忘了识字，看书，学知识。”

“我知道，妈妈。”岸英很懂事地点着头。

“来，妈妈教你识字。”杨开慧把岸英的小手握住，在儿子的手心里一笔一画地写着：

干革命，主义真。

为祖国，为人民。

方向定，骨头硬。

不怕苦，不怕死。

辈辈走，不停步。

懂仇恨，志更坚。

忘仇恨，必叛变。

妈妈的话深深地印在岸英幼小的心灵里。



二十六、壮烈牺牲

杨开慧被捕后，板仓杨家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发动社会名流设法援救。杨开智赶赴南京。请当时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年初为了援救杨开明，曾经乘飞机到长沙，面见何键。这次章士钊与蔡元培商议，决定发动社会名流，打电报给何键，给其施压，无罪释放杨开慧。

这一天，何键的副官送来一叠电报，“报告总座，北平、上海、南京一些社会名流纷纷来电，要求开释杨开慧，蔡元培、章士钊以及南京教育部的同仁，又发来电报。”

何键将电报往桌上一扔，“哼哼”了两声。

“把任卓吾叫来。”何键吩咐副官。

任卓吾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被捕后叛变投敌，多次出卖党内同志，深得何键的信任，委以侦缉专员，用来对付共产党。

任卓吾一路小跑来到何键面前。何键斜视着叛徒任卓吾：“任专员，对付杨开慧还有什么良策呀？”



任卓吾一听何键征求自己意见,受宠若惊,马上向何键献策:

“攻心为上!动员她与毛泽东离婚,并把离婚声明登在报纸上,这样,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组织也是一种打击。政治上也是一大胜利。以此作为不杀杨开慧的条件,如果杨开慧不从,我们再杀她也是出于无奈,这样对社会名流的压力也好搪塞。”

何键一听,非常得意,便指派任卓吾办理此事。

提审杨开慧的时间到了,在牢友们的帮助下,杨开慧艰难地站了起来,理了理头发,跟着看守来到一间房子。

杨开慧一进来就感到奇怪。这间房子收拾得很干净,没有摆放刑具,站在她面前的不是执法处长,而是一位带眼镜的白面书生。

“霞姑,我来看你啦!”白面书生脸上带着很自然的笑容。

杨开慧不认识面前这个人,便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叫任卓吾……”

杨开慧一听“任卓吾”3个字,便想起在牢里难友们曾对自己讲过,任卓吾是叛徒,要格外小心。杨开慧略为深思了一下,冷冷地说:“哦,任先生,你来这地方不怕失身份。”



“见笑，见笑。我是来援救霞姑你的，看了报上的消息，大家都很着急，纷纷发来电报要何键主席手下留情，大家推举我来，是想搞个万全之策。”

“有什么万全之策，你倒说出来听一听。”杨开慧轻蔑地说。

任卓吾一听有希望，“其实人生就是那么一回事，谁不是为吃穿享受，你还年轻，何必为共产党卖命呢。唉，当初我也是不得已。”任卓吾见杨开慧在认真地听着，没有发话，便接着说：“霞姑，我是真心来救你的，社会各界人士看在杨老师的面上，都愿保你出狱，我也同清乡司令部谈好了条件，你一不要交出共产党的名单；二不要写悔过书，只要你在报上发表个声明，跟毛泽东离婚，马上就可以恢复自由。”

杨开慧听到要她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满腔怒火已怒不可遏。“呸”，她朝任卓吾脸上吐了一口，“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叛徒，你这个卖身求荣的小人，回去给你的主子讲，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真是痴心妄想。滚！快给我滚！”

任卓吾没想到一个弱女子会这般坚强，他恼羞成怒，挑拨地说：“杨开慧，你放明白点，你不要死心塌地……毛泽东已被击毙。”



杨开慧听任卓吾在造谣，便抓起桌上的笔墨向任卓吾砸去。

任卓吾无趣地向何键汇报刚才的情况。何键听了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你看着怎么办？这么多名流保释，对杨开慧真是放不得杀不得！”

“何不先行处决，再给蔡、章等人复电就说保释电来晚了。”

何键把手一拍，叫道：“好！好！妙招。”

杨开慧被捕，不仅惊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更惊动了外婆家的人，六舅妈自杨开慧入狱后经常送饭送菜。而每次送饭菜，杨开慧都分给难友们一块吃。

六舅妈又来送饭了，两人隔着一个窗口站着，六舅妈含着眼泪哽咽着说：“霞姑，你受苦了！”

杨开慧安慰地说：“舅妈，不要伤心，我没事，我受得了。”停了一会儿，杨开慧对舅妈说：“有一段白布放在家里，你设法做一件衣服给我送来。”

舅妈听了，心里发颤急忙说：“霞，你莫着急呵！你哥哥到南京找人去了。长沙也有好多人在设法保你。”

杨开慧说：“敌人说，只要我在报上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放我回家，这绝不可能！舅妈，



请你告诉亲人们，我开慧死不足惜，但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

杨开慧知道，何键是不会放过她的，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准备牺牲。

1930年11月14日，隆冬时节，北风怒吼，乌云在天空翻滚，冷飕飕的西北风吹得牢门“吱吱”作响。这天中午，开饭时间已到，杨开慧端起碗正准备吃饭，忽然“咣当”一声，牢门打开了，门外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匪兵。执法处长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大声念道：“捉女共犯杨开慧。”杨开慧一看这阵势知道自己该走了。她平静地把竹碗里的饭倒进岸英的碗里，又脱下自己的外衣蹲下披在岸英的身上，一把搂住他，慢而坚定地说：“孩子，妈妈走了，以后要听孙嫂的话，要吃饱饭，睡好觉，不许再哭。记住妈妈的话，你是男子汉，出去以后要照顾好你的弟弟。”

说完她站起身，对孙嫂说：“孙嫂，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们一家人，难为你了！”然后向牢里的每一位难友点头道别。

“妈——妈——你别走啊！”杨开慧刚走出牢门，岸英挣脱孙嫂的手哭喊着奔向妈妈。

杨开慧回头转身瞪了岸英一眼，厉声地说：“别哭孩子！记住今天，要报仇！”



此时的岸英，尽管年龄尚小，但他也懂得这是最后的离别，他不顾一切地扑到妈妈脚下，抱着妈妈的腿嚎啕大哭：“妈妈，我舍不得你啊！爸爸、弟弟、外婆都舍不得你啊！妈妈，我的妈妈！你听见了吗？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杨开慧强忍着泪水，紧紧抱住岸英，轻声地安慰说：“孩子，我没有别的话要说。如果你将来见到爸爸，就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说我非常想他，我不能照顾他了，请他多多保重！”

这时候，孙嫂也从牢里奔出来，失声痛哭：“杨先生，你不能走哇，孩子离不开你呀！”

此时，杨开慧含着泪说：“孙嫂，我的3个孩子都还小，他们是润之的亲骨肉，我不能抚养他们了，全托给你们啦！”

杨开慧抬起头，望着难友们一双双泪眼，挥手告别。

“同志们，别难过，再见啦！”说完大步向前走去。

“慢。”执法处长喊了一声，杨开慧停下脚。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你真的不愿意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无须多问，早就回答你们了！”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年纪轻轻，不为自己着想？”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瞎操心！”

“你不怕死吗？”

“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你还有什么遗言？”

“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死后不要做俗人之举。”

执法处长扯开嗓门，捧着一纸文喊：“……判处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开慧死刑，立即绑赴刑场枪决！”

几个匪兵上前要绑杨开慧，杨开慧奋力推开他们高声斥道：“我自己走！”

偌大的监狱大院，此刻死一般的寂静，风不吹了，树不摇了，鸟不叫了，好像默默地给杨开慧送行。此时的杨开慧贴身穿着舅妈做的白布衣，外罩一件蓝布旗袍，足蹬一双黑色布鞋，脚穿一双洁白的袜子。格外朴素庄重。她用手理了理被风吹下来的两缕短发，整了整衣扣昂然向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走去……



二十七、“百身莫赎”

杨开慧被捕后，地下党组织和杨开慧的家属，在南京、长沙等地进行多次营救都没有成功。杨开慧父亲杨昌济老先生的许多生前好友均为省内外知名人士，由于他们的走动，及舆论界的呼吁，何键只把“砍头示众”改为“枪决曝尸”。

十多天后，经亲友们的营救和各界声援，岸英和孙嫂被释放回家。这一天，向振熙老人带着岸英、岸青和岸龙来到杨开慧墓前，她指着墓说：“孩子呀，你们的妈妈就睡在这里，她是被何键杀死的，等见到你们父亲，要他给妈妈报仇雪恨！”岸英哭喊着：“妈妈，我们要看你一眼！”他跪在墓前并用手不停地扒着黄土，恨不得扒开黄土，再看一眼亲爱的妈妈。岸英的两个弟弟也跪在地上跟着哥哥撕心裂肺地豪哭起来。外婆向振熙见此禁不住老泪纵横，“孩子们，哭吧！大声哭吧！让你妈妈在九泉之下知道三个伢子来看她来啦！”

杨开慧被捕受刑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中央苏区指挥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经过浴血奋战，“朱毛”红军歼敌近万人，活捉敌十八师师长张



辉瓚,缴获各种武器 9000 余件,子弹 100 多发,电台一部,毛泽东非常高兴,并赋诗一首: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瓚。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是在江西吉水县木口村得知杨开慧被害的消息的。当时毛泽东在翻阅缴来的国民党报纸,翻着翻着,突然一条触目惊心的报道映入毛泽东眼帘:

毛泽东妻子杨开慧拿解警备司令部



毛泽东迫不及待看了几遍报道内容，他已是心如刀绞，眼眶马上变湿，他一看报头的日期是民国19年10月25日。“开慧已被捕一个多月了，近况如何？”毛泽东一边自语一边赶紧在报堆中寻找最近的报纸。终于，毛泽东迫不及待要找的，又最不愿意看到的报纸找见了，民国19年10月15日《湖南国民日报》在第七版中刊登了清乡司令部的《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莫不称快》的报道：

共匪毛泽东之妻杨氏（名开慧），前次自率女匪赤卫队由西入平浏一带，希图逞乱，经我军击溃。该匪妻杨氏，逃循未及，化装潜伏在长沙清泰乡，经警备部拿获到省，转至清乡部讯办，业志前报。

兹经该部讯据该匪妻毛杨氏，努力共党工作，煽惑妇女，扩大红军女赤卫队，扰乱湘鄂各省地方不宁。已于昨日十四日下午时监提女共匪毛杨氏一名，绑至识字岭刑场执行枪决，全省民众莫不称快云。

看到这些消息，毛泽东悲恸万分，竟一连几个晚上彻夜难眠，眼睛睁开时是杨开慧那温柔娴静的面容，眼睛闭上时也是爱妻纯洁善良的微笑和期待团聚



的眼神。娇小而灵巧的身躯,以及她含辛茹苦抚育 3 个孩子的忙碌的身影,时刻在毛泽东脑海里闪动。她的死完全是为了毛泽东的事业,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才被敌人杀害,这叫毛泽东如何不伤心落泪!

毛泽东在心里自责:我不与你经常通信,就是不给你带来麻烦,不让敌人得到什么信息,让你自我保护自己及孩子。敌人让你声明与我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你为何不假戏真做,迷惑敌人呢?我走时嘱咐你让孩子姓杨,你还不理解我的意图吗?杨开慧啊!这次你真糊涂呀。你为了我毛泽东竟这么坚决、这么快地走了。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带你出来。

想到这里,毛泽东强忍心中悲痛,挥笔给杨开智写了一封信,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的负疚之笔,表示自己的莫大悲哀,并当即向同志借了 30 块银元,连同这封信通过刚开通的秘密通道,火速送到板仓杨家,为亡妻杨开慧修墓立碑费用,并指示杨开智在碑石上要刻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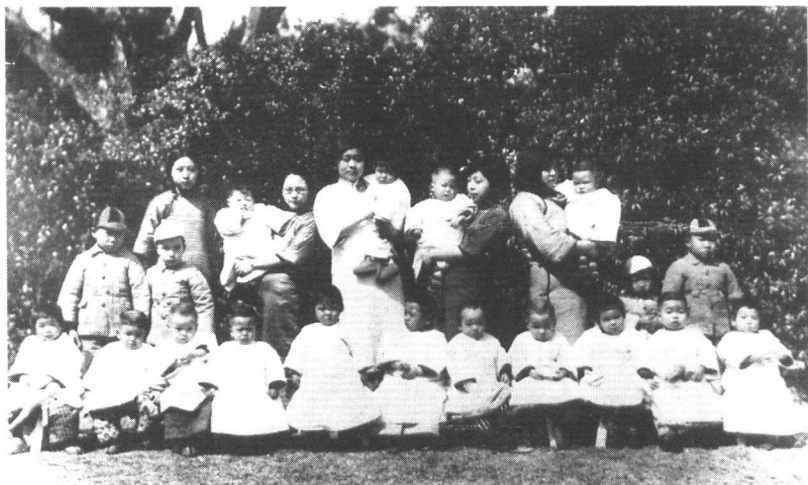
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岸青、岸龙刊

一提到孩子们,毛泽东又为他们的安全担起心来,于是当即给大弟毛泽民修书一封,要他尽快把



毛岸英三兄弟接到上海妥善安置,并把这封信直接交给即将动身到上海向党中央做汇报工作的三弟毛泽覃手上。此时,毛泽民以开酒栈为掩护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很快向党中央做了汇报。通过地下交通的联系,岸英三兄弟被秘密送到上海,三兄弟分别化名杨永福、杨永寿



上海大同幼稚园的老师 and 孩子们合影。中排左一为毛岸英、右一为毛岸青、右二为毛岸龙。

和杨永泰,被安排在上海大同幼稚园就读。后来,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毛岸龙病失,毛岸英和毛岸青流落街头过着乞丐的生活。1937年,岸英兄弟二人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入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到了1946年1月底,已25岁的毛岸英才回到延安,见到了阔别19年的父亲毛泽东。1949



毛泽东与杨开慧

MAO ZE DONG YU YANG KAI-HUI



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当地群众把她安葬在故居附近的山岗上。第二年,用毛泽东寄回的安葬费在墓前立了三块石碑。1959年,板仓人民在墓后竖了“光辉长照后人心”的石碑。

年3月建国前夕,毛岸青拖着脑病回到北京与分别了22年的父亲相聚。



二十八、儿子扫墓

转眼间到了 1950 年，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毛泽东为之艰辛奋斗，杨开慧生前企盼的革命事业终于取得了成功。另外，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时结婚成立了新家。在外颠簸了十几个年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也回到了毛泽东身边。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

此时的毛泽东真可谓功成名就，家庭美满。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忘却他心中的爱妻——杨开慧，反之，思念之情却与日俱增。为了不能忘怀的纪念，毛泽东准备让大儿子毛岸英回湖南老家看一看，一则看一看韶山家人；二则看一看板仓亲人，对板仓亲人，岸英与其父亲毛泽东一样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毛岸英自幼小离开板仓到今已是二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他很想念外婆、妈妈，也想回家看一看。从以下岸英写给外婆的两封信中可知岸英的心情。

第一封信是 1949 年 8 月 17 日写的：

舅父并转外婆：

看到舅舅的来函，悲喜交加，热泪不



禁夺眶而出。人终然是个有高度感情的动物！离别已经二十年了，对于人生来讲，这不是一个短小的时间。你们都好吗？二十年的苦头终于熬过来了，长沙也解放了，全中国的解放就在眼前。数千年一直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被残害的中国人民胜利地站起来，你们也站起来了！让我首先向你们祝贺这一伟大事变吧！

一九三一年与外婆分别后，在上海过了五年流浪生活。一九三六年到了苏联（可惜没有学一门技术），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延安，学了一个时期中文，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现在北平中央机关工作。岸青也已于一九四七年回国，现尚未正式参加工作，他的耳朵有些毛病，但不很要紧。我的身体很好，勿念。

我们都很想来看你们，只要有可能，我想我是一定要到长沙来的。回国后，我曾给你们写过好几封信，大概都没有收到（这封信，我想你们一定能收到了）。

来函中说外婆“健康如常”，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谨祝我亲爱的外婆健康愉快，并祝舅父、舅母及其他亲人安好！



你们的情况望多告诉我,来信请寄北平邮政信箱四十五号即可。

专此,致
革命敬礼

岸英

1949.8.17^①

信中所提北平中央机关,是指中央社会部。即岸英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做部长李克农的秘书。信中还谈到岸青的情况,尤其是岸青的耳病。岸青的耳病是在上海流浪时被敌人打的。

一次岸青用粉笔在电杆上写“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时,被一法国佬看见,法国佬用大皮靴踢了岸青几个跟头,遭成岸青脑震荡,耳部受伤,落下终身毛病。

岸英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外婆不久,就收到了回信。岸英非常激动,便于1949年9月10日复函:

亲爱的外婆、舅父:

回信收到,快慰万状之余,也不禁凄然泪下。伟大的母亲遗容和记忆中所留

^① 杨大群:《毛岸英》,沈阳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9~300页。



毛泽东与杨开慧

MAO ZE DONG YU YANG KAI HUI

下的外婆的一举一动不时呈现在眼前。更有一层使自己万分痛苦的,就是这几年太不长进了。今后当努力奋发,以不辜负生者,对得起死者才好。

我非常想来看你们,父亲亦极力赞助,湖南则刚开始解放时,我就与父亲谈到回湖南寻找你们(过去给你们的信,皆无回答),长沙很快解放了,你们的电报也来了——那份电报我不知看了多少次……然而,对于一个共产党,工作,人民的利益是占第一位的,党的利益(亦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个人民的利益。这样,我现在一面虽是眼望江南,归心如箭,一面却还要等待两三个月才能来看你们,我想你们是了解我的,并会等着我的。

我的身体都还好,弟弟的耳朵稍许有些毛病,但不要紧,以前在苏联与我一样没有学技术,吃了亏,现加紧补习中文,预备考专科学校。我现在一面工作,一面努力把中文、俄文真正学好,想在这方面专下。最近深感像我们这类人,在新社会中,没有一门专长是不行的。父亲身体



好,忙一些,他的双肩所担负的担子太重了。

离别二十年,我倘若突然回来,你们可能已不认识我了。很想给你们寄张照片,但没有合适的,准备与弟弟到照相馆去好好照一张寄给你们,你们不会反对吧!你们若有照片,极望寄给我们(如果保存有母亲照片,一定请赠给我们)。

革命形势这样飞快发展,全国的解放即在眼前,数千年来一直被残害的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从此永远翻身!谁在此时不欢呼,谁就不是我们的朋友。然而,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谁若是仅仅欢呼,谁也不是我们的好朋友。这样,你们便不难想到当谈到舅舅在来电中所云:准备在社会上“好好做番事业”一语时,我是如何高兴!

外婆是不是还是那个样子,我想不管你变得什么样,我一定能认识你,只要你对我——一个陌生的刚从外边进入你们屋内的穿着军服的年轻人——仔细地望一望,你那双慈善的眼睛,我是永远忘不了了。



外婆,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向你要赖皮硬要你给我们买糖,买甜水豆腐吃,在地上打滚那回事吗?我现在长大了,不便再在地上打滚了。但却还想向你讨个债,请你在下次来信中告诉我:

我和弟弟是何年何月何地生的,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多大岁数呢!

舅舅说舅母身体不好,望多保重。其他亲人请代为问候。

信已写得很长,就此止笔,即祝外婆健康。

岸英叩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①

两封信已见岸英思念妈妈切切,思念外婆切切,他真想插上翅膀很快飞回家乡,这一天终于到了。李克农部长要去湖北出差,善解人意的他要秘书毛岸英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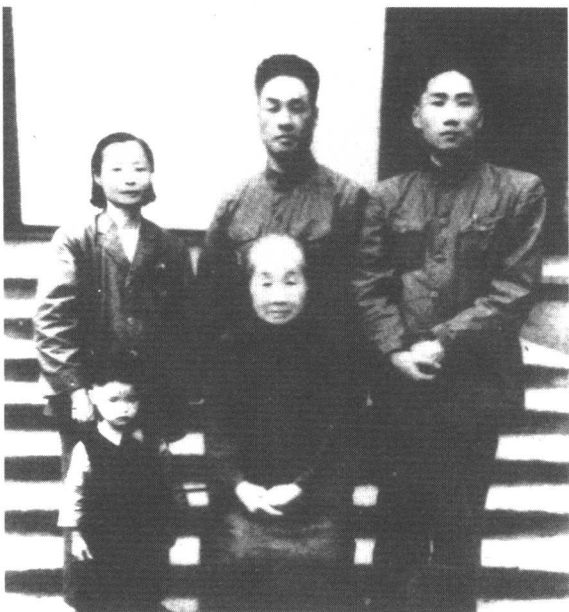
临行前,毛泽东将儿子叫到身边,父子俩都有好多心里话要倾诉,两人都有20多年没有回故乡。毛

^① 杨大群:《毛岸英》,沈阳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01~302页。



泽东叮嘱岸英：“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不能没大没小，辈分大的男人，叫声阿公，女的喊‘艾基’，长辈喊伯伯、叔叔、婶婶、阿姨，同辈以兄弟相称，再一点要入乡随俗，不要有任何特殊，老百姓最不喜欢摆架子的人。”毛泽东说的是心里话，为了不让儿子搞特殊，不让百姓有敬远之感，毛泽东还要求儿子学家乡话。

岸英 8 岁离开家乡，在上海流浪四五年，后来到苏联待了 10 年，可以说岸英的俄语比汉语讲得好，现在让他再讲家乡话，实在有点难。



既然父亲要求岸英这样做，岸英就认

1950 年 5 月，毛泽东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为岳母向振熙祝寿。这是毛岸英（后右）同杨开智（中）、李崇德（左）、杨英（小孩）和外婆的合影。

真对待，他一方面跟父亲学，父亲忙顾不上教他的时候，他就请湖南老乡教。经过一段时间的用心学，岸英的家乡话讲得还马马虎虎。



他对父亲的教导心领神会,为了给父亲露一手,他用地道的韶山话回道:“晓得喽,爸爸,你还需要么子吩咐的?”毛泽东笑了笑,算是对儿子家乡话的认可,顺手递给岸英一个皮包,用手指一指说:“这里的一些票子,是我多年的积蓄,看到真正困难的乡亲,你就见机行事吧。俗话说,空手进门,狗猫不理。总之,你看着办吧。”

1950年5月,岸英随李克农到武汉出差。办完公事后,岸英向领导请假后便匆匆忙忙于23日赶到长沙。外婆与舅舅杨开智夫妇生活在一起,住长沙学宫街。25日是外婆80大寿。到了长沙后,天色已晚,岸英先住省委招待所。第二天,他就急忙来到学宫街看他的外婆和舅舅、舅母。80岁的外婆,仍然耳聪目明,富富态态,岸英一头扑进她的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又哭又笑,口里不断地说道:“外婆,外婆,我好想你呀……”渐渐地,又喊道:“妈妈,妈妈,你好苦啊……”弄得外婆也哭,舅舅、舅妈也哭,在场的人也都难过得不断地抽泣、抹泪。

过了好一阵子,岸英才平静下来,亲手把父亲的亲笔信和寿礼送到外婆手里,还拆开信,一字一句地念给外婆听:“外婆,你听清了吗?”外婆不住地点头:“我懂,伢子,我懂,谢谢你爷老子一片孝心啊!要是霞妹子还健在,该有多好唷!”提起杨开



慧，人们又是一阵感叹唏嘘，岸英更是热泪盈眶。

接着外婆东一句西一句地跟岸英讲起他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故事，逗得岸英像小孩子似的扶着外婆的肩膀笑个不断。舅妈李崇德是个瘦小体弱的女人，已是未老先衰了，曾送岸英三兄弟去上海的就有她，舅妈也插话讲起当时冒险送行的情景，又勾起岸英许多痛苦的回忆。

5月25日这一天，在省委交际处，由省里出面，为杨老太太80大寿举行了一个小型庆祝会，省里主要人物都到场。岸英当众宣读了父亲写给外婆的信：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廉吉！

毛泽东

江 青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①

^① 杨大群：《毛岸英》，沈阳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60页。



外婆听着连连点头,表示高兴。因为去年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来看望老太太时,老太太曾当面打听毛泽东的妻室。因此,毛泽东在信中特意写上江青的名字,以回答老人的惦念。

岸英时刻怀念着死去 20 年的妈妈。他要去板仓,杨老太太坚持要跟外孙子一块回,经过岸英及家人的耐心说服,老人家才罢休。她明白,外孙怕她伤心过度。临行前外婆叮嘱外孙在妈妈坟前多磕几个头,不要哭坏身子。岸英一一点头答应后,才与舅舅、舅妈一起出发。他们在小吴门火车站乘车北上。晚上在白水车站下车,在小旅馆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向白水进发。

40 里乡村大道要走半天,地方政府暗中对这段路进行了检查。因为当时湖南山区还不太安全。岸英一上了这段路,感情就有些控制不住了。触情生情:当年他和妈妈就是由这条路被押往长沙的,路上妈妈不住地被敌人用皮鞭抽打,他不住地用幼小的身体护着妈妈,喊叫道:“不许打我妈妈! 不许打我妈妈! ……”他的身上不知挨了多少鞭。半路上,妈妈满嘴含着鲜血,干渴得抬不起头来。在敌人去老百姓家抢东西时,他偷着给妈妈找了点水,妈妈刚把碗端在手里,就被敌人用鞭子打掉在地……



快到板仓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熟悉。他在这里上过学,和小朋友们玩耍过。他跟着妈妈踏遍了板仓的山山水水,然而,今天路边的一切景物在满含泪水的眼里完全模糊了。

杨家大屋就在眼前。岸英进了家门,推开门的响声把他从回忆中惊醒。他来到外婆住过的屋子里,来到自己与弟弟、孙嫂住过的屋子里,最后来到妈妈住过的屋里。他仿佛看到妈妈在屋里等着他。然而屋里是空荡荡的,没有妈妈,没有生他教他的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岸英用拳头猛敲着木板墙,昏死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头枕在舅妈的怀里,舅舅端来饭,他一口不吃,爬起来直奔棉花山。来到写有“毛母杨开慧墓”的墓碑前,岸英“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泣不成声地嘶哑地喊着:“妈妈,妈妈,儿子回来了!真的回来了!我要为你报仇呀!报仇!妈妈,我是岸英呀!岸青也会来看你来的,妈妈呀!妈妈!可是我没有把岸龙看好呀!妈妈!……”岸英一边磕头,一边失声大哭,万分激动下昏过去了。

舅舅和舅妈看到此景早已泣不成声,他们本想让岸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怕哭坏了身子,赶紧扶起岸英,安慰道:“岸英呀!听外婆的话,不要哭坏身体。”岸英醒过来,不断叨咕着:“妈妈,我会再



来看你的！”他几乎是被架回板仓的。

岸英没有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扫墓回来后，稍事休息，舅舅带他到板仓的十几家贫苦农民家访贫问苦，对于曾经为安葬妈妈出过力的老人，他再三鞠躬致谢。

岸英回乡扫墓的消息已传遍板仓，乡亲们三三两两地来看岸英，这批走了那批来，深更半夜还有人找岸英谈心，大家最关心的是减租减息和土改的事情，岸英见乡亲们这样的热情，便约定明天在杨公庙见面。

结果，第二天，来了上千人，把杨公庙挤得水泄不通，舅舅杨开智陪岸英站在台上，舅舅介绍说：“岸英小时候，在这座杨公庙读过书，这次，毛主席要他到板仓来看大家，跟板仓的老乡们见见面。”

岸英忍住热泪，嘶哑着嗓子说：“父老乡亲们，20年前我们三兄弟被迫离开板仓，今天，我又回来了！20年里，我时刻想念着板仓，想念着长眠在棉花山上的妈妈！”

台下响起了人们唏唏嘘嘘的抽泣声。

岸英话锋一转：“如今世道变啦。贫苦农民就要翻身了。大家最关心的是何时进行土改。我在北方参加过几次土改。用不了多久，板仓也要土改。土改以后，大家的积极性一定会调动起来。下



次回来,我还要看望大家呢!”

当时岸英还不满 28 岁,湖南已经解放,母亲的坟墓也在这里,板仓人没有一个怀疑他“下次回来”的话,乡亲们也希望他能多回来看看。

然而,岸英再没有回来。他离开湖南回到北京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作为毛泽东的儿子,岸英积极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军来到朝鲜,当年 12 月 24 日牺牲在朝鲜战场。至今仍长眠在异国他乡。



二十九、母女合葬

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被杀害后，身边没有毛家和杨家的亲人，只有杨开慧的六舅妈严嘉住在长沙，她负责料理杨开慧的后事。

早在杨开慧关押期间，严嘉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女儿向自治和杨开慧七舅向定前的儿媳郑家娟探监送物、传递信息，向定前的独子向沛铭、杨开慧的大姨向大贞留在板仓照料岸青、岸龙。同时，严嘉还托附住在长沙戡子桥在监狱署担任会计的向澍霖注意打听狱中动静，以便相机行事。

11月14日，天下着毛毛雨，杨开慧被敌人押往刑场，向澍霖在路上刚好遇到刑车，便尾随而去，从口袋摸出一叠光洋塞给刽子手，暗示他手下留情，然后急忙赶往学宫街向严嘉报信，他一进门，就急喘吁吁地说：“六嫂，不好啦！霞妹子已押解到识字一岭一去一了。”

长沙识字岭是刑场，杨开慧的一弟杨开明就是在此被杀害的。噩耗传来，亲友们悲痛欲绝。严嘉冷静地说：“五伯在零陵做事，六叔在沅江工作，七叔在汉口大董家巷同济青布庄做生意（此处是毛泽



东与杨开慧联络点),向家的几位当家人,杨家和毛家的亲属都不在长沙。前两年,我们曾去刑场为向钧和杨开明收尸,现在我再也不忍心看到开慧的遗体了。这件事,只有拜托澍霖伯您了。”

向钧是杨开慧的表弟,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衡山县委和湘潭县委书记,1927年冬被捕。1928年1月24日与杨开明一起被敌人杀害。杨开慧是被害的第三位亲人,严嘉实在不忍看到惨景。由于杨开慧是女的,向澍霖装殓遗体,换衣洗面自有不便,严嘉便叫郑家娟一同前往。

郑家娟当时只有19岁,与杨开慧交情较深,她思想单纯,无所顾及,而且手脚灵活,所以,二话没说,与向澍霖一道去了。他们先来到生生盐号取了些钱,生生盐号由向定前入股经营,是杨开慧与毛泽东约定的通讯处。他们买了楠木棺材、石膏、明雄、寿衣、鞋等带了20来人直奔识字岭。

来到识字岭,天色已晚,围观人很多,找来找去不见杨开慧的遗体。因为尸体多,郑家娟等人七找八找,才在荒草丛边的血迹斑斑的尸堆中发现杨开慧遗体。她身中三枪,但面目从容如生。原来,第一枪没有击中要害,杨开慧倒地后还在颤动,刽子手又补了两枪。

郑家娟仔细对杨开慧衣体进行洗抹,装殓后,



连夜返乡将杨开慧安葬在板仓附近的棉花山坡上她父亲杨昌济墓侧，并立碑：“毛母杨氏之墓。”

安葬后不久，从党的地下交通转来毛泽东为修杨开慧墓而寄来的30块银元并附信一封，乡亲们根据毛泽东旨意重整杨开慧墓，并立新碑一块，上刻：

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岸青、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冬



板仓故居杨开慧烈士塑像

解放后，毛泽东在百忙中即召长子岸英来板仓祭奠母亲。现在每年都有大批群众自发地前来凭吊烈士，当地政府采取多种形式整修墓地，纪念烈士。

1950年，长沙县人民政府遵从人民的愿望，在撤区并乡时，将旧制白



石乡正式命名为开慧乡，烈士所在村命名为开慧村，以表示家乡人对杨开慧烈士的永远纪念。

1959年，开慧人民公社党委和管委会在板仓棉花坡首次修葺杨开慧烈士墓，在墓前竖起“光辉长照后人心”的青石碑。

最值得一提的是杨开慧与母亲合葬之事。

杨母向振熙老人系平江石洞喇人，1870年出生，1888年与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结婚。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在党的周密安排下，向振熙和儿媳李崇德装扮成走亲串门的样子，护送三个小外孙去上海，返回湖南后，杨老太太痛失了爱女，与岸英兄弟中断了联系，不知他们的下落，也不知毛泽东的音讯，极为悲痛焦虑万分，度日如年，她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悲哀。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悲痛万分，他要替杨开慧尽一份孝心，在上辈的亲人中，杨老太太是毛泽东最关心和牵挂的一个。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杨开智将老太太健在的消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欣慰不已，当即回电致贺。9月份，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准备回湘省亲，毛泽东获知即托朱仲丽给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抵御风寒。同时附信一封：



杨老太太：

你们好吧！

现在托朱小姐方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布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①

1949年10月，毛泽东又指示湖南省委：“杨开智夫妇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以便杨老太太安度晚年。

1950年是杨老太太80大寿，毛泽东派毛岸英回乡给外婆拜寿，并捎去两颗人参，让老太太滋养身体。第二年，毛泽东又派次子岸青回湖南探望外婆。

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按月给老夫人寄去生活费，从未间断过，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有时秘书忘寄了，他便嘱咐秘书补寄。

1960年是老太太90高寿，当时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在北京工作，毛泽东听说她要回湖南老家，便写了一封信并交给她200元钱购置礼物，向老太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55页。



太祝贺。信曰：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接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①

1962年春，岸青与邵华结婚，毛泽东对儿媳说：



1962年，毛岸青、邵华回板仓给杨开慧妈妈扫墓。前排右一为刘松林。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56页。



“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于是，岸青、邵华双双回到长沙，看了外婆并给母亲祭扫陵墓。带去父亲对杨家亲人的问候。

1962年11月，杨老太太在长沙逝世。噩耗传来，毛泽东十分悲痛，随即发去唁电，以表哀悼，并寄上500元，作为杨老太太的安葬费用。毛泽东在唁电上说：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①

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充满了对岳母杨老太太的无比崇敬与怀念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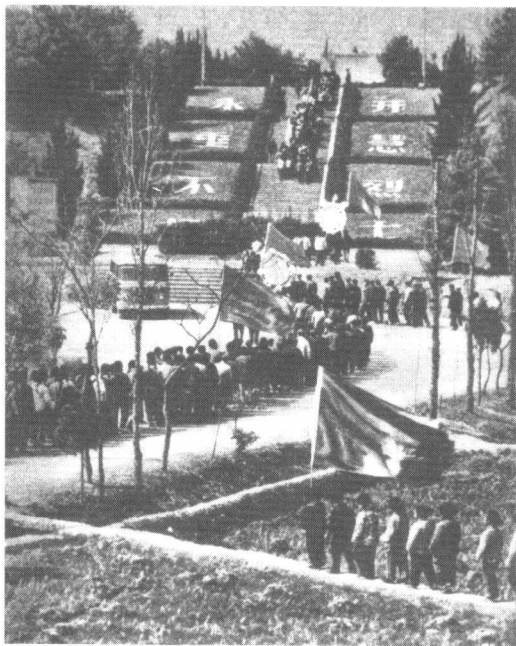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56页。



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杨老太太与爱妻杨开慧同穴,有两个意图,一是了却杨开慧遗愿。杨开慧生前与母亲相依为命,从不分离,被捕后杨开慧被迫与母亲分手,她有揪心撕肺的难受,临终之前未能见上母亲一面。现在母女都安息了,就让她们在九泉相见吧。不要让爱妻感到孤单;二是为了不能忘怀的纪念。岳母可敬,爱妻可亲,同穴合葬以利家人祭拜,作为丈夫,拜了岳母就拜了妻子,拜了妻子就拜了岳母;作为孩子,拜了母亲就拜了外婆,拜了外婆也就拜了母亲,合乎情理的一拜二敬。

接到唁电后,当地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将母女合葬。

1969年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拨付专款,正式建设杨开慧烈士纪念馆和陵园,家乡人民以最隆重的仪式将杨开慧与母亲合



1969年,家乡人民修建了开慧烈士陵园。



冢陵园修建在正东的高坡上。墓穴为洁白花岗岩石砌成,墓塔朴素端庄,庄严肃穆,塔后高高耸立着镌刻有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的牌坊,气势恢弘。

1982年,当地政府对烈士旧居进行整修,意外地从夹壁中发现1929年3月杨开慧写给堂弟杨开明的信和其他文稿,手稿为小楷毛笔书写,字迹工整,长达12面计4000多字,从情真意切的流畅行文中,表达了杨开慧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坚定信念和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坚强决心,也表达了对丈夫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满篇是殷殷之情,拳拳之心,豁达大度间又不失儿女亲和之情。言短情长,震撼人心,成为昭示后人的好教材。

1993年,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人民缅怀伟人,怀念亲人,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捐资雕塑了杨开慧烈士汉白玉全身像,隆重立于烈士陵园之中,她那慈祥智慧的面容,那昂首挺胸、坚毅沉稳的英姿,带给人们的是革命先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无私精神和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力量。

今天,板仓已是开慧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京珠高速公路横贯全境,县乡公路直达各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杨开慧烈士故乡已成为红色旅游圣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三十、不忘孙嫂

孙嫂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的保姆。其大名
叫陈玉英,湖南宁乡人。因家境贫寒,十多岁便出
外打工,长期做家庭用人。曾在湖南省长赵恒惕家
里做过工。

陈玉英来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非常
受欢迎,因其夫家姓孙,毛泽东和杨开慧便尊称陈
玉英为“孙嫂”。孙嫂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度过了4
年。为照顾孩子、收拾家务出了大力,同时,因杨开
慧被捕而遭牵连又受了大罪,但是孙嫂没有怨言,
她甘心情愿为毛泽东和杨开慧做一些事情。

杨开慧在牺牲前对孩子放心不下,特意嘱咐孙嫂
一定要为毛家照料好3个孩子。孙嫂这样做了。出
狱后,8岁的岸英正拉肚子,骨瘦如柴,孙嫂浑身是
伤,就这样,孙嫂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抱着走不动的岸
英艰难地走出狱门,来到杨开慧的六舅家,六舅见孙
嫂和岸英都面黄肌瘦,大病在身,有意让孙嫂回去,将
岸英留下。孙嫂流着泪对六舅说:“杨开慧走之前嘱
咐我要带好孩子,抚育他长大成人,我不能丢下孩子
不管。”于是,孙嫂将岸英带回板仓,和杨老太太一起



照料3个孩子。孙嫂把杨老太太当作自己的母亲,像杨开慧那样照顾老人和孩子,杨老太太也把孙嫂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五口人相依为命。

转眼4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杨开慧的族戚杨秀生跑来对杨老太太和孙嫂说:“国民党说你陈玉英不改悔,还在帮‘匪属’家做事,又要来抓你了,你快跑吧。”老太太含着泪对陈玉英说:“开慧已经死了,你就是我的女儿。本来想从今后大家在一起吃点稀饭,就这么过下去,可他们又要来抓你了。我死了一个女儿,不能再死第二个女儿。我不能看着你落入虎口,你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就这样,陈玉英含泪离开板仓,回到老家宁乡县坝塘乡与丈夫相聚。

陈玉英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待了4年,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家里人都以为她在外面死了,所以陈玉英一回家,她的丈夫四外奔走相告:“我孙八娘回来了!我孙八娘没有死啊!”

陈玉英回来后,生活也十分困难,共生了7个孩子,只活了一个,即陈女儿孙燕。但她依然挂念着岸英兄弟。

1949年5月的一天,陈玉英在乡下打零工,听人说“朱毛”部队要进长沙城。陈玉英知道,朱毛的“毛”就是当年的润之先生。于是,陈玉英撤



下家庭，一个人来到长沙住在文运街8号赵恒惕的房屋。陈玉英在到毛家做保姆之前曾在赵家当过女佣。

此时，长沙已和平解放，到处都有解放军，陈玉英四处打听毛泽东家人。一天，陈玉英在街上听到一群女青年在议论中提到“杨开英”。陈玉英一听，便想到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不管两个杨开英是否一个人，急于要找毛泽东家人的陈玉英便上前插话说：“如果杨开英来了，麻烦你们几位告诉她，就说孙嫂住在文运街8号。”

后来，杨开英与孙嫂取得了联系。在杨开英的帮助下，陈玉英与住在长沙的杨开智夫妇也取得联系，并见到了杨老太太。

其实，毛泽东也在寻找孙嫂的下落。1950年毛泽东派儿子岸英回乡，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找到孙嫂。

岸英回到长沙后，很快就见到了孙嫂。两人一见面便抱头大哭起来，那狱中杨开慧的形象一下子浮现在脑海里。作为对孙嫂的报答，岸英说：“我来时父亲反复交代要安排好你的生活，你有什么困难，请讲。”

孙嫂听了非常感动，她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只有一个女儿在乡下她伯伯处，她的父亲已死了，



我放心不下。”

岸英当即拿出钱让陈玉英去乡下接女儿。在岸英的帮助下，孙燕进了长沙保育院上学。

岸英回到北京后，将陈玉英家的情况告诉了父亲。

1951年12月18日，陈玉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对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同时也表达了想到北京看望毛泽东的愿望。毛泽东接信立即予以回复：

陈玉英同志：

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现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

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①

^① 谢柳青：《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57页。



信中,毛泽东对陈玉英的革命精神给予以高度赞扬,同时也体现出了对陈玉英生活的关心。由于时不适宜,毛泽东没有答应陈玉英来京,但这件事一直搁在毛泽东心中。到了1957年6月,毛泽东将陈玉英接到北京相见,后来陈玉英在她的怀念毛泽东的文章里,回忆了这次接见的具体情况:

1957年6月,建国后我第一次见到了他老人家,这是我永生难忘的幸福时刻啊!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笑着站起来,亲切地和我握手。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隔了30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还好健康啊!我望着他老人家高大的身材,慈祥的面容,心里无比激动,无比幸福。毛主席亲切地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几十年前的事情,毛主席还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从长沙望麓园同我第一次见面,谈到从武汉送我们回板仓;从离别后开慧、岸英不幸被捕,问到我过去和现在的一些情况。当我讲到开慧在敌人严刑拷打、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情形,讲到她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和对岸英的深切期望时,毛主席难过地流下了眼



泪,深情地称赞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毛主席还回忆了其他革命烈士,深情地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呀!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毛主席还说:你同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开慧一样。你以后可以每年来北京一次,看看这里的建设变化情况。毛主席留我吃午饭,叮嘱我要好好休息,注意身体。我这个在旧社会讨米做工的普通劳动妇女,能得到毛主席这样的关怀爱护,真是感动极了。过了四天,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了我,临别时,还送给我和女儿每人一张他老人家的照片,在照片上亲笔签了名,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毛泽东”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①

刚解放时,为了体现政府对过去对革命有功人员的关心,规定每人每月补助 20 元,陈玉英领了几个月补助后,不去领了,认为自己能自食其力,不能给政府添麻烦。到 1954 年,陈玉英突然大病一场,不能在外做保姆了。毛泽东知道陈玉英的困难后,

^① 此文原载 1977 年 9 月 13 日《人民日报》,标题为《怀念大救星毛主席》。



经常让秘书代他寄钱来，每次都在 200 元以上。1958 年 2 月，陈玉英女儿孙燕从北京回湖南，毛泽东让她捎去 200 元。1962 年，杨老太太逝世，毛泽东在给杨开智“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的同时，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陈玉英也寄去 500 元。

当时正是全国困难时期，收到这么大的一笔钱，陈玉英简直有些担惊受怕，她将女儿喊到厕所里，告诉了这 500 元的情况，并将中办秘书室寄来钱的有关条据撕烂。

“文革”期间，毛泽东事务繁忙，无暇顾及亲友的生活困难，便给老朋友、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一些钱代为接济亲友困难。1975 年，周世钊送给陈玉英 300 元，说是代主席送，陈玉英和孙燕收钱后并打“收到毛主席赠送的 300 元钱”收条。

毛泽东对孙嫂的女儿孙燕也非常关心。

孙燕又名配君，毛泽东的信中有时写作“佩君”，均指孙燕。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孙燕进入长沙保育院上学。

1955 年学校放假了。孙燕想去北京一次，于是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到北京看一看的要求，毛泽东收到信后很快回复：



配君同志：

你的信收到，很高兴。

你们想到北京一看，是可以的，但是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罢。你母亲在何处工作，情况何如？如有困难，可告之。

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①

孙燕当时只是一个 13 岁的小姑娘，尽管毛泽东没有答应她来北京，但是，她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在信中称她为“同志”孙燕还是十分高兴的。

1957 年 5 月，孙燕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但不知道该报考什么学校，音乐老师建议孙燕报音乐学校。当时，音乐学校在哪里，考什么科目，孙燕一无所知。后来打听到湖北武昌有所音乐专科学校，孙燕想到人生地不熟，怎么考？不如写封信问一问毛主席，于是，她提笔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① 谢柳青：《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第 271 页。



敬爱的慈父：

您好！

我现在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面临着个报考学校的问题。我们的老师劝我去考音专，听说音专在武昌，我想请您老人家为我写一封信给学校，问一问他们到底要考一些什么科目。……

孙配君

1957年5月16日^①

这是一封十分幼稚的信，然而，毛泽东出于对孙嫂一家的关爱，居然回信了，而且十分郑重其事。其信云：

佩君同志：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

^① 谢柳青：《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75页。



后还可以寄一些。不要忧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①

接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孙燕认认真真的在家温课,准备考出好成绩来。同时在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可是到了下半年,长沙市有三条规定:1. 户口不在长沙的要下放;2. 家庭生活无来源的要下放;3. 本人一时无法找到工作的要下放。当时有人据此三条规定,要孙燕回宁乡农村去。孙燕以下乡后母亲无人照顾为由向毛泽东写“求救”信:

敬爱的慈父毛主席:

妈妈要我写这封信给你。现在,派出所要我们下放,理由是我家无主劳动力,生活无固定来源。要下放到农村去,自食其力。其实,我们每人都有生活费 20 元,我自己在学校当代课教师,妈妈在办事处做街道工作,任妇女主任。这两点,都是不属于下放的对象。我妈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了身,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得到了

^① 谢柳青:《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第 275 页。



很好的照顾。如果放下了,我们一家就无能为力了。

向您的家里人问好。

孙配君^①

毛泽东又很快回信了,信封上写“长沙市文新桥3号孙配君同志”,信曰:

配君同志:

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问你母亲和你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

^① 谢柳青:《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77页。



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①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孙嫂一家的关爱程度,而这种关爱主要源渊于孙嫂与杨开慧的特殊关系,从这里也可以折射出毛泽东对杨开慧的似海深情。

其实,孙燕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并没有去找省委统战部,因为她给毛泽东写信不久,所在地的派出所户籍民警到她们家,说明孙燕不属下放对象。所以,孙燕没有让任何人看这封信。

1958年2月,毛泽东派人将孙燕接到北京,并进行了亲切交谈。孙燕在北京住了近半个月。毛泽东安排她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还给她买了一些衣服。

孙燕要回湖南了,毛泽东给陈玉英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此次看见配君,她说暂时不做工作,继续补习,将来再讲工作问题。我看这个主意不错,故让她回长沙。她还年轻,目前学习一时期有益。

^① 谢柳青:《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78~279页。



写完信，毛泽东让秘书取来 200 元钱，将信和钱交孙燕带回。

回到长沙后，孙燕听毛泽东的话，好好学习，在家温习功课，8 月初，孙燕考入设在武昌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中央会议，正在武昌学习的孙燕意外地碰到毛泽东的秘书高智。由高智引见，孙燕又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

1960 年底，孙燕快毕业了，孙燕和母亲都希望上北京再见一见毛泽东，并写信表达此意。不久，一件写着“湖北艺术学院李召邦先生转孙燕收”的信送到孙燕手里。孙燕一看字体便知道这封信是谁寄来的，急忙开函阅读：

孙佩君同志：

你妈妈的信和你的信，都收到了，感到高兴。望你们好，有困难告诉我。不要来京，我很忙的。

问你妈妈好，祝她健康。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①

^① 谢柳青：《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第 288 页。



毛泽东不厌烦地频频通过信函表达他对孙嫂家人的问候和关爱,使孙嫂母女深受感动,并默默在平凡岗位上工作。孙嫂多次被评选为人民代表、先进工作者、省扫盲模范。1977年,孙嫂以81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9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1981年11月,孙嫂走完人生道路,终年85岁。孙燕由中南音专毕业后,回到长沙,先后在市文化馆、图书馆、艺术馆工作,几十年来,她牢记毛泽东的亲切教导,认真工作,无私奉献,深受当地人民称赞和尊敬。



三十一、关爱杨家

可以说,对于板仓杨家,毛泽东一直有一种负疚心情。这一点,有人对毛泽东的这种心理进行了细腻的描述。在听到关于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黏黏的,沉甸甸的。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键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有吃晚饭,并且失眠了。……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地下党的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他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地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



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①

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负疚心理,所以,建国后,毛泽东将对杨开慧的爱转化为对杨家人的关怀和爱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的第一个板仓杨家人是杨开英。

杨开英是杨开慧的堂妹,生于 1915 年,比杨开慧小 14 岁。在读书世家的影响下,杨开英从小刻苦读书,励志进取,学习成绩一直优良,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读完大学,是杨家的一代文化传人。1949 年冬,杨开英赴大连工学院任教。由于她幼时患过肺结核病,留下病灶,来到大连后,因不适应北方冬天的寒冷气候,以及粉笔灰末的刺激,病症复发,气喘咳嗽不停,只得休息治疗。1950 年春,她利用病假期,到北京探望堂姐夫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板仓杨家人,悲喜交集,感慨万千。新中国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其中板仓杨家就有三人献出生命,一是毛泽东的爱人杨开慧;二是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三是杨开慧的外甥杨展。而

^① 《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版,第 30 页。



杨家幸存的人也为革命担了不少风险，做出了贡献。毛泽东见到杨开英格外兴奋，他详细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和杨家亲戚以前的经历以及目前生活状况等。当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说：

“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慧字云锦，号霞。毛泽东称开慧为“霞”使用了杨家人对开慧的称呼。杨开英听了非常亲切。

“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杨开英说话时脸上充满了敬意。

接着，两人陷入了沉思。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毛泽东称开英为“友妹”。作为杨开慧的堂妹，毛泽东对她有着烈属和亲属的双重感情。在毛泽东的感情世界里，杨开慧不仅是他的爱妻，更是他曾经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因此，他给了杨开英一个特殊的称呼：友妹。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好多了。”杨开英答道。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病吧。”毛泽东正视着杨开



英,头脑里似乎出现了杨开慧的形象,又关切地说: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杨开英感激地点了点头,说:“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杨开英留在中南海一边治病,一边休养,稍有空隙,毛泽东便去看她。而心胸褊狭的江青嫉妒毛泽东对杨家人的关照,言行之中表现出对杨开英的冷淡。杨开英不愿意因为她而给毛泽东带来麻烦,便尽早返回大连。

回到大连,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他报个平安之后,她很长时间没有给毛泽东去信。调动工作后,也没有把地址告诉他。她这样做,一方面是不想让毛泽东为她的事操心,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毛泽东家庭情况的考虑。然而,毛泽东长时间得不到开英的音讯,反而更牵挂她了。

1956年12月15日晚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家乡亲人拉家常时才得知杨开英的情况。第二天,毛泽东便给开英写了一封信。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



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①

1958年,杨开英经人介绍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晖结婚。婚后,杨开英由大连调到北京,任第69中学教务主任。不久,她向毛泽东写信,告知她的近况。毛泽东接信后,十分高兴。1958年2月20日,即正月初三,毛泽东给开英复信: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在一九五六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

^① 谢柳青:《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300页。



毛泽东与杨开慧

MAO ZE DONG YU YANG KAI HUI

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

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日^①

杨开英调到北京后，虽离毛泽东更近了，但她却很少去中南海，而毛泽东却时常挂念她。

有一次，毛泽东收到开英寄来的一封信，得知她近期身体状况有所好转，病已痊愈，高兴不已，当即回信。

友妹：

信收到，很高兴。我尚好，勿念。

兄字

一月四日^②

廖廖几句，却流露出毛泽东对杨开英的无限挂念之情。1960年8月1日，毛泽东又一次向杨开英写信：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83页。

^②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83页。



开英同志：

久不见，甚以为念。你的情况好吗？
有暇望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①

信封上写道：“交/杨开英同志/毛寄。”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3年杨开英病逝，杨开英共收到毛泽东写给她的亲笔信6封及数笔款项。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是不多见的，体现了毛泽东对杨开英无微不至的关怀。

住进北京后，最先与毛泽东有通讯来往的杨家人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杨开智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自己的母亲向振熙老人尚健在，并询问外甥岸英、岸青兄弟及自己的女儿杨展的情况。接信后，毛泽东当即回信：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83页。



贺。岸英、英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八月十日^①

杨开智生于1888年8月25日，长于毛泽东5岁，为毛泽东妻兄。杨开智自幼受家学熏陶，学业成绩优异。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便与其相识。父亲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积极操办丧事，杨开智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结下深厚情谊。

1921年，杨开智考取北京农专，1925年毕业，1927年初回到湖南从事农业试验场工作。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介绍他去常德弼山森林局任局长。前妻叫李一纯，后与李一纯的七妹李崇德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57页。



结婚。杨开智夫妇为革命做了一些事情。杨开慧被捕后,杨开智夫妇曾偕老母奔走南京设法营救。杨开慧牺牲后,李崇德冒险护送岸英三兄弟去上海。1938年送女儿杨展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在湖南省农业试验场工作,致力于茶叶科研工作。并与母亲向振熙老人住在一起,相互照应。

毛泽东对杨开智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关心,早在1950年5月,毛泽东即派长子毛岸英回湘探望外婆和舅父、舅母。带去他对杨家亲人的问候。1953年9月27日,毛泽东给当年的老同事、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劳工部部长的易礼容写了一封信,信曰:

礼容兄:

杨家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能间常去看视两位老人则更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①

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当时在长沙福湘女中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62页。



任教。“两位老人”是指开智的母亲向振熙及向的姐姐。

在关心杨家生活的同时，毛泽东对杨开智夫妇的要求也很严格。杨开智不想在湖南工作，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一个合适工作。毛泽东予以坚决谢绝。1949年10月9日，他就此事给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发一份电报。电报严肃指出：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九日^①

所谓“另电”，是指毛泽东发给杨开智的一份电报。

电报写道：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62页。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①

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下，杨开智打消了去北京工作的念头，打算留在长沙工作，但却萌发了在长沙谋取厅长职位的想法。并通过表弟向三立向毛泽东说情，向三立没有给毛泽东说，只是把杨开智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毛岸英。

10月24日，毛岸英给向三立一封信，即著名的“三千字长信”。信中说：

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62页。



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①

实际上，毛岸英是替父亲批评舅舅。

杨开智没有得到厅长职务，只是被安排在省农林厅担任技工兼研究所主任。李崇德被安排到省儿童福利院担任副院长。以后，杨开智还担任湖南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

毛泽东关爱杨开智，还表现在多次会面上。

1950年底，杨开智来北京开会，妻子和女儿杨瑛同行。毛泽东获悉他们来了，当即派秘书到住处看他们，并接到中南海做客。久别重逢，毛泽东异常兴奋，和他们谈起许多往事。谈到杨开慧牺牲

^①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63页。



时,毛泽东异常悲痛,问道:“开慧墓修得怎样?”杨开智回答:“开慧墓已修葺一新,我们经常去扫墓。”

毛泽东听了感到很欣慰。谈话后,毛泽东请他们吃了饭。

1952年冬,杨开智去北京参加全国茶叶工作会议,再次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向他详细询问了湖南省茶叶公司开展“三友”运动的情况。叫他积极投入这一运动。1959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下榻省委蓉园,在蓉园毛泽东又接见了杨开智夫妇,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合影留念。



三十二、赞颂“骄杨”

杨开慧的一生是光荣伟大的一生，是艰难坎坷的一生，也是短暂的一生。年仅 29 岁的杨开慧是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也是为了她所爱的丈夫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杨开慧是伟大的母亲，坚贞的妻子，孝敬的女儿，她的人格、精神、事业值得称颂，值得家人称颂，值得全国人民称颂，更值得她的丈夫毛泽东称颂。

1957 年 5 月，毛泽东收到长沙十中教师李淑一的一封来信。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好朋友，好同学，杨开慧在福湘女中读书时与李淑一同班同舍，非常要好。杨开慧进入福湘女中读书就是时任福湘女中国文教员的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聘介绍的。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也是毛泽东的好友。两个人志同道合经常来往，后一同从事湖南农民运动。经杨开慧介绍，柳直荀与李淑一结成伉俪。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1930 年 11 月，杨开慧被敌杀害。1932 年 9 月，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在洪湖根据地不幸被“左”倾路线错误杀害。时年



34岁。

由于长期的战争，李淑一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1950年1月17日，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告诉她杨开慧牺牲的情景及自己的近况。4月18日，毛泽东给她回信，深情地说：“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并要她代向她的父亲李肖聃及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致以问候。

1957年1月，《诗刊》发表了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李淑一读后，抚今忆昔，不胜感慨，她起想，30年前毛泽东曾有一首《虞美人》词赠给杨开慧。那天，杨开慧和李淑一在流芳岭下散步，杨开慧告诉李淑一，她收到毛泽东寄给她的一首词。李淑一只记得头两句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数寒星。”但后面几句，却记不起来了。

于是，李淑一写信向毛泽东索要全词。并寄上自己于1933年写的一首词。那时，传闻她丈夫柳直荀牺牲了，一天晚上，她梦见丈夫回来了，样子非常狼狈。李淑一哭着醒来，便和泪填写一首词：



菩萨蛮

兰闺索寞翻身早，
夜来触动离愁了。
底事太难堪，
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
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
满衫清泪滋。

毛泽东接到来信后，心潮跌宕起伏，几十年来的新思旧念，一齐涌到心头。几个月前，他刚刚为女英雄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此刻李淑一的来信，又使他追思另一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性。

5月11日，毛泽东伏案疾书，作复李淑一。信中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子的人，不是前辈和后辈的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他不愿意因李淑一的恭敬而使自己对杨开慧的感情有丝毫的疏远。同辈相称更显亲切。

他当然记得1920年的那首《虞美人》之作，那里寄托27岁的他给新婚娇妻的一片缱绻情思。但



是,经过30余年的戎马生涯的洗炼,他的感情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也不愿意让自己当年倾诉爱恋之情的词给后世年轻人带来某些影响,因此,他委婉地写道:“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

这首《游仙》词就是后来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全文如下: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关于游仙诗,毛泽东在信中对李淑一解释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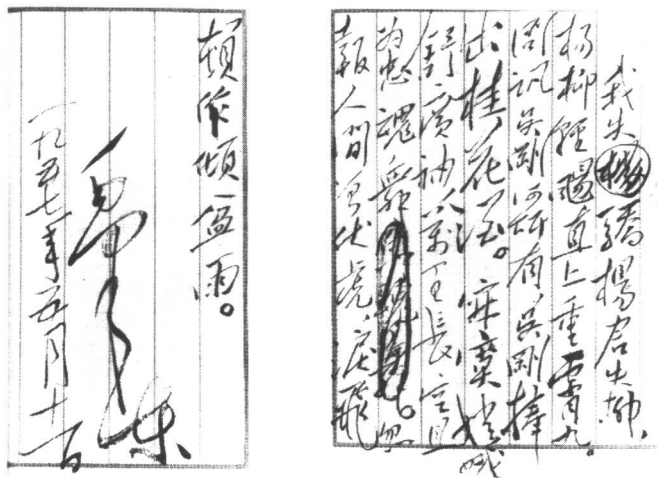
游仙是古代诗歌中的一种题材,用以描述作者超脱尘俗,漫游仙境的情怀。晋代的术士郭璞以此类诗而成名。到了唐代,游仙之作大多是诉说儿女



衷肠或附会神仙游戏人间之事了。所以，毛泽东要特别强调指出：“作者自己不在内。”

李淑一的索词及毛泽东作诗，更加勾起毛泽东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思念之情。毛泽东在信中对淑一写道：“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

5月，李淑一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和《游仙》词。她热泪盈眶，来到板仓，在烈士墓前泣念了这首词，并写下祭文，寄给毛泽东。



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手迹

毛泽东给李淑一写信并赠词的事情，让正在长沙十中实习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的同学知道了，他们几次访问李淑一老师，请他讲述毛泽



东来信的详细经过,讲述杨开慧、柳直荀烈士的事迹,并抄下了《蝶恋花》一词。

但狂热的同学们并不满足,他们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毛泽东这首光辉词章,便大胆地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毛泽东批准公开发表。11月底,毛泽东亲笔写来回信,同意公开发表,回信写道:

来信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1958年元旦,《蝶恋花·赠李淑一》一词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上发表了。这一发表震惊全国。上海的《文汇报》首先转载了这首词。很快,《人民日报》、《诗刊》和全国各地的其他报刊几乎都予以转载发表。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毛主席诗词》,这首词被选入,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这是毛泽东注入感情最深的一首词,也是他最喜爱的一首词。一天,岸青和邵华请求父亲书赠这首词,以作为对母亲的怀念。毛泽东悬肘奋笔,第一句写出了“我失杨花”。岸青和邵华以为有误,提



醒说：“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放下笔来，沉思片刻缓缓地答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骄杨”，洋溢着毛泽东对这位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女性的自豪之情。

“骄杨”作何解释，这在今天已不是什么问题了。



1979年，毛岸青、邵华和陈玉英、孙燕在杨开慧烈士墓前。

可是在这首词发表之初，许多读者并不十分了解。章士钊先生在一次登天安门城楼观礼时，曾当面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直声答道：“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是啊，儿子为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母亲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骄傲，毛泽东为有这样的妻子而骄傲。“骄杨”是三湘人民的骄傲！



后 记

写《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多更深刻地了解杨开慧。写作动机源于第一次对杨开慧故居的参观。那是从韶山来到板仓。我们感到惊讶!韶山人流如云,而板仓门可罗雀。这种情景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情结的。人们应该了解杨开慧,记住杨开慧。于是,我们决定写杨开慧。

在写作时所参阅的资料都是已公开发表的。特别是选用了一些反映毛泽东与杨开慧生活和战斗的油画作品。在此,对相关图书、刊物和作者、画家表示诚挚的谢意。另外,高风、王春明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感谢。对本书中存在的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指正。

王 华 李 林

2006 年 8 月